



国际中文学术期刊卓越工程 建设期刊

ISSN 3105-5877

人文与社会科学探索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xploration



2025
1卷4期 4



环球未来出版社
Global Future Press

人文与社会科学探索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xploration*

ISSN 3105-5877 月刊

主编：李松有

副主编：张子杰

编委成员：王淳凯 熊晨曦
杜凯伟

外审专家：刘文涛 邢新宇
张凯博 赵律言



GLOBAL FUTURE PRESS

主办 | 环球未来出版社

官网 | www.gfpress.org

邮箱 | gfpress@yeah.net

地址 | 中国香港尖沙咀亚
士厘道 34 号星光行大厦 7
楼 A5 室

目录 TABLE OF CONTENTS

铸牢共同体：卓克基长征遗产的当代转化 Forging a Community: The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of the Zhokeji Long March Heritage

从革命历史到文化旅游：卓克基红色文化遗产的历史内涵与文旅发展对策 — 王淳凯、邹培杨

From Revolutionary History to Cultural Tourism: The Historical Connotation and Cult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Zhuokeji Red Cultural Heritage – WANG Chunkai, ZOU Peiyang
pp.1 – 7

游离与摇摆：情感纠葛里的自我挣扎 Wandering and Wavering: Self-Struggle Amid Emotional Entanglements

毛姆《面纱》中凯蒂自我意识的无根性研究 — 柯贤飞

A rootless study of Katie's self-consciousness in Maugham's The Veil – KE Xianfei
pp.8 – 12

新闻传播的价值与认同 Value and Identity in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新闻传播学中人文价值传承与社会认同建构的互动机制研究 — 闫瑞峰

Research on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 of Humanistic Value Inheritance and Soci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 YAN Ruifeng (Янь Жуйфэн)
pp.13 – 20

劳动治理模式的三重裂隙 Three Rifts in Labor Governance Model

区域国别视角下的中越劳动关系法律比较研究 — 以天虹银河纺织公司为例 — 王晨烨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abor Relations Laws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from a Regional and National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Tianhong Galaxy Textile Company – WANG Chenye
pp.21 – 26

观音性别转变探析 An Analysis of Guanyin's Gender Transformation

慈悲的性别重构：观音菩萨女性化及其崇拜现象的文化逻辑 — 秦臻宇、赵梓君

The Gender Reconstruction of Compassion: The Cultural Logic of the Feminization of Guanyin (Avalokiteśvara) Bodhisattva and the Phenomenon of Its Worship – QIN Zhenyu, ZHAO Zijun
pp.27 – 32

数字红色出版双路径探索 A Dual-Path Exploration of Digital Red Publications

数字时代红色出版物的交互设计与版权保护机制探究 — 杨淳凯、张安博文、陈政歧、商旺、孙明昊

Exploration of Interactive Design and Copyright Protection Mechanisms for Red Publications in the Digital Age – YANG Chunkai, ZHANG Anbowen, CHEN Zhengqi, SHANG Wang, SUN Minghao

pp.33 – 38

新媒体公益视觉传播研究 A Study on New Media Public Service Visual Communication

新媒体公益广告的视觉叙事设计与传播效果研究 — 张荣焱

Research on the visual narrative design and communication effect of new media public service advertisements – ZHANG Rongyi

pp.39 – 46

协同治理瓶颈与对策 Bottlenecks & Countermeasures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多元共治研究 — 张凯博

Research on the Diversified and Collaborative Prevention and Resolution of Disputes – ZHANG Kaibo

pp.47 – 51

圆教视域下的实存建构 Existential Construction from Round Teaching Perspective

“问题”的有机体系简说——对“圆教”之体系的本体实存论的诠释 — 陈逸舟

The Organic System of "the Problem" Brief Explanation——An Ontology-Existenziology Interpretation of the System in "Perfect Teaching" – CHEN Yizhou

pp.52 – 60

摄影创作的视觉心理机制 The Visual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of Photographic Creation

摄影与心理学的视觉感知与摄影创作的关系研究 — 乐滋威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sual Perception in Psychology and Photographic Creation – LE Ziwei

pp.61 – 70

从革命历史到文化旅游：卓克基红色文化遗产的历史 内涵与文旅发展对策

王淳凯¹ 邹培杨²

(1.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 重庆 400715;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 102488)

摘要：卓克基作为长征时期红军进入川西北后重要的革命实践地之一，保留了大量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遗产，既记录了红军与少数民族接触、沟通与团结的历史过程，也见证了革命力量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坚定斗志。随着文化自信和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卓克基红色文化遗产逐渐成为地方文旅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在开发过程中仍存在文化阐释单一、产品同质化、资源活化不足、文化价值转化能力弱等问题。本文在梳理卓克基红色文化遗产类型与历史内涵的基础上，结合民族地区文旅融合的发展趋势，从多个方面提出系统化对策。研究认为卓克基红色文化遗产不仅是革命历史教育的重要载体，也是民族地区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资源，应在科学保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文旅融合，使其成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促进民族团结和推动地方振兴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卓克基；红色文化遗产；长征；民族地区；文化旅游

卓克基作为长征时期红军进入川西北地区后的重要革命实践地，在中国革命史和民族关系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1935年前后，红军在自然条件极端艰苦、民族关系尤为复杂的川西北山地开展军事行动与政治工作，卓克基由此成为革命力量与藏、羌等多民族群众接触最密集、互动最深刻的区域之一。这里既是重要会议的召开地，也是宣传动员、统一战线实践的重要空间，留下了丰富的革命遗址、革命文物与口述传统，形成了独特而厚重的红色文化遗产体系。

进入新时代以来，红色文化遗产在国家文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民族地区发展战略中均占据重要地位，其文化价值、教育价值、精神价值与旅游价值不断被重新认识^[1]。卓克基作为川西北红色文化资源密集分布区，其革命遗存逐渐从历史记忆向公共文化、文旅产业、国民教育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现实功能延伸，成为地方文化自信建设的重要源头，也是讲好长征故事、深化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载体。然而，随着红色旅游快速发展，一些深层问题也逐渐凸显，如文化阐释的历史脉络化不足、文旅产品的同质化倾向明显、文化价值向产业价值的转化链条较短、社区参与和利益分享机制仍显薄弱等。这些问题不仅制约卓克基红色文化遗产的整体效益，也可能导致其历史厚度被消解。

因此，系统梳理卓克基红色文化遗产的资源基础与历史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科学、可持续的文旅发展对策，既是推动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深化民族地区红色

基金项目：四川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红色文旅研究中心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卓克基红色文化遗产的历史内涵与文旅发展对策研究”（HSWL23Y01）；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川滇民族文化发展研究中心项目“以微探著：顺荡火葬墓碑群碑铭所见滇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程”（2024CDYB009）。

作者简介：王淳凯（1996-），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文化遗产保护。
邹培杨（1992-），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化阐释与教育功能的重要任务。有鉴于此, 本文将以卓克基现存红色文化遗产为基础, 结合长征史、文化遗产学与文旅融合理论, 对其文化价值进行系统分析, 并提出与区域条件、民族特色和时代需求相适应的发展路径, 以期当地文旅规划提供学理支撑和实践启示。

一、卓克基红色文化遗产资源概述

卓克基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 是藏、羌、汉等多民族聚居的山地社会, 其自然地理条件复杂, 山体破碎、河谷纵深、道路险峻, 使得这一地区在历史上长期处于相对封闭、但文化流动频繁的状态。传统土司制度、宗教势力与民间组织共同构成了卓克基的社会结构, 使其既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 又呈现权力结构复杂的特点。正是在这样一种兼具封闭性与开放性、稳定性与多变性的社会环境中, 红军长征时期的一系列政治与社会实践才显得尤为不同一般, 其革命举措需要在尊重当地风俗、理解民族心理、适应社会组织结构的前提下展开。

1935年前后, 红军在卓克基地区开展了大量具有关键意义的政治与军事活动, 其中最为人熟知的, 是在卓克基土司官寨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该会议围绕长征路线选择、战略部署以及民族地区革命策略等核心问题展开, 深刻影响了战略格局的调整, 也揭示了党在面对民族地区革命任务时的审慎态度与高度政治智慧^[2]。除会议之外, 红军在卓克基还开展了政治宣传、群众组织、筹粮买粮、经济互动等多项工作, 在深刻理解当地民族文化背景的基础上, 以纪律严明、政策清晰的方式逐渐赢得群众信任, 为后来红军与川西北民众之间的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卓克基现存的红色文化遗产类型十分丰富, 其内容跨越革命遗址、革命文物、口述历史、民间记忆、文化景观等多个领域, 构成了一个层次多元、结构立体的文化体系。革命旧址包括卓克基会议遗址、红军驻扎地、临时指挥场所等, 为再现历史事件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革命文物与档案类资源则保存了红军与当地互动的细节, 包括粮票、凭证、宣传资料以及部分老百姓珍藏的红军遗留物件; 口述历史和民间叙事进一步丰富了遗产内容, 使卓克基红色文化从官方史料延伸到社区日常记忆, 从而呈现出更为全面、生动的地方历史图景。此外, 红军行军路线、周边自然景观及其与革命事件的关联性, 也成为卓克基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资源, 为红色旅游的空间塑造提供了天然优势。

二、卓克基红色文化遗产的历史内涵

卓克基红色文化遗产所蕴含的历史价值, 不仅体现在长征时期重大事件的发生本身, 更体现在红军与当地藏、羌等多民族居民之间形成的复杂而深刻的社会互动, 以及这种互动所显现出的组织方式、政治理念与民族政策原则。卓克基作为红军多次停驻与政策施行的地点, 见证了革命力量在民族地区传播的逻辑路径, 也见证了长征精神在跨文化环境中的具体化呈现。红军在此期间所采取的纪律要求、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策略以及对民族风俗的尊重态度, 使卓克基成为研究革命与地方社会关系、民族地区革命动员方式的重要案例。正因如此, 卓克基红色文化遗产所蕴含的历史内涵, 远超一般意义上的革命记忆, 而是具有民族关系重塑和制度创新等多维度特性。

红军在卓克基实行的群众路线, 是该地区红色文化遗产最具代表性的重要内涵之一。在陌生且充满警惕性的民族社区中, 红军通过纪律严明的行为规范、清晰透明的经济政策和积极主动的宣传活动, 打破了原先由国民党对红军恶意抹黑的不实形象, 使当地居民逐渐从恐惧与疏离转向理解与信任^[3]。红军在筹粮、住宿、物资交换等日常互动中的做法极大地改变了当地民众对外来武装力量的传统认知, 从而促使群众逐步意识到红军与地方军阀、旧政权之间在政治理念和社会目的上的本质差异。这种基于伦理、实践与政治理念三者结合的群众

工作方式,使卓克基成为长征沿线群众路线成功实施的重要节点,同时也成为其红色文化遗产在今天具有教育意义的重要源头。

统一战线思想在卓克基的贯彻,是红军在民族地区革命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当时的卓克基地区存在土司、头人、宗教人士、地方武装、民间组织等多元力量,权力格局复杂,并且不同群体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利益竞争与历史冲突。红军并未采取简单的阶级划分方式,而是在充分了解当地社会结构之后,采取灵活的政策策略,努力争取地方上具有影响力的中间力量,使其逐渐产生对革命事业的理解乃至支持。这一策略不仅减少了军事行动中的阻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地方社会结构的重组,使红军政策能够在更大范围的民众中传播和落实^[4]。卓克基红色文化遗产所反映的这种统一战线实践,既是革命政治智慧的重要体现,也是今日研究民族地区多元力量整合的重要参照。

在卓克基,红军对民族文化与宗教信仰的尊重态度,是其能够建立稳定军民关系的关键因素之一。卓克基地区的民族文化传统深厚,宗教仪式、服饰习惯、房屋结构、语言体系以及土司权威体系等共同构成了当地社会的文化基础。红军在进入这一地区后,并未对这些文化形式进行排斥,而是在不违背革命原则的前提下尽力予以尊重和适应,使政策宣传能够以一种当地易于接受的方式进行。这种尊重文化差异并通过文化沟通来推动政治动员的方式,使得红军所倡导的平等理念逐渐被当地民众理解,也为后来各族群众参与筹粮、支援行军、提供向导等活动奠定了情感基础^[5]。卓克基红色文化遗产中所包含的这一文化尊重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使其具有跨文化交流和民族工作范式研究的重要价值。

红军在卓克基实行严格纪律和经济政策,也是红色文化遗产中具有象征意义的部分。当地民众长期生活在多种势力交错竞争的环境中,对于武装力量普遍持有警惕甚至恐惧态度。红军通过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物必还、筹粮付款等制度化措施,改变了民众对武装力量的传统经验判断,使其逐渐理解红军的军纪与政治理念之间的内在关系。红军在卓克基留下的木牌、欠条以及相关物证,成为今日最能体现其纪律性与政治性的重要文物,也是广大群众在口述记忆中反复提及的关键内容^[6]。这些文化遗存不仅具有物质层面的史料价值,更体现了革命队伍在物质极端匮乏环境中仍坚持原则的精神境界,并构成卓克基红色文化遗产最能触动后人的核心内容之一。

卓克基红色文化遗产所呈现的历史内涵,还体现在革命实践与地方社会变迁之间的长期影响。红军在当地实行的政治动员、组织建设和社会教育,使部分地方群众开始接触现代国家观念、政治平等理念,从而促使当地社会开始出现超越族群界限的政治认知变化。尽管红军停留时间有限,但其带来的思想、制度与经验成为促成川西北部分地区早期现代化的重要起点。许多群众在长征结束后仍保留着对红军的积极评价和情感记忆,形成跨越时代的民间叙事传统,也为今日开展民族团结教育与红色文化传播提供了充足的历史基础。

三、卓克基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困境

卓克基红色文化遗产作为长征沿线的重要历史见证,承载着革命历史、民族互动与统一战线实践等多重价值,但在新时代文旅融合发展需求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其保护工作面临多重挑战。首先,从物质遗存角度看,卓克基土司官寨及周边革命遗址具有年代久远、结构复杂、材料脆弱等特点,长期受自然风化、雨水侵蚀、地震影响和人为活动干扰,遗产本体保护压力显著增加^[7]。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瞬时大量涌入的游客也对建筑结构、内部陈设、地面承重形成一定冲击,加剧了文物的磨损风险。部分保护工程缺乏科学规划,对传统材料和结构的理解不足,使文物修复面临断层化、表面化甚至不当干预的问题。此外,遗产区周边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也对遗产本体形成潜在威胁,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张力持续存在,导致遗产保护工作难以实现稳定、长效的制度化推进。

在制度机制方面,卓克基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管理主体多元但协同不足的现实问题。地方政府、文旅部门、文物保护单位、景区运营公司和基层社区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保护利用,但在实际执行中,职责划分不够明确、协调机制不够完善、资源配置不够有效,导致政策实施存在一定碎片化和短期化倾向。地方财政投入有限,专业人才缺乏,导致遗产保护规划常常因资金不足或执行不力而难以落实。同时,部分地方在发展压力下对旅游收益产生依赖,容易形成“重利用、轻保护”的倾向,使保护工作面临商业利益挤压。缺乏系统的红色文化遗产法律规制与监督机制,也使不规范开发、过度商业化现象难以得到有效遏制,导致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在制度层面仍存在明显短板^[8]。

在价值表达与叙事建构方面,卓克基红色文化遗产的阐释体系尚显不足,主要表现为叙述深度不够、历史逻辑呈现不够清晰、民族地区视角挖掘不够充分等问题。当前的展示叙事往往以长征故事的宏大叙述为主,而对卓克基在红军民族政策实践中的独特意义、土司制度社会背景、红军与藏羌群众互动形成的统一战线经验等内容呈现不足,使卓克基红色文化遗产与其他长征节点存在一定叙述趋同化的风险。同时,部分展示内容对民族因素的呈现流于表面,缺少真正从当地社会结构、文化生态和民众情感层面理解历史互动过程,导致叙事缺乏历史厚度。此外,卓克基的红色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表达,与全国许多同类型地区一样,未能与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乡村振兴战略等现实议题充分衔接,未能形成既体现历史深度又面向时代需求的阐释体系^[9]。

在社区参与和社会认同方面,卓克基当地居民对红色文化遗产的认知程度、情感连接和参与度仍存在差异。部分居民虽然生活在遗产区周边,但对革命历史了解有限,对于红色文化符号的精神意义缺乏深入认识;部分居民虽在旅游产业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其参与更多停留在劳务层面,缺少作为主体参与文化叙事和遗产治理的机会。在利益分配方面,旅游收益未能完全公平惠及社区内部,部分群体参与度较低,导致社区对红色文化遗产发展的积极性不足。社区文化与红色文化之间也存在一定的隔阂,若缺少有效对接机制,容易影响红色文化遗产的社会基础和长期认同。

四、卓克基红色文化遗产文旅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面对上述困境,卓克基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必须建立在科学保护、系统规划和价值引领的基础上,实现文化品质、教育功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应的统一,才能确保卓克基红色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使其成为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文化自信和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精神资源。为推动卓克基红色文化遗产在文旅融合中释放更深层次的时代价值,应从整体规划、内容表达、产业协同、社区共建与治理优化等方面提出综合性对策。

首先,应强化顶层设计,构建符合卓克基地区生态环境、文化结构、民族特点和产业基础的整体文旅发展规划,使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振兴、民族地区发展、区域品牌塑造等工作形成协同推进的整体格局。在规划过程中应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通过科学评估游客容量、基础设施承载力和环境影响,提高规划的前瞻性与执行力,避免过度开发或重复建设导致的资源浪费与文化损伤^[10]。

在内容表达方面,卓克基红色文化遗产文旅融合的发展应着力构建深度化、体系化和体验化的内容体系,使红色文化呈现从“看文物”“听解说”向“沉浸体验”“深度理解”的演化^[11]。应围绕长征历史、民族关系、统一战线实践、文化交流等核心主题,打造具有情境复原能力的叙事空间,通过多媒体、AI交互技术、数字影像、VR体验、实景演绎等方式重现当年红军在卓克基的生活场景和关键历史事件,使游客在沉浸体验中理解革命先辈的信仰力量与时代选择。同时,应鼓励学术界参与叙事体系构建,通过文献考证、口述史整理与民族文化研究,为红色文化叙事提供扎实的学术支撑。叙事体系还应体现卓克基民族文化特征,

将藏族、羌族的传统文化因素与红色历史有机结合，在旅游体验中实现“民族文化与红色文化共鸣”，提高文化呈现的深度与辨识度。

在产业协同方面，卓克基红色文化遗产文旅融合应从“景区式旅游”向“全域式体验”转型，推动红色文化、生态环境、民族文化、乡村经济等要素深化整合，形成综合性文化旅游产业链。可通过构建红色研学旅行基地、红色文化主题演艺项目、民族文化体验村落、红军主题线路、生态徒步线路等产品体系，使游客获得更加多样化和立体化的体验^[12]。在产业链延伸方面，可推动文创产品体系打造，如开发基于卓克基长征历史的主题文具、服饰、手工艺品、数字文创产品等，使红色文化以现代化方式融入日常生活。通过引入具有专业能力的文旅企业与内容团队，推动卓克基形成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红色文化IP，使文旅融合具备长期市场竞争力。同时，应推动当地农产品、手工艺品、餐饮服务与文旅产业深度结合，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提高文化遗产带动区域经济的综合效应。

在治理机制方面，需要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专家指导和社区共建的多主体协同机制，提高卓克基红色文化遗产文旅融合发展的治理能力。政府应强化规划指导、制度保障与监督管理，并加大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文化保护工程的财政支持^[13]；社会力量则可通过投资、运营、内容创新等方式参与文旅发展；专家团队应提供技术咨询、学术支撑和专业评估，确保保护与开发的科学性；社区则在文化讲述、资源保护与旅游服务中发挥核心作用，构建以社区为主体的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并使当地居民成为遗产保护、文化传播和产业发展的主要参与者与受益者。此类多元共治模式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减少管理碎片化问题，推动文化、旅游、科研与社区力量形成真正的合力。此外，应加强数字治理，通过数据追踪游客流量、设施使用情况与环境变化，提高治理决策的精准性与响应力，使文旅融合呈现智慧和科学化特征。

总体而言，卓克基红色文化遗产文旅融合发展的对策应在保护优先、文化核心、社区参与和产业协同的框架下推进，通过构建全面系统的规划体系、打造多层次文化内容、发展创新型产业结构、强化社会参与机制和提升治理能力，使卓克基成为新时代红色文化传承与民族地区文旅融合发展的典范。只有在保护真实性与创新表达之间取得平衡，在文化传承与市场需求之间找到交汇点，卓克基红色文化遗产才能在新时代焕发更强的生命力，成为增强文化自信、促进民族交流和推动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

结论

卓克基红色文化遗产作为长征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中国革命历史、民族地区社会结构转型和统一战线实践的多重价值，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文化内涵为新时代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资源。在系统梳理卓克基红色文化遗产的历史背景、文化特质、保护现状与发展需求后可以看到，这一遗产不仅见证了红军在多民族聚居区开展革命动员、政治工作和群众路线的具体实践，也记录了汉、藏、羌等多民族在历史变动中的互动关系与情感连接，因此具有深厚的历史真实性、鲜明的民族文化属性和重要的时代教育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受制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保护力量不足及叙事体系不完善等因素，卓克基红色文化遗产在保护与利用方面仍面临本体脆弱、制度协同不足、叙事趋同化、社区参与不足和治理体系碎片化等多重困境，亟须以更加科学、系统和长效的方式加以应对。

通过对卓克基红色文化遗产文旅融合路径的探索可以看出，推动红色文化遗产在新时代发挥更大作用，需要坚持保护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坚持真实性保护、文化内涵挖掘与时代价值表达三者相协调。在保护层面应以科学规划和制度保障为基础，通过结构评估、数字化技术、多主体协同治理和社区参与等方式实现遗产本体的稳定性和保护体系的长效性；在文化表达层面应从宏大叙事走向深度叙事，从单线叙述走向多元视角，通过学术研究支撑、民族

文化融入、科技沉浸呈现等方式构建具有卓克基特色的红色文化阐释体系,使红色文化从历史记忆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和可传播的文化资源;在产业发展层面则需要推动红色文化、生态资源和民族文化的综合整合,通过产品体系创新、产业链延伸、数字文旅应用和品牌塑造实现卓克基文旅发展的多元化与可持续性,使红色文化遗产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民族地区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源。

综上所述,卓克基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文旅融合发展不仅关系到革命文化基因的延续和民族地区文化自信的提升,更关系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的时代任务。推进卓克基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旅融合,需要政府、学界、社区与市场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在制度建设、内容创新与治理能力提升中持续探索符合卓克基实际的发展道路。只有在坚守文物保护红线的前提下不断深化文化价值挖掘,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卓克基红色文化遗产才能在新时代展现更为持久的生命力,真正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融合文化与发展、促进交流与认同的重要载体,为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的文化振兴、经济建设与社会进步提供更加深远的支持。

参考文献:

- [1] 刘中阳.文化强国建设中红色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5,(04):135-144.
- [2] 刘邦琨.长征途中,毛泽东在卓克基土司官寨(上)[J].党史纵览,2023,(07):11-14.
- [3] 陈学志.卓克基土司及土司官寨——兼谈嘉绒藏族民族建筑的一些特点[J].西藏研究,1999,(01):106-109.
- [4] 刘全.大道同行——红军长征过四川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J].2015,(03):72-73.
- [5] 郭建文.红军长征时期民族政策执行特点及对当下全面从严治党的启示[J].贵州民族研究,2017,(09):12-18.
- [6] 陈红.长征时期红军在川康藏区的筹粮纪律[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9,(03):104-109.
- [7] 王才道,王春阳,孟婷.卓克基土司文化景观的特点及价值研究[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9,(03):22-26.
- [8] 林驰.红色文旅资源保护与利用平衡推进的法治保障——以系统论为指引[J].社会科学,2025,(05):127-133.
- [9] 曾祥明,胡元.论红色文旅资源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及其实现[J].延边党校学报,2022,(06):42-47.
- [10] 王祯,田银生.嘉绒藏族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研究——以卓克基西索村为例[J].智能建筑与智慧城市,2021,(04):51-53.
- [11] 汪忠华,刘婷.革命文物赋能红色文旅融合发展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J].红色文化学刊,2025,(03):91-100+112.
- [12] 柳春雨.藏族民居建筑特色初探——以卓克基镇为例[J].美术观察,2017,(08):127.
- [13] 高威.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我国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政策分析[J].中国文化遗产,2024,(04):15-24.

From Revolutionary History to Cultural Tourism: The Historical Connotation and Cult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Zhuokeji Red Cultural Heritage

WANG Chunkai¹, ZOU Peiyang²

(¹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 School of Ethn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²School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significant revolutionary sites where the Red Army operated after entering northwestern Sichuan during the Long March, Zhuokeji preserves a wealth of distinctive red cultural heritage. This heritage not only document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ontact, communication, and solidarity between the Red Army and ethnic minorities but also bears witness to the unwavering revolutionary spirit under extremely challenging conditions.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red cultural heritage in Zhuokeji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vital element for local cultural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However, issues such as simplistic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homogenized tourism products, inadequate activation of resources, and weak capacity for transforming cultural value persist dur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Based on categorizing the types and historical connotations of Zhuokeji's red cultural heritage and align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in ethnic regions, this paper proposes systematic strategie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The study argues that Zhuokeji's red cultural heritage serves not only as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revolutionary history education but also as a cultural resource for foster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ethnic regions. Therefor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n the basis of scientific conservation, enabling it to become a significant force for narrating China's stories effectively, promoting ethnic unity, and driving loc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Zhuokeji; Red cultural heritage; Long march; Ethnic regions; Cultural tourism

毛姆《面纱》中凯蒂自我意识的无根性研究

柯贤飞*

(欧洲大学, 塞尔维亚 贝尔格莱德 101501)

摘 要: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的《面纱》常被置于女性成长小说的传统之下解读, 认为女主人公凯蒂在湄潭府的苦难经历中实现了精神的升华与成长。本文以线性叙事为出发点, 提出凯蒂的觉醒实则是反成长的过程。文章通过追述凯蒂自我意识萌芽和发展的过程, 论证了凯蒂的觉醒从外部幻象的破灭开始, 却陷入了内在价值的真空; 她虽然获得了选择的自由, 但又无法承受这种自由带来的重压, 在欲望与理性之间相互撕裂, 暴露出其主体性的脆弱和虚妄。本文结论认为凯蒂的旅程没有导向稳固的自我实现, 而是终结于对存在虚无的清醒认识, 她的成长是未完成的、悖论的。这种“反成长”的叙事, 是毛姆对现代人寻找意义时所遭遇的内心困境的悲观主义发现。

关键词: 自我意识; 存在困境; 毛姆; 《面纱》

一、引言

文学批评界历来习惯于将《面纱》归入“教育小说”或“女性成长小说”的传统类型中加以阐释。在此种阐释路径之下, 小说女主人公凯蒂的湄潭府之行, 被普遍地建构成一场深刻的救赎与启蒙仪式。她离开了香港浮华虚伪的殖民社会, 置身霍乱肆虐的生死场域, 在修道院无私奉献精神的感召下, 好像经历了一次灵魂的洗礼。传统的论点大多将这一过程理解为一向直线向上的人格提升之路, 即一个轻浮附庸的女性, 在苦难之后抛弃旧我, 实现人格完善与精神涅槃^[1]。将小说的结尾视为明确的乐观主义信号, 肯定外部环境对个人内在转变的决定性作用。

但是本文意在质疑并超越这一程式化的解释模式。凯蒂的“觉醒”并不是传统成长故事里导向整合性自我实现的胜利之旅; 相反, 它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复杂且充满悖论的“反成长”模式^[2]。她心智的开启并未抵达意义的归宿, 反而将自己置于一片存在主义的荒原之中。凯蒂的自我意识像幼苗一样破土而出, 但是它萌发的土壤是由幻灭感、死亡的阴影和价值的真空组成的, 并不能给它提供坚实的生长根基。因此, 觉醒并没有给她带来解放的确定性, 反而让她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存在的虚无、人生追求的虚妄。她的成长轨迹并不是一条向上扬起的曲线, 而是从一种混沌进入另一种更高层次的混沌的循环。

本文将沿一条明确的文本分析路径展开论证: 摒弃宏观的印象式概括, 采用细致的文本细读方法, 紧紧跟随凯蒂自我意识萌芽与发展的几个重要节点——婚姻与婚外情双重幻象的破灭、湄潭府时期在生死观照下的初步自省、返回香港后在欲望与理性之间的再次挣扎, 以及对其未来命运的模糊期待。通过分析各个阶段主人公心理状态的内在矛盾性与认知虚妄性, 试图证明凯蒂的“成长”是未完成的。最终, 通过对这个“反成长”叙事结构的揭示, 本文希望呈现毛姆在冷峻笔触下所隐藏的哲学思考, 即人类在摆脱社会幻象之后, 是否还能、或者如何为自身存在找到意义的深刻悲观主义思考。

作者简介: 柯贤飞 (1999-), 男, 硕士, 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研究与应用语言学。

通讯作者: 柯贤飞

二、幻象的破灭与自我的真空

（一）依附性人格的崩塌与觉醒的被动

凯蒂的觉醒，最初的动力不是来自对某种崇高内在自我主动的追寻，而是来自她原来生存方式所依赖的一系列核心幻象的相继崩塌。在到达湄潭府之前，她的整个人格都是对外部的依附，她对爱情的理解是一种浪漫的戏剧化投射，在与查理的关系中，将其视为逃离无趣婚姻的救赎；她对婚姻的看法是一种功利的市场交易，与瓦尔特的婚姻实际上是为了在殖民社会的择偶市场中避免沦为“剩女”的风险；她所参与的社交活动更像是一场场精心的表演，在香港殖民社会的狭小天地里维系着体面与虚荣，这些幻象共同构成了她赖以生存的符号秩序，一个她从未怀疑其真实性的“面纱世界”^[3]。但是查理在私情暴露之后冷酷的背叛，完全打破了爱情的幻象；而瓦尔特以沉默的愤怒和惩罚性的湄潭府之行，揭穿了婚姻作为安全港湾的假面。这一系列外部事件的冲击，并非主动的求索，而是被动的剥夺，让凯蒂第一次直面自己一直回避的、幻象帷幕之后的真实荒漠。她的觉醒自始便带有创伤性与否定性，其动力源于旧世界的崩塌，而非新世界的召唤。

（二）瓦尔特之死与修道院经历的悬置效应

在凯蒂被迫进入的湄潭府这个“极限境遇”里，瓦尔特之死和修道院的见闻成为她精神历程中的两个关键悖论性事件。瓦尔特的死，其意义远不止于一位丈夫的离世，更是凯蒂与旧世界最后一根、也是最深的强制性联结的断裂。瓦尔特既是她的审判者，又是她和过去那种以交易、欺骗为根基的生活方式的联系点。他的离世，使加诸她身上的外在道德审判骤然消失，也让她失去了可憎恨、可恐惧或可祈求原谅的对象，陷入一种无债可偿、无罚可受的茫然境地^[4]。与此同时，修道院是超越世俗苦难的神圣之地，对凯蒂而言，修道院无疑为她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修女们虔诚奉献、无畏赴死，让她见识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力量，这在某种程度上开阔了她的眼界，促使她开始审视自己过去生活的狭隘。但关键在于，修道院所象征的信仰与绝对奉献，凯蒂始终无法将其真正内化为自身的内在品质。她敬仰它却不能信仰它；她模仿善行却不能从中得到灵魂的救赎与安宁^[5]。两种经历共同产生的悬置效应，便是它们一同摧毁了凯蒂赖以生存的旧有世界（社交虚荣与世俗爱情），却未向她提供一个可安稳栖息的新世界（信仰或崇高的使命感）。她的精神也因此被推向一片真空地带：既无法退回过去，也难以迈向未来，陷入一种失重、迷失方向的存在主义困境。

（三）否定性认知与自我建构的未完成

此阶段凯蒂萌发的自我意识具有显著局限性，其核心特征在于其是一种否定性的认知建构。她的精神成长体现在，能够清晰界定自己不是什么、不爱什么，却无法回答“我是谁”这一根本性的问题^[6]。她清楚自己不再是昔日那个轻浮、虚荣、依附他人眼光而活的“贾斯汀太太的女儿”或“费恩太太”；不喜欢查理，厌恶香港这个虚伪的社交圈，甚至反感那个曾经充满欲望的自己。这种否定性认知是其觉醒进程中必要且重要的一环，这意味着旧有身份已被彻底摒弃。但这种认知模式本质上是被动反应性与解构性的，它虽破除了迷思，却无法建立起新的主体性内核。凯蒂的自我意识宛如一块被清理干净的空地：视野虽开阔，内里却空空如也，缺乏可填充的积极内容。她有了一种批判过去的的能力，但却没有一种面向未来的构想。因此，这一阶段的“成长”是不完整的、是残缺的。它只完成了自我探寻上半程的解构，更重要的是下半程的建构还没有完成。以否定为基调的自我意识，无法为自身存在价值定位，因而难以给内心带来真正的安宁，也为日后的精神反复与更深层次的虚无埋下了伏笔。

三、自由的重负与选择的虚妄

（一）重返故地与欲望的复归

湄潭府经历死亡洗礼与精神初步觉醒后，凯蒂重返香港并与查理再度相遇，这成为她精神历程中一场极具反讽意味的考验。这一场景的设置，并非叙事赘余，而是毛姆精心设计的一处实验场^[7]。当查理的妻子多萝西以殖民社会虚伪的“宽容”与“善意”，将她强行拉回昔日的社交网络并安排她与查理独处时，凯蒂被置于一个高度压缩的时空之中，直面新旧自我的激烈交锋。表面上看，此时的凯蒂已不再是昔日那个沉浸于浪漫幻想的单纯妇人，她洞悉了查理的虚荣、软弱与本质^[8]。但是正因为她清醒，所以后面的行为更具有悲剧性。理智上，她对他已无幻想；但在身体与积习层面，仍存在一种强大的、近乎生理性的引力。她的屈服，并非源于爱情的复苏，而是在承受巨大创伤与压力后，对熟悉且能带来短暂慰藉的旧日习惯的回归。这表明，离开湄潭府后，外界环境的改变加之对查理的认清，并未能够消除根植于其人格结构中的欲望模式与情感依附。

（二）自我的撕裂与自由的重负

凯蒂和查理重逢事件的戏剧性之处并不在于身体再次出轨，而在于此事所揭示出来的巨大内在张力，也就是“行为”与“认知”的彻底割裂。当她“半推半就”地投入到查理的怀抱中时，肉体完成了一次欲望的宣泄；但几乎在同一时刻，她的意识却抽离出来，成为一名冷酷的旁观者与审判者^[9]。其行为中已无往日的激情与甜蜜，唯有对自身的厌恶与蔑视。这种灵与肉的冲突，标志着更为深刻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她拥有了选择的自由，却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无力承载这份自由所带来的重负。存在主义认为，人一旦被抛入自由之中，就必须对自己的每一个选择负责。凯蒂的悲剧在于，她清醒地做出了选择，也清晰地目睹了这一选择如何背叛了自己新生的、追求尊严的道德理想，这种痛苦的自责比任何外在的惩罚都来得更严重^[10]。这说明她的自由成了一个诅咒，成了一个把她撕裂的东西，一端是未被驯服的肉体欲望，另一端是初生的、渴求纯洁统一的自我。二者无法调和，使她陷入了比在湄潭府时更为深重的痛苦与自我否定之中。

（三）觉醒的脆弱与选择的虚妄本质

这一事件有力地印证了凯蒂先前觉醒的脆弱性与不彻底性。它宛如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震碎了她精神大厦的地基，人们才发现这地基原本就建在流沙之上。新生的自我意识，在认知层面虽已对旧有幻象进行了批判，在整合人格、统领本能方面却如此弱小无力。它宛如一位没有实权的君主，无法命令自己的肉体与情感习惯服从。因此，凯蒂的行为并未导向全新的、更高层次的自我统一，而只是可悲地沦为对旧日习惯近乎宿命般的回归。此处的“宿命感”至关重要，它并非指外在的命运安排，而是由长期行为模式积淀而成的内在心理惯性，这种惯性强大到即便已“觉醒”的个体也难以抗拒^[11]。这一回归，已然剥去了自由选择浪漫化外衣，显露出其虚妄本质。对凯蒂而言，在那一刻，真正的“自由”并非体现在顺从欲望的轻车熟路上，而是体现在依循理性与道德理想、克制欲望的艰难能力之中^[12]。她不能行使后一种自由，就证明了她所获得的自由仍然是残缺的、表面的。毛姆通过这一情节冷酷地揭示：看穿生活谎言的第一层面纱，并不足以让人过上真实的生活；揭下面纱之后，人们或许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片更为费解的荒原，一个仍被过去幽灵所纠缠的、不自由的自我。

四、未完成的成长与存在的回声

小说的结尾并非一个尘埃落定的句点，而是一处充满张力的开放空间，凯蒂对腹中女儿未来的憧憬，是解读其最终精神境遇的钥匙。这幅场景不是母性光辉的简单展示，而是凯蒂经历幻灭与挣扎之后，对自身存在的困境发出的最后的回答。通过分析这一行为背后的缘由

与其哲学意蕴，我们能清晰地察觉到：凯蒂的成长之路并未走向传统意义上的圆满终点，而是在一种更具现代性悲剧色彩的“未完成”状态处止步。

（一）指向他者的救赎投射与存在的转嫁

凯蒂对父亲说：“我要把女儿养大，让她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人。”我将她带到这个世界，爱她、养她，并非为了让她将来嫁给某个男人，从此将自己的一生依附于“他”^[13]。但是把她的精神历程放在一起看，这番慷慨陈词就显露出一种逃避的结构。凯蒂把未能实现的自由、自立的理想全部寄托在未出生的、作为他者的女儿身上。在本质上，就是将建构自身存在意义的艰巨任务，在时间上和对象上进行转嫁。她为无法回答的“我是谁”“我怎样生活”问题找到一个替代性的答案：“我会让我的女儿成为某某样的人”^[13]。这种寄托中固然有真挚的母爱和进步的愿望，但同时它也巧妙地避开了凯蒂对自身当下存在的全部责任。萨特曾言：“人是其所行，而非其所愿。”这里形成了一个尖锐的反讽：凯蒂的“所愿”尽数寄托于未来与他人，而她自身的“所行”在故事落幕时仍处于悬置状态^[14]。她用塑造一个完美的未来人格来救赎自己破碎的过去和迷茫的现在，这本身就说明了其内在的主体性是虚弱和不彻底的。

（二）清醒的痛苦与未完成性的最终确证

凯蒂的最终归宿，不是一条从“愚昧”通往“启蒙”的直线，而是一条从“愚昧的痛”走进了“清醒的痛”。她固然掀开了生活的一层面纱，看透了浪漫爱情的虚妄、世俗婚姻的空洞、殖民社交的虚伪，以及宗教奉献之于她的隔膜^[15]。但是面纱之后，并没有找到可以安身立命的终极答案或者稳固的价值根基。正如她对父亲所言：“我无知、轻浮、没有头脑，这些我都清楚。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光有我之前说的这些是不够的。”这正准确地把握到了她的困境：她清楚地知道不是什么，却仍然困惑于是什么。她的成长是从对自身空虚的困惑开始的，经过一番痛苦的追寻，最终达到的是一种对空虚本身有更深刻、更清醒的认识，从而进入更高阶的困惑之中。这种未完成的成长，正是毛姆对传统成长小说模式最有力的反叛与解构^[16]。小说的结尾，凯蒂走的是通往安宁的道路，但这条路本身是不确定的，安宁是遥远的、永远不可能到达的一个彼岸。她的故事没有闭环，她的自我也没有完成最终的整合。毛姆借此揭示出现代性生存的一则真相：觉醒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终结，而是更为复杂、严峻的问题的开端。凯蒂的旅程向我们昭示：真正的成长，或许最终并不指向光辉灿烂的自我实现，而只是勇敢直面并接纳那永无完结的人生，在虚无的回音中，继续追寻属于自己、毫无承诺的求索。

五、结论

综观凯蒂自我意识的觉醒历程，她的道路并非通向精神圆满的朝圣之路，而是勾勒出一幅“反成长”的现代性图景：觉醒将其带入更深层的存在困境，自由选择反而暴露了心理惯性的支配与选择的虚妄本质。毛姆借助这一叙事手法，打破了传统成长小说的惯性，融入了一种冷静的哲学思考，生活的本质并非等待揭晓的终极答案，而是令人不安的一片虚无。因此，《面纱》的永恒价值便蕴含于这种毫不妥协的洞察之中：它昭示着，现代人的核心困境并非找不到通向真理的路径，而是必须直面根本不存在现成道路这一事实，在虚无之中依靠自身力量，进行毫无保障的意义建构。

参考文献：

[1] 吕佩爱，刘慧. 不彻底的女性主体意识建构——毛姆在《彩色面纱》中的女性观[J]. 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4（3）：323-330.

- [2] 康哲. 从空间视角解读《面纱》中凯蒂的人物塑造[J]. 中原文学, 2024(18): 69-71.
- [3] 司徒瑞文. 婚姻的困境——毛姆《面纱》之经典叙事学研究[D]. 中国: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24.
- [4] 胡天, 郝延斌. 论《面纱》中的主体建构[J]. 英语广场, 2025(6): 58-61.
- [5] 李鸣宇. 论毛姆《面纱》中的精神探索[J]. 名作欣赏, 2023(12): 127-132.
- [6] 丁美杰. 论毛姆对中国形象的两极书写——以小说《面纱》为例[J].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8(6): 123-126.
- [7] 黄丽娟. 毛姆《彩色的面纱》的跨国现代主义解读[J]. 外国语文, 2022, 38(4): 40-47.
- [8] 梁慧琦. 毛姆《面纱》的叙述学解读[J]. 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7, 29(3): 14-18.
- [9] 高锋. 毛姆小说《面纱》中的爱情悖论和精神救赎[J]. 新疆职业大学学报, 2015, 23(5): 43-45.
- [10] 卢佳润. 《面纱》的跨文化空间解读[J]. 名作欣赏, 2025(3): 149-151.
- [11] 张丹琪, 徐丹. 《面纱》中凯蒂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列斐伏尔空间理论为视角[J]. 英语广场, 2023(8): 60-64.
- [12] 张慧霞. 女权主义下的毛姆《面纱》研究[J]. 中国民族博览, 2022(8): 182-184.
- [13] 李四菊, 谷野平. 女性逆境中自我建构研究——从镜像理论视角解读毛姆《面纱》[J]. 大连大学学报, 2021, 42(4): 36-39.
- [14] 吴宁辛. 浅析《面纱》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J]. 文教资料, 2023(7): 9-12.
- [15] 王凯英. 浅析《面纱》中凯蒂的存在主义意识[J]. 名家名作, 2023(31): 28-30.
- [16] 桂汐盈. 浅析毛姆《面纱》中的女性成长[J]. 名家名作, 2024(3): 19-21.

A rootless study of Katie's self-consciousness in Maugham's The Veil

KE Xianfei*

(European University, Belgrade 101501, Serbia)

Abstract: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s "The Veil" is often interpreted under the tradition of women's coming-of-age novels, believing that the heroine Katie has achieved spiritual sublimation and growth in the suffering experience of Meitan Province. This article takes the linear narrative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proposes that Katie's awakening is a process of anti-growth. By tracing the ger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Katie's self-consciousness,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that Katie's awakening began with the shattering of external illusions but fell into the vacuum of inner value; Although she gained freedom of choice, she could not bear the weight of this freedom, tearing each other between desire and reason, exposing the fragility and vanity of her subjectivity.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Katie's journey does not lead to solid self-realization but ends with a clear awareness of existence and nothingness, and her growth is unfinished and paradoxical. This "anti-growth" narrative is Maugham's pessimistic discovery of the inner dilemma encountered by modern people in their search for meaning.

Keywords: Self-awareness; There is a dilemma; Maugham; "Veil"

新闻传播学中人文价值传承与社会认同建构的互动机制研究

闫瑞峰

(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 哈萨克斯坦 阿拉木图 050040)

摘 要: 本文聚焦于新闻传播学中人文价值传承与社会认同建构的互动机制, 剖析二者相互推动的内在逻辑以及实践途径, 研究发现, 新闻媒体借助文化记忆激活、故事化叙事以及创新表达形成人文价值的现代转变, 依靠情感共鸣、符号构建以及仪式传播强化社会认同, 这样的互动构建起“价值传承—认同建构”的双向螺旋模型, 其中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呈现出功能互补的态势, 本研究为理解新闻传播的社会文化功能给予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 新闻传播学; 人文价值; 社会认同; 互动机制

一、引言

信息时代, 新闻传播已超越其传统的信息传递功能, 成为一种强大的文化力量和社会黏合剂。纵观人类传播史, 从口耳相传到数字传播, 媒介形态的每次变革都深刻影响了文化传承与社会整合的方式, 在当今背景下, 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多样性与社会认同的复杂性, 使得探究新闻传播在人文价值传承与社会认同建构中的互动机制显得尤为紧迫。

我国目前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 文化自信以及社会和谐已然成为关键的发展目标, 新闻传播作为连接古今中外的桥梁, 它如何借助日常化、生活化的传播实践, 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达到创造性转化以及创新性发展, 提高全社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时代课题。现有的研究大多只是从单向度去探讨新闻传播对于价值传承或者认同建构的影响, 然而对于两者之间互动机制的系统性剖析还不够充分。

本文尝试突破传统研究的限制, 从动态、互构的角度出发, 构建新闻传播、人文价值传承以及社会认同建构的三维分析框架, 借助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 揭示新闻传播学在人文价值传承与社会认同建构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双向互动机制, 为理解新闻传播的社会文化功能提供新的视角, 也为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新闻传播：人文价值传承与社会认同建构的双重载体

新闻传播作为一种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进行时空构建的活动, 不只是信息传递的途径, 更是意义生成以及社会整合的关键机制, 从根本上来说, 新闻传播活动借助对符号的挑选、重新组合以及传播, 参与到了对社会现实的构建之中, 也为个体和集体提供了认同形成所需要的资源与场景。

人文价值传承跟社会认同建构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达成了内在的统一: 一方面, 人文价值是社会认同的意义源头, 为认同提供内容与方向; 另一方面, 社会认同是人文价值的承载载体, 为价值传承提供社会心理方面的基础, 新闻传播借助日常的、持续不断的报道活动, 把抽象的价值观念转变为可感知的叙事以及可共享的经验, 成为连接人文价值与社会认同的桥梁。

作者简介: 闫瑞峰(2001-),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秘书学、新闻传播学、地域文化传承创新研究。

在传统社会当中，文化传承与社会整合主要是依靠家庭、学校以及官方机构来完成的，而在现代复杂社会里，新闻媒体逐渐取代了部分传统机构的功能，变成了文化传承以及认同建构的关键机制，新闻传播凭借设置议程、选择框架、塑造符号，使得人们对于“我们是谁”“我们向往什么”等根本性问题的认知与回答产生深刻影响。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通过社会分类、社会比较和社会认同三个基本过程，建构起对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认同感。新闻传播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通过选择性呈现某些群体特征、历史叙事和文化符号，强化了群体内部的相似性和群体间的差异性，从而为社会认同的形成提供了认知基础和情感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新闻传播建构社会认同的方式正在经历深刻变革。从传统的单向“告知”模式，转向双向互动的“对话”模式，公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积极的意义共创者，这种转变使得社会认同的建构更加多元、开放和动态。

功能维度	传统模式	现代模式	转变特征
传播方向	单向传播	双向互动	从灌输到对话
受众角色	被动接受	主动参与	从客体到主体
认同形态	同质化	多元化	从统一到包容
时间取向	强调历史延续	关注当下与历史对话	从守成到创新

表 1 新闻传播在社会认同建构中的功能演变

三、人文价值传承的新闻传播机制

文化记忆的激活与重构

文化记忆是一个民族精神生活的根基，新闻传播通过选择性报道和意义赋予，激活特定历史事件、人物或传统，将其纳入当代公共话语空间，从而实现文化记忆的当代重构，这一过程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基于当前社会需求的创造性转化。

以辽宁日报的实践为例：该报纸深入探寻那些“可传承、在当代社会生活里仍具‘活性’且能产生持续影响力的符号”，借助文化记忆、历史记忆等共享记忆的关联，和受众一同构建“情感—记忆的共同体”，推动地域成员的身份认同以及精神认同，比如文字系列报道《向世界叫响辽宁文化》，凭借接近性价值与受众展开记忆连接，提高了传受之间的凝聚力和自豪感。

文化记忆的激活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和建构性。新闻媒体基于当前的社会需求和价值导向，从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源中选择那些具有当代意义的元素进行报道。例如，在弘扬工匠精神的背景下，媒体对传统工艺及其传承人的关注，使这一价值获得了历史纵深感和文化厚重感。

文化记忆的传播效果取决于其与当代社会心理需求的契合程度。当记忆元素能够回应社会当下的困惑或需求时，更容易引发共鸣并产生广泛传播。例如，在社会信任度受到挑战时，媒体对诚信、友善等传统美德的报道，往往能够唤起深层的文化记忆，强化社会认同。

故事化叙事与价值嵌入

故事化叙事是新闻传播实现人文价值传承的重要路径。通过将价值理念嵌入鲜活的故事和生动的情节，新闻传播能够有效降低受众的认知门槛，增强传播的亲合力和感染力。正如杨洸与杜丽洁所言：“故事性新闻报道的特殊之处，就在于能够将情感融入其中，通过情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优秀的故事性新闻报道遵循“事实连接—情感共鸣—文化想象”的传播逻辑。以新华社对“燃灯校长”张桂梅的报道为例，记者通过大量细节呈现张桂梅的工作与生活，如“女孩

子胆小，把灯提前打开，她们来晨读会感觉更安全、更踏实”这样朴实的话语，将“无私奉献”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可触摸的生命经验。这种故事化叙事避免了抽象的说教，而是通过展示而非告知的方式，让受众在情感体验中自主领悟价值内涵。

故事化叙事中价值的成功嵌入，需要遵循三个基本原则：一是适度原则，情感表达应自然真诚，避免过度渲染；二是适应原则，叙事方式应契合受众的文化背景和接受习惯；三是适时原则，故事选择应呼应时代关切，与社会热点形成对话。河南日报的深度报道《谁是“老李”》通过设置悬念的方式引出主人公：一位为古旧村落建设付出心血的乡村规划师，整个叙事采用平民化视角和地方化语言，正是因为把握了这三个原则，才产生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创新表达与年轻化传播

面对代际更替和媒介生态的变化，人文价值传承需要创新表达方式，实现年轻化传播。新闻媒体通过融合新技术、新形式，使传统价值以新颖、时尚的面貌呈现，增强对年轻群体的吸引力。

在这一领域所开展的创新实践涵盖多个方面，具体有运用短视频、H5 互动以及 VR/AR 等技术手段，以此创造出有沉浸感的价值体验，希望能够打造 IP 化的价值符号，就像“故宫猫”这类衍生形象，让传统文化元素更加契合年轻群体的审美，采用轻松幽默的语态环境以及视觉化的表现形式，降低价值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刻板印象。

河南日报社打造的“了不起的甲骨文”文化 IP 是创新表达的典型案例，该报社围绕“了不起的甲骨文”IP，组织“老家河南‘字敬’世界”创意活动，推出甲骨文主题地铁；承办的深圳文博会河南展馆里，“中”字甲骨成为全展厅最火爆打卡地之一；“甲骨文体操有多燃”大挑战，18 次登上微博热搜榜，通过这些创新表达，古老的甲骨文以现代、时尚的形象呈现，增强了年轻群体的兴趣和参与度。

创新表达的关键在于把握“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一方面，要尊重传统的本质与内核；另一方面，要适应当代的审美与需求。央广网“中华经典诵读大会”的成功“破圈”，正是传统价值通过现代表达赢得观众的典型案例，这些成功案例表明，只要找到恰当的现代表达方式，传统文化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吸引力。

传播路径	核心策略	优势	挑战
文化记忆激活	连接历史与当代	增强价值的厚重感与权威性	可能陷入怀旧叙事，与当代问题脱节
故事化叙事	将人文价值融入人物与事件	增强传播的亲和力与感染力	可能简化价值的内在复杂性
创新表达	运用新技术与新形式	增强对年轻群体的吸引力	可能导致价值的表面化、娱乐化

表 2 人文价值传承的新闻传播路径比较

四、社会认同建构的新闻传播路径

情感共鸣与认同萌芽

情感是社会认同建构的心理起点。新闻传播通过触动受众的情感，能够有效打破心理防御，为认同的萌芽创造条件。情感共鸣源于受众与新闻中的人物、事件产生的心理联结和替代体验，这一过程不仅关乎个体情感，更具有社会意义。

在重大事件的报道中，新闻媒体可以通过情感动员的方式，提高集体情感的体验，推动社会认同得以形成，辽宁日报在英模文化的宣传过程中，摸索出一条“情绪感染—观点采择—共情关注”的情感传播途径，该报纸摒弃传统报道的仰视角度，运用平视角度、侧面描绘

以及细节雕琢等手段,使得英模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真实、生动。比如针对烈士守墓人温常卿的报道以十年义肢坚守为轴,以助残志愿服务为翼,以寻亲牵念为核,借多方讲述与细节,汇亲友口述与实事,塑造出有温度的英模形象。

情感共鸣所产生的传播成效取决于真实性、贴近性以及共鸣性这三个要素,真实性要求情感表达必须源自于真实的事件与人物,并非刻意进行煽情;贴近性要求情感内容与受众的生活经历存在关联;共鸣性要求情感表达有普遍性,可引发广泛的共鸣,人民日报抖音号发布的短视频《这个“中国女团”,又美又飒!》对“峨眉派女子功夫团”弘扬峨眉武术、传承中华文化的诸多细节进行探访,之所以产生强烈共鸣,正是符合了这三方面的要求。

符号构建与认同锚定

社会认同需要明确符号载体作为认同的对象和焦点。新闻传播学通过构建和推广特定的符号,为社会认同提供具体的锚定点。这些符号可以是人物(如张桂梅)、地点(如故宫)、事件(如奥运会)或话语(如“中国梦”),它们浓缩了特定历史阶段的价值理念和集体记忆,成为群体身份的象征。

新闻媒体在符号构建过程中,通过重复呈现、意义赋予和语境强化等策略,提升符号的显著性和感染力。新华报业传媒集团通过挖掘地名、音画、文物等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将抽象精神转化为可感知、可传播的叙事内容,构建起连接历史与当下的记忆链条。例如,“大地英名”系列报道从全省2000多个红色地名里,精选出叶挺路、雪枫堤等典型代表,深入挖掘这些地名符号背后的英烈故事。

符号的意义并非固定不变的,新闻媒体通过再语境化和意义重构,使传统符号焕发新意。例如,春节的报道不仅呈现传统习俗,更融入当代元素(如电子红包、云端聚会),这一传统节日符号在保持核心意义的同时,获得了当代的适应性。

仪式传播与认同强化

仪式传播通过程式化的报道和周期性的呈现,强化社会认同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新闻媒体对传统节日(如春节)、国家纪念日(如国庆)、现代节日(如劳动节)等的周期性报道,构建成一种仪式化的传播实践,强化了社会成员的文化归属感和历史连续性。

仪式传播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时间同步,通过定期报道,使社会成员的活动和注意力同步化;二是行为规范,通过呈现标准化的仪式内容,引导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三是情感统一,通过创造共享的情感体验,强化社会凝聚力。央广网的“中华经典诵读大会”正是通过仪式化的诵读行为,将抽象的传统文化精神具象化、情感化、生活化,形象化,有效地唤起人民群众对中华文化根脉的深沉情感与价值归属。

新媒体环境下的仪式传播呈现出互动性和参与性特征。公众不再是被动的仪式参与者,而是通过点赞、转发、评论等行为,积极参与仪式的构建。例如,央广网定制上线的“蒲公英之星”助力活动,允许网友为支持的选手在线投票,前两季活动近2亿人次参与投票,这种参与式仪式,增强了社会认同的广度和深度。

五、人文价值传承与社会认同建构的互动机制

人文价值传承与社会认同建构在新闻传播中并非两个孤立的过程,而是相互促进、相互强化的双向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构成了一个动态的、持续的意义循环系统,推动着文化的延续和社会的整合。

双向螺旋模型

本文提出一个“双向螺旋模型”来解释人文价值传承与社会认同建构的互动机制。在这

一模型中,人文价值传承为社会认同提供内容基础和意义核心,而社会认同则为价值传承提供心理动力和社会载体。两者如同 DNA 双螺旋结构一样,相互缠绕、相互支撑,共同构成社会文化再生产的核心机制。

在双向互动中,人文价值通过新闻传播获得当代诠释与表达,转化为社会成员共享的意义资源。这些意义资源为社会认同提供了具体的指向和内涵,防止认同的空洞化和虚无化。以中华民族认同为例,其核心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同。新闻媒体通过持续报道这些价值理念及其当代实践,使“中华民族”这一认同对象具有丰富的价值内涵,从而增强认同的吸引力和持久性。

反过来,社会认同也为人文价值传承提供了心理动力和社会机制。个体出于认同的需要,会主动学习、内化和践行群体的价值观念;群体为了强化认同的边界和独特性,也会有意识地传承和弘扬群体的独特价值。新闻传播通过建构社会认同,为人文价值传承创造了内在需求和社会动力。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角色差异

在价值传承与认同建构的互动中,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功能。传统媒体倾向于单向传播和整体性认同的建构,价值传承具有明显的社会导向;新媒体则更强调互动参与和碎片化认同的形成,价值传承呈现出更多的个体选择特征。

传统媒体通过权威叙事和整体框架,为社会提供统一的意义系统和认同基础。例如,《新闻联播》等传统新闻节目,通过标准化的叙事方式和精心选择的报道内容,强化社会主流价值和集体认同。这种传播方式有利于形成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性。

新媒体则通过多元叙事和互动参与,为社会提供多样化的意义资源和认同选择。微博、微信、抖音等平台上的新闻传播,允许公众自主选择、创造和分享内容,形成更加多元和个性化的认同表达。这种传播方式有利于满足社会成员的差异化需求,增强社会的包容性和活力。

这两种媒体形态在当代社会中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功能互补的关系。传统媒体提供价值的权威诠释和认同的核心框架,新媒体则实现价值的个性化诠释和认同的多元表达。两者共同构成一个多元、有弹性的意义生态系统,使人文价值在保持核心连续的同时,获得与时俱进的生命力。

技术赋能下的互动新趋势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人文价值传承与社会认同建构的互动提供了新的可能。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应用,使新闻传播能够更加精准地感知社会需求,更加有效地传递文化价值,更加深入地建构社会认同。

算法推荐技术的应用,使新闻媒体能够根据用户的兴趣和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内容服务,增强价值传播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当然,算法应用也带来了“信息茧房”和“回声室效应”等风险,需要通过价值引导和算法优化来规避。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沉浸式技术,为价值传播和认同建构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体验场景。例如,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借助 AI 技术打造“英烈数字人”,实现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薪火新途·红色 AI+》全媒体系列报道,通过 AI 生成沉浸式打卡探馆,让更多年轻读者了解红色历史。这些技术应用增强了文化传承的直观性和感染力。

区块链等分布式记账技术的应用,为新闻传播的公信力提供了技术保障,增强了价值传播和认同建构的可信度。通过区块链技术记录新闻产品的生产和传播过程,可以使新闻传播更加透明、可信,为价值传承和认同建构奠定坚实的基础。

比较维度	传统媒体	新媒体
传播方式	单向传播，权威诠释	互动传播，多元诠释
认同形态	整体性、社会导向的认同	碎片化、个体导向的认同
价值传承	强调价值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强调价值的当代性和适用性
代表案例	《新闻联播》国庆阅兵直播	微博话题互动，短视频二次创作

表 3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互动机制中的比较

六、结论与展望

本文借助理论阐述和案例分析，探索出新闻传播学中人文价值传承以及社会认同建构之间的互动机制，该互动机制并非单纯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呈现为一种复杂、动态且双向的相互建构进程，深入理解这一机制，对优化新闻传播实践、提高文化自信以及社会凝聚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互动机制的当代启示

新闻传播在人文价值传承与社会认同建构中的互动机制，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的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视角。首先，它揭示了新闻传播不仅是信息传递的渠道，更是意义生产和社会整合的重要机制，在全球化与数字化双重语境下，新闻传播通过日常的、持续的传播实践，参与塑造社会成员的文化认同和集体认同。

其次，互动机制揭示了价值传承与认同建构的相互依存关系。没有价值内涵的认同是空洞的，难以持久维持；没有认同支撑的价值传承是无效的，难以产生社会影响力。新闻传播通过将价值传承与认同建构相结合，使价值有了承载的主体，认同有了内容的基础，实现了文化延续与社会整合的统一。

最后，互动机制揭示了新闻传播在文化传承与社会整合中的有限性。新闻传播不是万能的，其效果受到社会结构、媒介环境、受众特征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在肯定新闻传播积极作用的同时，也需要认识到其局限性，避免过度强调媒体效果而忽视其他社会机制的作用。

优化互动机制的路径选择

基于互动机制的特点和当代社会需求，优化新闻传播在人文价值传承与社会认同建构中的互动效果，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立足人民性是优化互动机制的根本前提。新闻传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回应人民关切，关照人民情感，只有扎根人民、服务人民，新闻传播才能获得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实现价值传承与认同建构的有机统一。

创新传播形态是优化互动机制的重要手段。新闻传播要适应媒介生态的变化，创新传播内容和形式，增强传播的亲和力、感染力和影响力，通过创新表达，使传统价值以现代形态呈现，增强年轻群体的认同感。

保持情感与理性的平衡是优化互动机制的关键环节。新闻传播要追求情感与理性的动态平衡，形成一种“既客观冷静又不乏人情味的新闻传播模式”。情感表达要理性化，情感导向要高尚化，情感传播要创新化，避免过度情绪化和非理性倾向。

未来研究展望

本文主要从理论层面探讨了新闻传播在人文价值传承与社会认同建构中的互动机制，未来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化：

不同媒介形态的比较研究。未来可以比较报纸、电视、网站、社交媒体等不同媒介形态

在价值传承与认同建构中的特异性作用，揭示不同媒介形态的互动机制差异。

社会结构因素的调节作用。社会结构因素如阶级、地域、教育等如何影响个体对新闻传播的价值内涵和认同召唤的接受程度，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长期效果研究。新闻传播对价值传承与认同建构的互动效应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未来研究可以通过长期追踪研究，揭示互动机制的长期效果和变化规律。

总之，新闻传播在人文价值传承与社会认同建构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在社会快速变迁和媒介深度融合的今天，充分发挥新闻传播的积极作用，促进社会的精神整合和文化遗产，是一个需要持续探索的时代课题，唯有在技术变革中坚守人文关怀，在信息爆炸中彰显价值导向，新闻传播才能更好地履行其社会文化使命，为文化自信和社会和谐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1] 强化红色记忆 传承抗战精神[DB/OL]. [2025-12-08]. <http://www.zgjjx.cn/2025-11/ef9592d71bad43/c.html>.
- [2] 张军, 于锋, 董然. 经典诵读的文化传播价值与媒体创新路径探析——以央广网“中华经典诵读大会”为例[J]. 传媒, 2025(17): 63-65.
- [3] 杜一娜, 齐雅文. 以媒体之力凝聚文化之光[N].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2024-06-18(005). DOI:10.28907/n.cnki.nxwcb.2024.001354.
- [4] 杨思忆, 肖伟光. 构建情理相融的新闻传播模式——以人民日报短视频为例[J]. 新闻战线, 2025(13): 33-36.
- [5] 国玉霞. 党报融媒建塑区域精神的情感传播探索——以辽宁日报为例[J]. 新闻研究导刊, 2021, 12(14): 54-57.
- [6] 赵远蒙. 习近平文化自信理论及其新时代价值[D]. 广州: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2020. DOI:10.27472/d.cnki.gzgdd.2020.000026.

Research on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 of Humanistic Value Inheritance and Soci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YAN Ruifeng (Янь Жуйфэн)

(Al-Farabi Kazakh National university, Almaty 050040, Kazakhstan)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 between the inheritance of humanistic valu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identity in the field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t analyzes the internal logic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of their mutual promotion.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news media, through the activation of cultural memory, story-telling narrative, and innovative expression, achieve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humanistic values. They also strengthen social identity by relying on emotional resonance, symbol construction, and ritual communication. Such interaction builds a bidirectional spiral model of "value inheritance - identity construction". Traditional media and new media present a complementary functional trend.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functions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Keywords: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umanistic value; Social recognition; Interactive mechanism

区域国别视角下的中越劳动关系法律比较研究—— 以天虹银河纺织公司为例

王晨烨*

(北京服装学院时尚管理学院, 北京 朝阳 110105)

摘 要: 本文以区域国别研究为理论视角, 聚焦中国劳动治理模式在越南法律场域中的适应性困境。通过构建“制度逻辑—文化过滤”的二维分析框架, 揭示中越两国在劳动关系法律领域存在的深层治理逻辑冲突。研究发现, 中国“效率优先”模式在越南“社会保护”框架下出现三重裂隙: 文本功能错位、程序形式虚置、价值不可通约。本文主张刚性符合核心制度、弹性保留管理流程、创造性转化文化接口, 为“一带一路”跨境劳动治理提供经验参照。

关键词: 区域国别学; 劳动法; 中越比较; 中国纺织企业

第一章导论: 问题的提出

1.1 理论问题的浮现

当中国制造业企业将国内成熟的劳动关系管理模式移植到越南时, 一个悖论反复出现: 那些在中国被视为“规范”“高效”的管理实践, 在越南却频繁触发法律风险与员工抵抗。天虹银河纺织公司——一个在越投资达10亿美元、雇佣5000名越南员工的大型华资企业——其经历浓缩了这一困境: 年均离职率4.1%, 员工对薪酬公平性满意度不足30%, 因“家庭原因”离职者占比超45%, 因“怀孕”离职者累计达430人。这些数据背后, 不仅是管理技术层面的水土不服, 更是两种劳动治理逻辑在制度文化层面的深层碰撞。

传统比较劳动法学往往停留在法律文本的规范对照, 忽视制度运行的“嵌入性”特征, 即任何法律规则的有效性都依赖于其植根的政治经济体制、社会文化结构与历史路径依赖。区域国别研究的要义, 正在于揭示这种“情境合理性”而非“规范普适性”。本文的核心关切是: 中国以市场效率为导向的劳动治理模式, 在遭遇越南以国家干预为特征的法制框架时, 其冲突的生成机制与演化路径为何? 这一问题的理论价值在于, 它超越了简单的“法律差异描述”, 指向跨境经济活动中制度移植的适配性难题; 其实践意义则在于, 为在越华资企业提供理解冲突本质的认知地图, 而非零散的技术性建议。

1.2 分析框架的构建

为回答上述问题, 本文构建“制度逻辑—文化过滤”的二维分析框架:

制度逻辑层: 识别两国劳动法律体系背后截然不同的治理哲学。中国《劳动合同法》虽以保护劳动者为名, 实则保留了企业较大的缔约弹性与解雇空间, 其深层逻辑是“发展主义”——通过降低企业用工成本促进经济增长。越南《劳动法》则体现“社会保护主义”, 以国家强制力确保劳动者的社会安全, 限制市场机制的过度渗透。

文化过滤器层: 探讨越南本土文化如何筛选、诠释和改造外来法律规则。越南的高权力

作者简介: 王晨烨(2003-), 男, 硕士研究生。

通讯作者: 王晨烨

距离文化使员工习惯权威但又期待父权式关怀；其集体主义传统使“家庭责任”成为离职的正当性理由；其对程序正义的独特理解（重实体轻形式）导致书面合同效力低于口头承诺。

1.3 研究方法 with 案例选择

本文采用“批判性案例研究法”，不以统计代表性为目标，而追求理论典型性。天虹银河纺织公司具备两个典型特征：（1）规模典型性，作为中越产能合作的标杆项目，其制度冲突具有放大效应；（2）行业典型性，纺织业劳动密集型特征使劳动关系矛盾更为尖锐；

第二章制度逻辑层：两种劳动治理哲学的分野

2.1 中国模式：“发展主义”导向的弹性治理

中国劳动法律体系形成于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其内核是平衡“劳动力市场化配置”与“社会稳定维护”的双重目标，但前者往往占据主导。这种弹性体现在四个制度支点：

（1）劳动合同的“形式强制、实质宽松”：虽要求书面形式，但对“劳动关系”认定采“从属性”实质标准，允许劳务派遣、业务外包等灵活用工形式存在。企业可通过合同期限设计规避无固定期限义务，司法实践中对“连续订立”的解读也倾向于宽松。

（2）工资决定的“市场主导、底线干预”：政府仅设定最低工资标准，允许企业自主决定薪酬结构，工资增长依赖个体谈判。这赋予企业极大的成本调控空间。

（3）工会功能的“整合而非对抗”：工会组织受企业管理层领导，主要承担福利发放、文体活动职能，集体协商多为“走过场”。这种制度设计将劳资矛盾内化于企业管理层，避免外部化冲击。

（4）争议解决的“行政主导、司法谦抑”：劳动仲裁前置且时效长达一年，政府调解优先，法院对企业管理自主权保持克制。违法解雇赔偿金 2N 虽有威慑，但劳动者举证困难。

这套制度之所以在中国有效，因其与“GDP 锦标赛”的地方政府激励机制、劳动力供给过剩的市场结构、以及“吃苦耐劳”的文化传统相匹配。但当天虹纺织将其移植到越南时，其制度根基不复存在。

2.2 越南模式：“社会保护”导向的国家干预

越南劳动法律体系承袭法国大陆法系，但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注入了强烈的国家干预色彩，整体上仍坚持“社会保护优先”原则：

（1）劳动合同的“国家监制、限制自治”：劳动部提供标准合同范本，企业不得随意修改核心条款。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强制转换（两次固定期限后必须转）剥夺了企业的续约选择权。劳务派遣被严格限制，仅允许临时性、辅助性岗位使用。

（2）工资决定的“国家指导、强制协商”：政府每年根据通胀与经济增长调整最低工资。

（3）工会组织的“国家支持、相对独立”：越南工会经费大部分来自财政拨款，工会主席虽在企业领取报酬，但任免需上级工会批准，具有一定独立性。

（4）争议解决的“司法介入、限制解雇”：劳动法庭独立于普通法院，法官由劳动部推荐。对解雇争议，企业需承担举证责任。无固定期限员工被解雇后，可起诉要求恢复劳动关系而非仅金钱赔偿，这对企业是致命威胁。

这套制度的有效性依托于越南“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传统——国家通过法律授权工会、法院等社会组织参与治理，而非直接介入。但也因此产生官僚化、效率低下等问题，导致外资抱怨“法律不稳定”。

2.3 治理逻辑的不可通约性

两种制度的核心冲突在于“自主权”与“安全权”的价值排序。中国模式假定企业与员工可

通过市场博弈实现效率最优，法律应减少干预；越南模式则认为劳资力量天然不平等，国家必须介入矫正市场失灵。

这种不可通约性导致天虹纺织的治理困境：企业试图以“效率”为由实施弹性工时，越南法律却以“安全”为由禁止；企业希望保留薪酬决定自主权，越南法律却要求强制协商；企业期待工会成为“管理助手”，越南法律却赋予工会“制衡者”地位。这不是简单的法律技术差异，而是两种发展哲学的根本对立。

第三章文化过滤层：越南本土对法律的再诠释

3.1 法律文本与实践的裂隙

越南社会普遍存在“法律在纸面上，生活在习惯中”现象。劳动法律的实施效果，取决于其如何被越南的文化传统、社会网络与政治结构所过滤。

（1）儒家伦理的筛选：越南虽属法国法系，但儒家“父权制”伦理深刻影响劳动关系认知。员工将管理者视为“大家长”，期待其承担超越法律的家庭责任。天虹纺织的离职访谈中，员工反复提到“公司不关心我的家庭困难”，这种抱怨并非指向法律权利，而是道德期待落空。当企业仅按法律最低标准支付产假工资时，越南员工认为其“不道德”，进而质疑其“合法性”。

（2）关系网络的优先性：在越南，“人情”（tình cảm）往往优先于合同权利。员工更愿意通过“托关系”而非正式申诉解决争议。天虹纺织虽有申诉渠道，但68%的员工表示“从未有机会向上级反映问题”，因为他们默认“说了也没用”，宁可私下找组长“说情”。这种文化过滤使法律设计的程序正义失效。

（3）国家庇护主义的期待：越南员工普遍认为“国家应该保护我们”，将个人诉求政治化。当企业违法时，员工首先想到的不是仲裁诉讼，而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甚至组织停工向政府施压。2018年胡志明市某中资纺织厂因加班费纠纷引发200人停工，员工打出“请政府为我们做主”的横幅，清晰体现了这种“国家依赖型”法律文化。

3.2 天虹纺织的文化误读

天虹纺织的管理失败，根源于对越南文化过滤机制的误读：

误读一：将“年轻劳动力”等同于“可塑性强”。企业认为25岁以下员工（占59.4%）更易于接受中国式管理，实则年轻员工虽无既有经验，但对“公平”更敏感。社会比较理论在此呈现代际差异：年轻员工通过社交媒体快速获知行业工资水平，对不公耐受度更低。

误读二：将“低学历”等同于“法律意识淡薄”。初高中学历员工虽不理解法律条文，但对“程序正义”有直觉判断。当75%的员工表示“未参与薪酬制定”，他们感知的不仅是信息不透明，更是尊严受损——越南文化高度重视“被咨询”（được hỏi ý kiến）的象征意义。

误读三：将“工会缺失”等同于“管理便利”。企业刻意弱化工会，以为可减少牵制，实则剥夺了员工“体面表达不满”的渠道。结果不满以“集体旷工”“春节后失联”等破坏性方式爆发，成本更高。

3.3 文化过滤下的法律变形

在越南文化过滤下，劳动法律发生三重变形：

（1）个人权利集体化：越南员工极少以个人名义起诉，多通过“集体请愿”施压。天虹纺织2018年春节后55人未返岗，实质是未组织化的集体行动。这种变形使越南《劳动法》的个人争议解决机制空置，集体争议机制又因无工会而失灵，形成制度真空。

（2）法律诉求道德化：员工提出诉求时，不援引法律条款，而诉诸“道义”与“人情”。如怀孕女工离职，不主张法定医疗期，而称“公司不体谅我的难处”。企业若仅以法律抗辩（如

“已支付法定产假工资”),无法平息争议,必须附加“人道补偿”才能和解。

(3) 国家角色中介化:员工不直接对抗企业,而是寻求国家介入。劳动监察部门因此成为实际上的“调解者”而非“执法者”。天虹纺织 2017 年被监察警告后,选择“走关系”而非整改,正是适应了这一变形逻辑。

第四章建议与总结

5.1 建议

企业层面:放弃母国经验直接移植,转向“情境化合规”。需在工资、工时等核心领域严格遵守东道国法律,同时在管理文化中融入本地伦理期待(如父权式关怀与程序参与感)。

政策层面:中越双方可共建法律对话平台,推动劳动标准互认与争议解决机制协同,降低跨境制度摩擦。

学术层面:未来研究可延伸至其他“一带一路”国家,比较不同法系与传统文化下劳动治理的适配路径,深化制度移植理论。

5.2 总结

本文通过构建“制度逻辑—文化过滤”的二维分析框架,系统揭示了中国劳动治理模式在越南法律场域中的结构性适应困境。研究发现,中越两国在劳动治理哲学上存在根本性分歧:中国以“发展主义”为导向,强调市场效率与契约弹性;而越南奉行“社会保护主义”,注重国家干预与劳动者权益保障。这一制度逻辑的差异在劳动合同、工资协商、工会角色及解雇保护四个关键维度上形成张力,导致在越华资企业陷入“合规悖论”——既无法延续母国管理经验,又难以完全融入东道国法律体系。

进一步分析表明,制度冲突在越南独特的文化语境中被加剧与重塑。儒家伦理下的父权期待、关系网络中的“人情”逻辑、以及民众对国家庇护的强烈依赖,共同构成一套文化过滤机制,使法律在实践中发生三重变形:个人权利集体化、法律诉求道德化、国家角色中介化。天虹纺织的案例表明,企业对越南文化逻辑的误读——如将年轻劳动力等同于“可塑性”、将低学历等同于“法律意识淡薄”——进一步放大了管理失效,导致劳动关系在形式合规与实质冲突之间持续紧张。

本研究对“一带一路”背景下跨境劳动治理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启示。企业层面需超越技术性合规,走向“制度—文化”双维适配,在尊重东道国法律刚性约束的同时,积极回应其文化伦理期待。政策层面应推动中越劳动标准的对话互认,建立跨境争议协同处理机制。学术层面则需进一步拓展区域国别视角,在更多制度—文化组合中检验劳动治理移植的适配路径,深化对“制度嵌入性”与“文化能动性”之间复杂关系的理解。

跨境劳动治理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法律条文的对接,更依赖于对制度逻辑的深刻理解与文化情境的真诚共情。唯有通过“制度本土化再造”,才能实现从合规生存到协同发展的跨越。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12 修订)[Z]. 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2.
- [2] 马洪波. 工业企业绩效管理方法及方法研究[D].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12.
- [3] 安光辉. 天津 A 公司人力资源规划研究[D]. 西南交通大学, 2014.
- [4] 边剑锋. 电力公司人力资源战略规划研究[D]. 长江大学, 2013.
- [5] 常慧雯. 桂林旅游企业人力资源现状与对策研究[D]. 广西师范大学, 2014.
- [6] 颜萌慧. 中资企业在越南人才本地化研究[D]. 江南大学, 2010.

- [7] 孙瑜.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对工作绩效影响的跨层次研究[D]. 吉林大学, 2015.
- [8] 梁丹. IT 行业 D 公司人力资源规划研究[D]. 大连理工大学, 2013.
- [9] 靳志柏. 甘肃电信绩效管理改进的对策研究[D]. 兰州大学, 2009.
- [10] 孙垠. 知识型员工绩效考核体系设计研究[D].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0.
- [11] 和岩. 知识型员工的忠诚度对工作绩效的影响研究[D]. 河北经贸大学, 2016.
- [12] 周米雪. H 旅游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优化研究[D]. 西南交通大学, 2017.
- [13] 丁越兰, 霍甜. 员工培训、忠诚度与离职倾向关系研究[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4(6): 77-82.
- [14] 陈传凤. S 公司员工激励机制优化研究[J]. 山东师范大学, 2018(1): 66-76.
- [15] 田刚. 美日人力资源管理比较及对我国中小民营企业的启示[J]. 职业时空, 2006(1): 34.
- [16] Adams JS.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inequity[J].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3, 67: 422-436.
- [17] Little G. People and profit[J]. New Zealand Manufacturer, 1998(6): 24-25.
- [18] Bandura A.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M].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86.
- [19] Greenberg J. Organizational justice: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0, 16(2): 399-432.
- [20] Blyton P, Turnbull P. Reassessing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 [21] Kroon B, Freese C. Can HR practices retain flexible workers with their agenc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power, 2013, 34(8): 899-917.
- [22] Schrag B. The moral significance of employee loyalty[J]. 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 2001, 11(1): 41-66.
- [23] Ehrlich CJ. Creating an Employer-Employee Relationship for the Future[J].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1994, 33(3): 491-501.
- [24] Neck CP, Manz CC. Thought self-leadership: The influence of self-talk and mental imagery on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92, 13(7): 681-699.
- [25] DeGroot T, Kiker DS. A meta-analysis of the non-monetary effects of employee health management programs[J].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003, 42(1): 121-128.
- [26] Gagnon MA, Judd HM. Employee strategic alignment at a wood manufacturer: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using lean manufacturing[J]. Forest Products Journal, 2003, 53(11): 56-63.
- [27] Prussia GE, Anderson JS, Manz CC. Self-leadership and performance outcomes: The mediating influence of self-efficacy[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98, 19(5): 523-538.
- [28] Kochan TA, Osterman P. The Mutual Gains Enterprise: Forging a Winning Partnership Among Labor, Management, and Government[M].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4.
- [29] Gillenson ML, Sanders TC. Employee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Applying the Concept of Personalization to U. S. Navy Sailors[J].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2006, 49(10): 87-90.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abor Relations Laws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from a Regional and National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Tianhong Galaxy Textile Company

WANG Chenye*

(School of Fashion Management,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Chaoyang, Beijing 11010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dopts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and national studies, focusing on the adaptive challenges of China's labor governance model within the Vietnamese legal context. By constructing a two-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institutional logic-cultural filtering," it reveals the deep-seated conflicts in governance logic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in the field of labor relations law. The study finds that China's "efficiency-first" model exhibits three types of fissures within Vietnam's "social protection" framework: functional dislocation of texts, procedural formalism, and incommensurability of values. This paper advocates rigid compliance with core institutions, flexible retention of management processes,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interfaces, providing empirical reference for cross-border labor governance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Keywords: Regional and national studies; Labor law; China-vietnam comparison; Chinese textile enterprises

慈悲的性别重构：观音菩萨女性化及其崇拜现象的文化逻辑

秦臻宇* 赵梓君

(珠海科技学院, 广东 珠海 519040)

摘要：父权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性别体系中的一种显性特征而存在，往往会掩盖体系内部的其他维度。宗教信仰实践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折射，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性别体系的新视角。观音的性别转变与女神崇拜现象，可被视为挑战传统性别叙事的切入点。本文以宗教学与性别研究为基础，系统考察了观音从男性到女性的性别转变演变轨迹。通过分析文献史料、造像艺术及民间故事等材料，揭示了观音性别重构背后的诸多因素。同时尝试为理解中华文化中性别符号的建构，以及在宗教与社会性别互动中的信仰实践，提供一种新的阐释视角。

关键词：观音女性化；女神崇拜；宗教本土化；性别符号

一、引言

在中国神佛体系中，观音菩萨是呈现双性同体特征的宗教神祇。观音（观世音）代表了大慈大悲的无上力量的菩萨 Avalokiteśvara（阿婆卢吉低舍婆罗），他/她的名号汉译为遍观世间声音，简称观音或者观世音，是中华文化中的著名神祇。这个慈悲女神在佛教世界信徒众多，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她的信众遍及亚洲，甚至在日韩等地区仍沿用观音去称呼此菩萨。^①观音信仰随佛教从印度东渐而来，通过文化传播的转译其神格与信仰在跨文化的对话中完成独特转化。观音形象的转变是观音中国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初唐之时，观音的艺术形象开始出现女性化趋势，这一特征在晚唐尤为明显，宋元时期观音的女性形象成为主流。

观音菩萨的性别重构是观音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在观音性别之变的原因、时间、意义等问题上长久以来都引来许多学者的兴趣，其中不少经典之论是从宗教学和艺术学角度进行解读，这些所关注的材料多为佛教典籍、灵验故事、艺术造像等，因此这些论述尚有拓展思考的可能。

观音菩萨性别转变的研究与女性主义兴起密不可分。亚洲移民在二战后给西方带来新的文化，越来越多的西方民众开始接触到佛教，并对观音广泛地神力和形象产生兴趣。一方面是观音广泛存在于佛教典籍，另一方面就是女性主义学家对女神研究的深入挖掘。他们将视角放在了女神这一宏大的概念之下，无论是基督教、印度教、亦或是佛教。^②其次观音的性别之变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在一些地区观音仍是作为男性神祇来供奉，在敦煌现存的壁画中也能清楚地找到观音早期为男性的证据。^③观音的神格形象是现实世界人类的情感反映，

作者简介：秦臻宇（1994-），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宗教人类学。

赵梓君（1994-），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学。

通讯作者：秦臻宇

① 于君方：《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上海：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11页。

② 于君方：《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上海：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12页。

③ 于君方：《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上海：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11页。

也是宗教本土化的表现,性别之变就当情当时而言较为复杂,此中真意并非一两学科所指,因为宗教艺术形象的表达不是为了还原真实,而是为现实服务。

在中国传统性别文化中,父权制构成了不可忽视的历史事实,但如果简单地将其归结为单向度的权利结构,会陷入本质主义认知结构的困境,所以这种情况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中华文化中性别关系的全部内涵。文化性别作为社会建构的复合系统,其内涵不仅体现在上层建筑中,也根植于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信仰中。列维-斯特劳(Claude Levi-Strauss)的神话结构主义理论表明,宗教叙事作为集体无意识的文化编码,往往承载着特定文明对宇宙秩序与人性本质的终极想象。慈悲女神观音的神格变化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文化性别的新窗口。自元明以降,理学作为儒家的重要学说成为我国占据主要地位的意识形态。男权在儒家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宋代出现的大量的女性观音形象,也在说明女神崇拜的“小传统”仍在男权社会中广泛地影响着社会。这种信仰层面的性别赋权机制,暗示女性在传统的性别框架中还存在着超越制度性的协商空间,不能将中国的文化性别体系理解为男性的绝对权威和女性的绝对卑微。^④本文通过对观音性别变化的分析,试图分析出性别之变背后的女性崇拜现象及其文化逻辑。

二、观音性别变化的过程

在以往的观音研究中,多有涉及观音性别之变,主流观点认为观音在唐代已经完成性别转换。如于君方所指出的:“观音在东晋以迄北周的造像上,虽有多种面貌(如十一面观音、千手千眼观音等),但仍以男性为主。大乘佛学认为男女只是色相,而观音本为无相、超时空的菩萨,但是这些手执柳枝和净瓶的观音仍经常被塑造成英俊王子的形象。到了唐代,观音却完全变成了女性。不论是在神迹故事、俗文学,或在进香歌与通俗画当中,观音的女性化和本土化的情形同时出现。”本小节将通过综合分析不同时期的造像、绘画和文献资料,揭示观音形象由男女共存到女性为主转变的过程。一方面观音性变的过程蕴含着背后复杂的社会、文化、政治等因素,另一方面根据现存的资料和文献不难发现观音造像和文献资料记录中的变化并非同步的,所以讨论变化过程要比追溯变化时间对本文更加有益。

从典籍到艺术形象,观音在隋唐之初多为男性。隋末唐初的佛教典籍多将观音塑造成男性的形象,无论是《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善男子的描述,还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勇猛丈夫,还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中佛陀称为善男子的观音。^⑤即使在观音显灵济世之时,也是化身僧人出现。如唐代《冥报记》中监察御史卢文励患病后,观音化身沙门前来救治。这些灵验故事和典籍都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观音在公众心中的男性形象。

虽然男性形象为主流,但此时艺术表现中的男女形象已有重叠,观音的艺术形象已经出现了女性的特征。陕西慈善寺石窟的胁侍观音像头束高髻,体态呈现出女性化的特点,但平坦的胸部又在强调其男性的本质,呈现出此时观音性别的模糊与矛盾的过渡状态。^⑥此种女性形象萌芽也出现在敦煌石窟的初唐观音画上,从220窟的绀青长发、罗裙透体,到57窟面容秀雅,姿态婀娜。但同一时期的45窟观音像保留胡须,男女共像,展现此时观音的性别共存的复杂状态。这种矛盾也与观音在显身普渡时根据实际进行幻化的特性有关。《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的观音菩萨有“三十三”身相,面对女性危难可幻化女性,所以这一时期的观音艺术形象有着男女共存,性别模糊的矛盾状态。

盛唐及宋的观音女性化逐渐成为主流。灵验故事、笔记小说此类文献越来越多地出现观音化身女性的记载。因慈悲大德被时人誉为观音的慈和比丘尼,其墓志提到的水月二字,为水月观音的创造提供了蓝本。焦杰指出,宋元以后的观音形象都是在唐代水月观音的基础上

④ 施传刚:《西王母及中国女神崇拜的人类学意义》,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119页。

⑤ 焦杰:《性别之变:唐代中土地区观音女性化过程的考察》,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5年,第3页。

⑥ 焦杰:《性别之变:唐代中土地区观音女性化过程的考察》,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5年,第3页。

进行的创作。^⑦水月观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一时期，文献记载的观音幻化女性传法的记录增多，虽有婚姻情景，但仍保持贞洁，说明在世俗伦理中，观音的女性形象逐渐定型，但未脱离伦理社会的道德规范，表现出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为统治服务的潜在适应性特征。从造像而言，此时的观音女性化特征日趋明显，龙门石窟浅溪寺的观音胸部微隆，端庄文雅。陕西千阳的唐代窖藏鎏金观音像，女性特征更为突出，尽显女性之美。

观音的艺术形象经历了从男性为主到男女共存再到女性为主的复杂渐进的历史演变，不仅体现了观音艺术风格之变，也揭示了佛教在发展中为社会服务的调节能力和为自身发展的适应能力。观音菩萨女性化现象的背后既是政治需求，又是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需求，也是社会观念多方因素推波助澜的结果。

三、观音女性化的历史必然性

在对观音性别变化的讨论中，不少研究者尝试从造像的外形入手，此举虽有据可循，但仅仅依靠艺术形象却有失偏颇。本部分将先从观音作为神祇功能入手，为观音性别变化的原因作为补充。

宗教作为人类历史发展中长期并持续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其非理性和超现实性一直与人类社会的多个方面产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宗教并非静态存在，而是在社会变迁中会不断动态演变，但宗教的核心——信仰——神格不会消失。技术进步能够削弱神格的力量，但神的魅力一直保持着对信众的强大吸引力。缪勒指出，“一切宗教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承认有神灵的存在。”^⑧观音作为影响力巨大的神祇，在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众神之中，颂名救难，赐福送子的神力也为吸引众多信徒提供了帮助，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佛祖本身。观音的梵文名称 Avalokiteśvara，音译为阿缚卢枳低湿伐罗，通常被认为是阳性词语，但尾音长读就变成了女性词语，所以有人指出：“阿缚卢枳低湿伐罗表面上是男性神，骨子里却是女性神。”这种超越性别的混淆神性，在创造形象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性别选择，但在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中，女神具有男神截然不同的神性，观音的诸多灵力被认为是本应属于女神的功能，所以受观音神性影响，信众在性别选择中逐渐向女神倾斜。这就是为何佛教在观音性别共存的现实中会选择女性形象。观音并没有因性别转换为女神之后而降低神格，反而成为佛教中香火最旺的神祇。广泛的观音崇拜也从侧面表明信众对于女神崇拜有广泛的存在。

四、性别之变的三个成因

（一）佛教与中国社会的双向选择

为了迎合中国独特社会文化和信众的心理需要，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中不断进行着本土化与世俗化的动态演变。观音作为救苦救难的慈悲化身，女性化的调整正符合传统文化中对于慈悲、贤良这种美德的性别定义，以及公众对于出现贴近普罗大众，便捷的拯救民间疾苦的宗教形象的迫切需要。观音的女神形象和颂其名就能被救助的方式，不但易于被民众接受与信仰，更能增强佛教整体在中国的影响力。

（二）社会性别意识的变革

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发展快速的经济环境，让女性角色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社会地位有所变化。女性不同于男性的审美标准、价值观念、消费能力，以及宗教和社会对于女性特质与信仰香火的认可和需要，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观音女神形象的塑造。女神观音既能增强宗教领域中女性信众对于相同性别形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能满足女性信众对于女性神灵力量的肯定，以及对于自身未来生命彼岸归宿的信心，表明宗教在演变中

⑦ 焦杰：《性别之变：唐代中土地区观音女性化过程的考察》，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5年，第2页。

⑧ [英] 麦克斯·缪勒著，金泽译：《宗教的起源与发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6页。

与社会性别意识的互动和融合。

（三）政治因素的推动

古正美先生认为：“若没有武则天在造像史上的突破，在造像上还是不能出现女观音的。”这个观点显然是有依据的。现存的多种文物材料证明观音女性化在武则天时期达到高峰。这种情况并非偶然，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她的统治影响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为了摆脱李唐政策巩固其统治地位，以及宣扬女性地位和权威，武则天的崇佛运动对观音形象女性化起到了重要推动。佛教界也顺势而为，通过加强与世俗权威的响应，吸引女性信众参与佛教活动，记录塑造各种符合时势的观音女性形象，进一步促进观音女性化的进程。卢舍那大佛之后出现的艺术形象都越来越多地摆脱异域风格，与中土慈祥女性画上等号。

五、观音女神崇拜的文化逻辑

（一）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挑战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对于女性的伦理标准。任何生产关系都要在这套伦理规范中运行，观音虽为超人性神灵，也不能独立于当时社会女性的道德之外。观音的慈悲济世传法事迹以及女性信众的崇拜行为，其中蕴藏着女性独立的成分，这些仍能从一些信息中窥见一二。

观音的信仰和崇拜在农业社会的广泛传播，拥有大量的女性信众，在男耕女织的传统文化中女性更多的是担负着内闱之责，但在必要与闲暇时她们活跃于佛教典礼，或请奉观音于家宅为家庭或者个人祈福。女性被赋予“慈爱包容”等道德标签，而观音大慈大悲的品格恰好与这种文化期待形成共振。在生活中她们独立承担了大部分的仪式活动建立与观音菩萨的情感联系。这正与李亦园先生所言相对应：“大传统士绅阶层的祖先崇拜仪式着重于‘宗祠的崇拜’，而小传统一般民众则关心于‘厅堂的崇拜’，因此，前者是男人的责任，而后者则大多由妇女承担。”因此，女性信众对于女性化的观音形象保持情感寄托的同时也已经迈出独立萌芽的一步。

（二）观音崇拜的两个特点

观音作为备受推崇的女神，从佛教西方三圣最终成为世俗化的单独供奉独立主神，其信仰与崇拜表现了中国女神神格独立的显著特点。为了方便理解中国女神的独立性，我们不妨从基督的圣母崇拜上进行观察。女神崇拜源于人类共生的心理需求，早于宗教传统。基督教曾尝试用圣母玛丽取代各地的女神，但是此举遭到了神学家的激烈反对，反对派聂斯托里乌斯将圣母称之为 Christotokos（意为基督的生育者），表明圣母玛丽仅是生育基督人性的角色。虽然圣母最终成为基督世界的唯一女神，但从这一辩论不难发现，圣母完全是因为生育圣子而被推上神坛，并没有独立的神格。而她的神功终极目的也是劝诫信徒信仰天主。^⑨反观观音，她的神功造就了她神格的独立，信众崇拜是因其神功而不是为了信仰更高一级的权威。所以独立性是中国女神崇拜的一大特性。

此外，观音女神崇拜也伴随着明确的功利性。观音带给信众的不仅是心灵的解脱，而是相信信仰能带来的拯救。信奉观音女神既不要皈依佛门，也不需要参透佛法奥义，而是坦白地用虔诚和香火换取神功的庇佑。这种现象其实不单呈现在观音崇拜现象上，也应用于大部分的求神朝拜情景，所以不少国人不加区别地见神就拜。

六、余论

原始佛教对偶像崇拜持排斥态度，这与观音信仰在世俗化转化过程中产生的巨大影响力

^⑨ 施传刚：《西王母及中国女神崇拜的人类学意义》，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122页。

形成了矛盾。这一现象不仅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强大影响力,也揭示了中华文化语境下性别符号的建构逻辑。不难发现,中国女性神祇的信仰实践通常呈现出“神格与性别”的立体关系,这种关系更便于和民众建立情感联结。此外,女性神祇所拥有的神力,如送子、疗愈、护佑等,这与女性身份的象征性关联,也更易被大众认可和接纳。正是如此,使得观音得以突破东传过程中的性别桎梏,成为一种跨越社会阶层与地域界限的情感寄托。

原始佛教中的观音传入中国后,经历了创造性的转化:其形象从威严的男性菩萨,逐渐演变为兼具世俗性与超越性的女性形象。这一转变并非偶然,而是唐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女性宗教参与度的提升以及民间信仰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敦煌壁画中盛唐时期的观音造像,呈现出丰腴柔美的特征;到晚唐及宋,“白衣观音”形象的普及,标志着该神祇彻底完成了从天竺原型到中国本土符号的蜕变。

从文化性别理论视角观之,观音信仰的盛行,为我们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性别问题提供了独特视角。在“父权制”的文化格局下,对女性神祇的崇拜不仅是对主流性别秩序的补充,更是女性信众通过宗教仪式开展的一种权利抗争。这种微观层面的回应,在地方志、民间传说乃至节庆仪式中均有体现。观音女性化不仅是宗教艺术方面的审美选择,也是社会性别观念的体现。这一性别符号的建构,并非简单的对性别重新定义,而是结合本土实际对超越性力量进行的创造性转化,这也暗示出社会对女性身份的认同。

本文的探讨仅触及冰山一角,观音女性化现象所蕴含的宗教人类学、艺术史与性别研究等交叉维度,仍有待后期展开深入研究。未来的研究或许可结合物质资料、口述史与仪式实践等多方面,有望为理解中国宗教文化的独特魅力提供更为多元的解读空间。观音女性化及女神崇拜现象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其作为宗教本土化案例的典型性,更在于它为我们理解文化传统中性别符号的变迁与建构,提供了生动的历史注脚。

参考文献:

- [1] 梁娟娟,谢志斌.生活、艺术、宗教:探究“观音女性化”问题的三个维度[J].普陀学刊,2023,(01):94-108+300-301.
- [2] 曾丽容.论洗夫人信仰的女神崇拜情结[J].西部学刊,2021,(16):135-137.
- [3] 刘明菊.从妈祖崇拜看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女神崇拜[J].世界宗教文化,2021,(01):131-138.
- [4] 焦杰.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妇女崇佛与观音造像的女性化[J].平顶山学院学报,2017,32(04):102-105.
- [5] 焦杰.性别之因:唐代中土地地区观音女性化的性别因素考察[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5,36(12):1-8+81.
- [6] 施传刚.西王母及中国女神崇拜的人类学意义[J].青海社会科学,2011,(01):119-124.
- [7] 于君方著,陈怀宇、姚崇新、林佩莹译.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年.
- [8] [英]麦克斯·缪勒著,金泽译.宗教的起源与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The Gender Reconstruction of Compassion: The Cultural Logic of the Feminization of Guanyin (Avalokiteśvara) Bodhisattva and the Phenomenon of Its Worship

QIN Zhenyu*, ZHAO Zijun

(Zhuha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uhai, Guangdong 519040, China)

Abstract: Patriarchy exists as a dominant feature in the gender syste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it often obscures other dimensions within this system. Religious belief practices, as a reflection of social ideology, provide us with a new perspective to re-examine the gender system. The gender transformation of Guanyin (Avalokiteśvara Bodhisattva) and goddess worship can be regarded as an entry point to challenge the traditional gender narrative. Based on religious studies and gender studi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of Guanyin's gender transformation from male to female. By analyzing materials such as historical documents, textual records, sculptural art, and folk tales, it reveals various factors behind Guanyin's gender reconstruction. Meanwhile, this paper seeks to provide a new interpretive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symbols in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belief practices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eligion and social gender.

Keywords: Feminization of guanyin; Goddess worship; Religious localization; Gender symbols

数字时代红色出版物的交互设计与版权保护机制探究

杨淳凯 张安博文 陈政歧 商旺 孙明昊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52)

摘要: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 红色出版物在传播形式上遇到新的机遇和挑战。本研究聚焦于数字环境下红色出版物的交互设计优化与版权保护机制构建, 旨在提升其在青年群体中的影响力与传播效果, 同时防范数字化传播可能带来的版权风险。通过对目前红色出版物在内容呈现、用户体验、版权管理等方面现状的分析, 结合数字媒体理论和版权保护相关制度, 提出交互设计和技术防护相结合的双路径。交互设计上突出以用户为中心, 提升内容的可读性、互动性和情感共鸣; 版权保护上考察区块链、数字水印等技术在防非法传播和篡改上的可行性。实践证明合理的交互设计可以有效的提高用户的参与度, 多层次的版权保护有利于内容创作者的合法权益。研究成果为红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转化与可持续传播提供了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未来可进一步结合人工智能等技术, 拓展红色出版物在智慧阅读与跨平台传播方面的可能性。

关键词: 红色出版物; 交互设计; 版权保护; 数字时代; 文化传承

1 引言

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环境。2025年移动互联网、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普及, 给红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展示和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条件。红色出版物是传承革命精神、弘扬主流价值观的重要载体, 其传播形式和接受方式也面临着转型的压力。传统的以纸质媒介为主的红色读物在青年群体中吸引力不大, 急需借助数字交互设计来提高内容的可读性、互动性和情感感染力。

与此同时数字环境还带来了版权保护方面的严峻挑战。网络环境下内容的复制、传播、修改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红色出版物数字化之后, 很容易出现非法转载、篡改、盗用等情况, 既侵犯了原创者的权利, 又可能使红色内容的真实性受损、泛化。因此, 在推进红色出版物数字化转型的同时, 必须同步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版权保护机制, 保证内容传播的规范性、安全性、可持续性。在此背景下, 本研究聚焦于数字环境下红色出版物的交互设计优化与版权保护机制构建。主要探索如何通过以用户为中心的交互设计提升红色内容在青年群体中的接受度与影响力, 使红色文化在数字媒介中焕发新的活力。致力于创建多层次、全链条的版权保护体系, 利用区块链、数字水印等前沿技术来防范数字化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版权风险。本研究采用交互设计和版权保护两种途径, 为红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转化与创新传播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促进红色出版物在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作者简介: 杨淳凯, (2004-), 男, 本科, 研究方向为数字媒体技术。
张安博文 (2006-), 女, 本科, 研究方向为编辑出版学。
陈政歧 (2005-), 男, 本科, 研究方向为数字媒体技术。
商旺 (2007-), 男, 本科, 研究方向为数字媒体技术。
孙明昊 (2007-), 男, 研究方向为数字媒体技术。

2 红色出版物交互设计与版权保护的理论与现状分析

2.1 红色出版物数字化传播的理论与特征分析

数字环境下的红色出版物的传播以传播学和数字媒体理论为交叉基础。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理念强调内容要符合用户的认知习惯和情感需求,在面向青年群体的时候,需要通过动态插画、语音交互、场景模拟等技术手段提高内容的可读性和参与感。李婷认为元宇宙等技术可以创建非常逼真的红色历史场景,让受众由“观看者”变成“体验者”,在互动中感悟红色精神^[1]。非线性、沉浸式的叙事模式打破了传统单向传播的局限,成为红色文化数字化传播的重要特点。

数字化设计可以实现传统红色内容与现代审美需求的融合,提高传播感染力^[2]。红色出版物数字化过程中内容形态多样化、传播渠道融合化是其最明显的特点。出版物不再只是文字和静态图像,它包含了音频、视频、交互程序等许多种媒介元素,是多模态的表达。传播渠道从传统纸媒向移动应用、社交平台、虚拟社区等线上空间发展,实现了跨平台分发以及即时互动,极大地扩展了受众的范围。

从接受层面来讲,数字化传播加强了受众的主动参与性以及情感共鸣。用户可以采用角色扮演、任务挑战、多线剧情选择等方式参与内容进程,通过互动来实现红色价值观的内化。邵欣彤的研究表明,红色出版物的视觉语言、版式设计对传播效果有重要影响,数字环境下的交互设计又放大了它的特点^[3]。情感体验是连接用户与内容的核心纽带,优秀的交互设计可以有效地唤起用户对于革命历史的情感认同,提高传播的深度和持久性。但是数字化传播使内容形态流动、版权界定困难。数字出版物容易修改、重组和再传播,造成原创内容与衍生版本之间界限不清。传统版权法下的“固定性”“独创性”等原则对于如何规制动态的、可交互的数字内容存在适用困境。因此,在推进红色出版物数字化传播的同时,也要重视红色出版物版权属性的特殊性和保护需求的迫切性,为后续建立相应的保护机制提供理论基础。红色出版物的数字化流传既离不开技术的加持,又离不开以用户认识、感受为主的计划设计。其特征就是内容形式的多模态整合、传播过程的交互沉浸化、接受机制的情感内化,这些特性一起构成了红色文化在数字时代实现有效传播的理论前提。

2.2 国内外数字出版物交互设计与版权保护研究现状

近些年来,国内外的学者对于数字出版物的交互设计以及版权保护展开诸多探讨,形成了各有所偏的研究脉络。国外在交互设计方面较早地将用户体验与沉浸式叙事相结合,利用多模态技术来提高内容的吸引力以及情感上的联系。又如,在欧美各国的文化遗产数字化项目里,普遍采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让人们能够扮演角色、漫游场景,从而走进历史叙事之中,从“看”变成“走”。以用户为中心的交互逻辑,给红色出版物的数字化转型提供重要参考。国内研究更重视将交互设计与本土文化语境相结合,马小强提出红色文创产品设计要遵循红色符号—用户体验、故事创设—使用情境、IP赋能—智能技术应用三条路径,强调用情境化的叙述来引发用户的情感共鸣。把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技术同红色出版物融合起来,就能创造出沉浸式的阅读体验,使年轻受众在互动中加深对红色文化的认识。梁朋飞以王村口红色古镇为例,研究基于交互叙事的数字文创产品的设计策略,其目的是通过数字存储和新的呈现方式提高红色资源的转化率。有效的交互设计既不能只依靠技术手段,也不能脱离用户的认知习惯和情感需求,而应该将红色精神深度内化。

国外有关版权保护的研究主要从技术手段和法律制度两方面入手,应对数字环境下出现的侵权风险。区块链技术由于不可篡改、可追溯的特性,被广泛应用于数字内容的版权保护和溯源。智能合约的使用使得版权授权与收益分配可以自动化,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同时欧盟等地建立跨境版权互认机制、联合执法协议,给数字出版物的国际传播提供制度保障。

国内也重视技术防护与制度建设的结合,柏忠贤认为用户新闻真实性问题难以保证确权,数字版权追溯维权难等问题现实,需要建立人机协同共识机制保障版权创审,设计激励评估机制推动数字版权经营^[6]。数字经济时代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数据权属的界定,更应该考虑到数据流通的合规办法以及规范路径,为红色出版物跨平台传播中的版权管理提供思路^[7]。需要指出的是,数字出版物版权界定在元宇宙等新兴场景下面临挑战,虚拟场景、交互程序等新型数字产品创作主体与表达边界不清,传统版权法适用性遭遇到挑战。因此目前的研究普遍提倡创建多层次、全链条的版权保护体系,把智能识别技术和协同治理机制融合起来,从而应对数字化传播所引发的结构性风险。

从总体上看,国内外研究都以用户的沉浸式体验为核心,采用技术赋能来提升内容的可及性及感染力,版权保护方面采用技术防护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的办法,应对数字环境下侵权风险。但目前的研究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国外研究虽然技术先进,但是多基于西方文化背景,设计模式要结合红色文化的特殊性进行本土化调整;国内研究多侧重个案研究,缺少系统性的框架。今后还要研究交互设计与版权保护的内在关系,探寻出一条适合红色出版物数字发展的道路。

3 红色出版物交互设计与版权保护机制的构建与实践

3.1 基于用户体验的红色出版物交互设计模型构建

构建红色出版物交互设计模型时,一定要秉持以用户为主导的设计思想,把青年群体的认知特点,情感诉求同红色文化的精神实质融合起来。该模型主要利用系统化的设计方法来提高数字红色出版物的可读性、互动性以及情感共鸣,从而提升其对青年的吸引力以及传播效果。模型构建要从用户认知、交互叙事、技术赋能三个方面来展开,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用户认知层面是模型构建的开端,要全面顾及青年用户的阅读喜好和认知特点。数字红色出版物不能单向灌输,应该用平等对话的互动方式来代替,利用动态插图、语音讲解、触控反馈等适合儿童的技术手段,降低理解门槛,引导用户主动去探索内容。正如郭熙所研究的那样,利用“元宇宙”的沉浸式体验以及高度的交互性,可以创建出逼真的红色历史场景,使用户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参与^[8]。参与感可以有效地激发用户对于红色历史的好奇心与认同感,为深度互动打下基础。

交互叙事层面是模型的主要部分,注重利用非线性、多分支的叙事方式加强内容的情感感染力。设计者可以参考梁朋飞提出的数字文创产品设计策略,把红色故事分解成叙事文本层、数字媒介层、交互体验层和情感价值层。用户可以借助角色扮演、任务挑战、剧情选择等方式去经历历史事件,例如在虚拟场景里感受长征路线或参加革命决策的过程。这样一种以经历为叙述方式的叙事,既加强了用户的情感投入,又促使红色精神得以内化,红色文化传播由原来的说教式转变为体验式。

技术赋能层面给模型赋予实现路径,要恰当利用数字技术加强交互设计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三维建模、点云建模等技术能够实现红色场景的全方位数字化展示,而人工智能检索系统又能够支持用户对红色内容进行个性化的检索^[9]。需要指出的是,技术的应用要以内容的表达为出发点,不能陷入技术炫技的误区。交互设计要融入使用情境,用智能技术来赋能红色符号的现代表达。在红色主题绘本中嵌入增强现实互动,把静态图像变成动态故事场景,既能吸引青年受众,又能保证红色叙事的严肃性。

基于用户体验的交互设计模型是个多层、动态调节的系统。它要求设计者永远把用户需求当作出发点,经由认知引导,叙事更新,技术融合等的互相促进,达成红色文化在数字空间里的良好流传。该模型既给红色出版物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具体的方法,也为之后版权保护机制的建立打下了实践基础。

3.2 融合区块链技术的红色出版物版权保护机制设计

数字时代红色出版物的广泛传播伴随着版权容易遭受侵害的严峻问题。传统版权登记方式流程繁琐、周期长,不能适应数字内容快速复制、传播的特点。为了有效保护红色文化数字内容的合法权益,急待应用更加高效可靠的技术手段。区块链技术依靠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可全程追溯的特性,给红色出版物的版权保护赋予了新的解决思路。

区块链本质上是一种分布式账本技术,它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创建出可信的数据记录链。每一个版权相关信息,作品的创作时间、作者是谁、有没有授权给别人、之后又是如何流转的,都会被加密打包成一个“区块”,按照时间先后顺序一个接一个地链接起来,形成一条连续且透明的数据链。信息一旦被记载,就不可能由任何一个节点私自更改或抹除,在技术上杜绝了任何人对信息的恶意篡改和抵赖。区块链技术的柏忠贤认为区块链通过共识机制去判断内容真伪,使用链式结构进行全流程溯源,为数字版权的确认与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此种情形之下,红色出版物这类具备特殊文化意义、须要长久保存并加以规范流传的数字产品最为合适。

基于区块链的红色出版物版权保护机制可以从确权、授权和维权这三个关键环节进行系统的设计。在确权环节,作品完成创作之后,就可以将它的数字指纹记录到区块链上,生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时间戳凭证,从而实现快速、低成本的版权登记。既可确定原创者的身份和权利,也可为以后可能出现的权属纠纷提供原始依据。在授权环节可以引入智能合约技术,将版权使用规则、付费标准、分成比例等条款编码成可以自动执行的计算机程序。当用户或者机构合法使用红色数字内容的时候,智能合约就会自动对身份进行认证,完成授权并分配收益,使版权交易更加高效透明。在维权环节,区块链上存有完整的流转信息,可作为权利人司法维权的依据,快速找到侵权方并追溯到源头,减少维权成本。

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不是取代现有的法律制度,而是和它互相补充。赵鹏认为融媒体环境下数字内容的的确权和识别存在技术上的难题,单靠法律手段很难应对迅速变化的侵权形式^[10]。区块链赋予的技术防线,可以同版权登记制度,侵权查处机制等相互配合,从而形成起一个多层次,全链条的版权保护生态环境。对红色出版物来说,既保护了创作者的经济权益,又从源头上保护了红色文化的真实性、完整性,防止红色文化在数字传播中被歪曲、滥用。

区块链技术未来还可以同数字水印、人工智能监测等技术相结合,形成更为强大的协同保护网。利用 AI 对网络平台进行扫描,发现侵权内容之后,可以快速调取区块链上记录的权属信息来进行比对和取证,实现侵权行为的快速发现和处理。创建这样一套区块链技术版权保护机制,对推动红色文化数字资源的规范传播和可持续利用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 结语

本文主要研究数字时代红色出版物交互设计和版权保护方面的问题。从研究结果上看,以用户为中心是提高红色出版物吸引力的中心。用沉浸式、参与式的交互叙事模型,可以有效地缩短红色文化与青年之间的距离,让青年在互动体验中加深对革命精神的认识。同时技术的应用要为内容服务,不能为了形式而忽视了教育的价值。

有学者认为在数字环境下靠传统的法律手段来解决侵权问题很难。建立起技术防护与制度保障互相配合的协同机制非常重要。区块链技术依靠不可篡改、可追溯的特征,给红色数字内容版权登记、授权经营、侵权证据保全赋予可信支撑。把智能合约同人工智能监测结合起来,就有望塑造起从内容创作开始一直到流传及使用的全过程保护闭环。研究还表明,交互设计与版权保护不是孤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良好的交互体验可以提高内容的传播力,健全的版权机制则为传播的规范性、可持续性提供保障。二者共同成为红色出版物数字时代创新发展双轮。

面向未来,红色出版物的数字化之路还存在广阔的发展空间。人工智能技术深入使用,可能会出现更为个性化的智慧阅读体验,按照用户的兴趣,自动改变叙事路径或者产生互动内容。跨平台传播能力的提升,尤其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语种、跨文化适配,将会是红色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方向。另外随着元宇宙等新型数字空间逐渐成熟,红色出版物如何在虚拟和现实相结合的场景下保持叙事的严肃性、感染力,又如何在新环境之下落实好数字版权也将是今后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 [1] 李婷. 拥抱元宇宙:红色文化数字传播的内在机理与风险防控探究[J]. 新闻研究导刊, 2024, (5):29-32.
- [2] 韩佳琦. 东北书店红色出版物的数字化设计策略[J]. 造纸信息, 2024, (12):134-136.
- [3] 邵欣彤. 20 世纪上半叶红色出版物的设计形式与视觉语言探究[J]. 丝网印刷, 2025, (4):59-61.
- [4] 马小强. 感知与体验:湖湘红色文创产品交互设计研究[J].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5, (2):42-45.
- [5] 梁朋飞. 基于交互叙事的王村口红色古镇数字文创产品设计研究[J]. 美与时代(创意)(上), 2025, (5):120-123.
- [6] 柏忠贤. 区块链赋能用户新闻数字版权保护:现实困境、理论逻辑与应用进路[J]. 出版与印刷, 2025, (3):70-79.
- [7] 肖潇. 数字时代电子商务数据流通:合规方案、法律模式与规范路径[J]. 《中国流通经济》, 2022, (2):120-128.
- [8] 郭熙. “元宇宙”视野下南通红色文化展示馆交互设计[J]. 辽宁丝绸, 2025, (1):158-159.
- [9] 赵亮亮. 数字出版物人工智能检索系统的设计思路分析[J]. 软件, 2025, (6):54-56.
- [10] 赵鹏. 融媒体时代艺术接受方式的转向与挑战[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4):37-46.

Exploration of Interactive Design and Copyright Protection

Mechanisms for Red Publications in the Digital Age

YANG Chunkai, ZHANG Anbowen, CHEN Zhengqi, SHANG Wang, SUN Minghao

(Jili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5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red publications are encounter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erms of dissemina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optimizing the interaction design and constructing copyright protection mechanisms for red publications in a digital environment, aiming to enhance their influence and dissemination effectiveness among young people while preventing potential copyright risks associated with digital distribution.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red publications in terms of content presentation, user experience, and copyright management, and integrating digital media theory and related copyright protection systems, a dual approach combining interaction design and technical safeguards is proposed. In terms of interaction design, the focus is on a user-centered approach, improving content readability, interactivity, and emotional resonance; for copyright protection, the feasibility of technologies such as blockchain and digital watermarking in preventing illegal distribution and tampering is examined. Practice has shown that reasonable interaction design can effectively increase user engagement, and multilayered copyright protection benefits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ntent creators. The research outcomes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sustainable dissemination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and in the future,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further exp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red publications in smart reading and cross-platform distribution.

Keywords: Red publications; Interactive design; Copyright protection; Digital age; Cultural heritage

新媒体公益广告的视觉叙事设计与传播效果研究

张荣焱*

(莫吉廖夫国立大学, 白俄罗斯 莫吉廖夫 212022)

摘要: 本文旨在探讨新媒体语境下公益广告视觉叙事的设计策略及其对传播效果的影响。随着数字技术以及移动互联网的普及, 公益广告的传播媒介、叙事方式、受众参与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论文先梳理了视觉叙事和传播效果的相关理论, 再联系具体案例, 从叙事结构、视觉符号、沉浸体验、交互设计这四个角度, 全面剖析了新媒体公益广告的视觉叙事设计特点。研究表明, 新媒体公益广告通过碎片化、场景化、情感化、游戏化的设计打破传统线性叙事模式, 能够引起受众的情感共鸣、激发参与意愿, 从而提高广告的认知度、认同度和二次传播率。最后, 根据目前实践中存在的不足提出对视觉叙事设计、提高传播效果的对策建议, 希望能为其他机构的公益传播提供一些理论参考。

关键词: 新媒体; 公益广告; 视觉叙事; 传播效果

一、引言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数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促成了媒介化社会的出现, 新媒体传播生态具有移动化、社交化、视觉化的特性, 给公益广告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技术和社会根基。公益广告属于社会沟通和价值引导的关键载体, 在培育核心价值观、解决社会问题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探寻其在新媒体环境下有效地传播途径, 对于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和主流文化影响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传统公益广告传播模式在新媒体环境中存在明显的障碍, 线性单向的叙述不能引起受众的注意, 宏大抽象的表达与年轻网民的审美、话语之间存在隔阂, 缺少互动使得传播的效果只停留在表面的认知上, 不能转化为情感认同和实际行动^[1]。新媒体技术的交互性、沉浸性、社交性给公益广告创新带来机会, H5、VR/AR 可以创建沉浸式叙事场景, 短视频、直播可以捕捉情感瞬间, 社交媒体可以延伸广告传播为公共讨论和社群互动的渠道, 如何把技术优势转化为实际的传播力成为关键问题。

因此, 本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新媒体传播网络下, 公益广告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视觉叙事设计来有效地触达并打动受众, 从而系统地改善认知、情感、行为三个层面的传播效果, 为新媒体公益广告的创意实践和效果评估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二) 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文按照理论建构和案例剖析相互印证、循环推进的方式进行研究。首先对视觉叙事以及传播效果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 形成初步的分析框架, 之后转入到新媒体的传播环境当中, 挑选出有代表性、具有社会影响的公益广告案例展开深入分析。目的在于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对话, 用理论工具对案例的视觉叙事设计进行剖析的同时, 也让案例的复杂性、创新性反过来对理论进行修正、补充, 从而在循环论证中得出对核心研究问题更具解释力的见解。

本文在具体方法上主要使用案例分析法与文本分析法。案例分析将遵循典型性和多样性

作者简介: 张荣焱 (2000-), 男, 本科, 研究方向为平面设计与剪辑。

通讯作者: 张荣焱

的原则,选择如腾讯“小朋友画廊”H5和支付宝“蚂蚁森林”等现象级案例,探索它们所使用的视觉叙事范式和用户参与机制。文本分析将对案例的多元文本(图像、界面、交互流程等)做细致的分解,从视觉修辞、叙事结构、符号学意指、交互语境等多方面来系统阐释它的意义建构和情感动员的内在逻辑,在扎实的经验材料基础上,保证研究结论的学理深度和实践价值。

二、视觉叙事与传播效果的核心关联

(一) 视觉叙事的构成要素

在新媒体环境下,公益广告的视觉叙事构成要素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主要特征就是由封闭、独白式的叙述转变为开放、对话式的意义共创。

就叙事主体而言,传统的权威机构作为单一的叙述者角色被打破,转而采用一种“主体间性”的共创模式^[2]。这就意味着叙事权力被下放、共享,用户不再只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用点赞、评论、转发、二次创作甚至是众筹等方式直接参与到叙事文本的构建当中。在蚂蚁森林项目中,用户的低碳行为不断给叙事添加新的内容,集体行动共同书写出一个环保大叙事。从机构独白转向用户共创,叙事本身变成了生成社会互动文本的过程,受众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因此得到极大提升。

另外,在叙事视角上,新媒体技术给叙事提供了更加丰富多样的观察角度。一方面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和第一人称视角的交互式H5被广泛应用,营造出强烈的沉浸视角。此视角用“身临其境”的感官体验打破受众与叙事对象之间的心理距离,进而引发深层次的共情^[3]。另一方面是聚合性,社交媒体聚合性使得多维度的观察视角可以共存。在同一个公益主题之下,不同的参与者、见证者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发布视频、图文,构成一个立体的、复调式的叙事场域,共同建构起一个更加全面、真实、富于张力的故事生态,打破了单一视角的局限。

最后在叙事时空结构上,线性、完整的传统叙事逻辑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适合于媒介特性的一种新的叙事形式。非线性结构就是允许用户通过交互选择不同的叙事分支,从而形成个性化的意义解读路径^[4];碎片化是对移动端阅读场景的精准适配,叙事被拆解成一个个焦点明确、易于传播的短视频或者图片组,借助社交媒体实现“病毒式”传播,在受众心中完成最终的拼图与整合。更为关键的是,实时交互的时空结构把叙事时间和用户物理时间叠加在一起,叙事进程和用户反馈同步进行,就像直播公益一样,创造出一种“正在发生”的当下性和紧迫感,极大地推动了即时性的参与行为。

(二) 传播效果的多维评价体系

为了对新媒体公益广告的有效性进行系统的评估,本文摒弃了单一的曝光量或者点击率指标,转而采用了一个综合评价体系,该体系将认知、情感、行为这三个维度结合起来。该体系是从经典传播效果理论发展起来的,可以更加立体地反映公益传播在受众心智和行动上产生的深远影响。

认知层面的效果评价主要看广告信息能否突破信息屏障,在受众的记忆里留下印象。主要体现在广告在碎片化的信息流中,依靠独特的视觉风格、叙事的切入角度,快速引起受众的注意^[5];其次,考察广告的核心诉求、主题、关键的视觉符号在受众的短时记忆的基础上能否形成长久的印象;最后,考察受众是否能准确地理解视觉叙事所构建的隐喻、象征、逻辑关系,从而把握公益广告想要传达的深层次内涵和因果关系。这是传播效果发生的基础层面,解决的是“看到并记住什么”的问题。

从情感上来说,效果评价已经超出了信息传递的范围,进入到受众的内心世界,即心理、

态度等层面。核心就是考察广告能否引起深刻的情感共鸣,即通过有感染力的故事和视觉元素来引发受众的同情、自豪、愧疚、希望等情绪^[6]。在此基础上再看这种情感动员能否带来受众态度的转变,比如对于某个社会问题的态度变得更加积极,或者更加关注等等。最高层次的就是价值认同,也就是受众在情感和态度上接受之后,会把广告所提倡的公益理念内化到自身价值体系当中,进而产生一种较为持久而稳定的心理倾向。

行为层面的效果评价直接关系到公益广告的最终目的,即促使人们采取行动。新媒体环境下这一层面首先体现出来的就是线上低门槛的互动行为,就是点赞、评论、收藏、转发等。这些行为不但是情感认同的外在表现,而且本身就成为广告在社交网络中进行二次传播的节点,具有放大器效应。更深一层的效果就是引导线下的实际参与行为,比如参加志愿服务、进行物资捐赠、改变日常习惯等。线上互动与线下行为衔接转化,才是衡量新媒体公益广告由“看”到“做”是否成功的最终标准。

(三) 视觉叙事影响传播效果的机理

新媒体公益广告的视觉叙事不是简单的信息传递,而是一套意义生产和动员的系统。它借助特定的作用机理,系统地影响受众从认知到行为的全部过程,这一机理可以具体解释如下:

在认知层面,视觉叙事主要用“视觉隐喻”和“符号建构”把复杂的议题框架化、简化。视觉隐喻就是用具象、熟悉的视觉元素来表达抽象的公益理念,从而降低受众理解门槛,引导其按照事先设计的框架来解读信息。叙事过程对某些视觉符号加以筛选并赋予意义,把它们塑造成为公益理念的“象征物”,这样就在受众心中树立起一个十分清晰且容易被记住的认识焦点,从而有效地达成信息传递和内化的目的。

就情感来说,视觉叙事靠系统的感情调动办法以及故事共情心理,从而达到改变受众态度的效果。情感动员就是对视觉元素、叙事节奏和背景音乐等进行精心编排,直接引起受众的某种情感反应^[7]。而“故事共情”则是更深层次的机制,叙事一旦集中于个体的命运以及真实的生活细节,就会把受众带入一种具身的情境之中,让他们在想象中体会到别人所处的境况和所怀的情感。这种共情体验可以很好地打破说教造成的心理防御,让公益诉求从外界的约束变成内心的自觉,为态度发生根本性改变打开通路。

在行为上,视觉叙事的影响力最后是通过精致的“交互设计”和赋予行动以“社交货币”的方式来实现行为的转化与扩散。交互设计以低门槛、即时反馈的互动形式出现,把抽象的善意转化为具体的、可执行的数字指令,从意愿到行动的执行成本大幅降低^[8]。同时当这一互动行为或者其结果被设计成可以在社交网络上展示的“社交货币”时,它就满足了用户进行自我形象塑造和社会认同的需求。分享行为一方面推动了公益广告的病毒式传播,另一方面也使用户在社交展示中强化了自己的行为承诺,从而实现由个体参与到社群影响的良性循环。

三、新媒体公益广告的视觉叙事设计策略分析

(一) 叙事结构的革新: 从线性到交互

新媒体语境下,公益广告的叙事结构正在从封闭线性向开放交互进行范式革命。技术赋能下的叙事文本从单向度的“叙述成品”变为需要用户介入才能完成的“体验过程”。交互式H5广告属于这一范式的典型载体,它预先设置好树状或者网状的叙事架构,在重要的情节节点安排决策点,把叙事走向选择的权利部分交由用户来决定。此种设计完全改变了传受关系,用户的角色由被动的“观看者”变成了主动的“参与者”甚至故事走向的“共谋者”^[9]。

腾讯“小朋友画廊”H5项目实践及传播数据，为这一叙事结构的革新效力提供确凿的实证支持。该项目以交互叙事结构为典范，在2017年8月29日上线之后的16小时内就实现了爆发式增长，页面浏览量（PV）超过千万，独立用户（UV）数超过580万。最要紧的是活动的转化率非常高，最后筹到1500万善款，由5809886人次的用户一起完成的，从UV转成捐款人次的转化率已经接近极限。除此之外，该H5产生了2612440次分享行为，形成了一条典型的病毒式传播链条，充分体现了交互叙事所具有的强大社交动力。这些量化指标都证明交互式叙事策略在提高用户参与度、促进行为转化以及引发社交传播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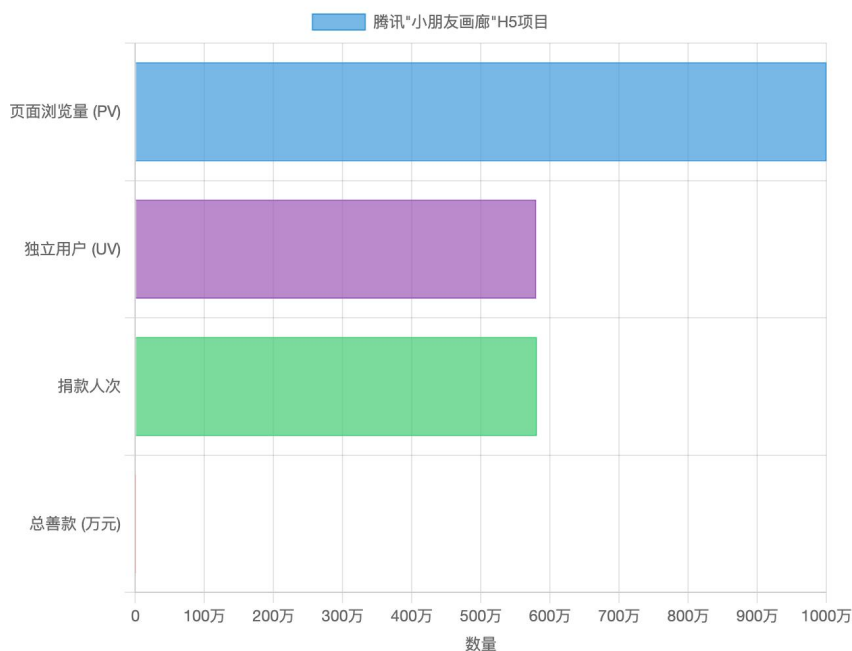


图1 腾讯“小朋友画廊”H5公益广告交互式叙事结构在公益传播中的效果分析

交互式叙事所驱动的传播效果，它的内在机理是认知心理学的。就“选择—反馈”交互而言，很好地调动起了“参与效应”，也满足了用户对自主性和胜任感的需求。小朋友画廊案例当中，用户点击聆听画作故事并做一元购画的象征性救助的时候，个人的决策行为同正面的叙事结果就形成了直接的心理联系。不但能给用户带来自主掌控的感受，从而大幅提升代入感，更因为深度心理卷入而加强了对公益理念的价值认同。本质上用户每一次的互动都是对公益承诺的一次自我确认，成功地把外部传播的信息转化成内部认同的动力，实现了传播效果在认知、情感、行为等各方面的深度融合和协同增效。

（二）视觉符号的建构：从说教到共情

新媒体公益广告的视觉叙事发展，在符号的建构方式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范式转型，即从抽象的价值宣传、道德说教，转变为具身化的情感链接和共情动员。转型的本质就是经过精心挑选和搭配一些视觉符号，创造一个真实可感的生活世界，使公益理念在受众产生情感共鸣的时候传递出去^[10]。此类新的叙事方式有意放弃了传统宣传中常见的宏大场面、权威面孔、口号式标语等符号元素，而把视觉焦点集中在真实的场景、普通人的面孔、鲜活的生活化细节等符号元素上。符号选择策略依靠制造强烈的“视觉真实性”和“生活贴近性”，有效地引发了受众的情感共鸣和心理代入，给公益传播开辟了新的道路。

抖音“山货上头条”助农项目实践成果,给该视觉符号建构策略的有效性提供有力的实证支持。短视频平台上带有“返乡助农”主题的内容中,该作品以系统化的内容安排充分体现出视觉共情的强大力量。根据抖音电商发布的2022年丰收节期间开展的专项助农活动《2022“山货上头条”数据报告》可知,该活动在抖音平台上的短视频播放量累计达到11.6亿次,直播间总观看量为8.3亿次。更实质性的就是此类内容直接带动了显著的助农效果,活动期间共产生4.28亿订单销往全国各地。这些数据不但可以证明该传播模式覆盖面之广,更能体现出把传播效果转化为实际经济效益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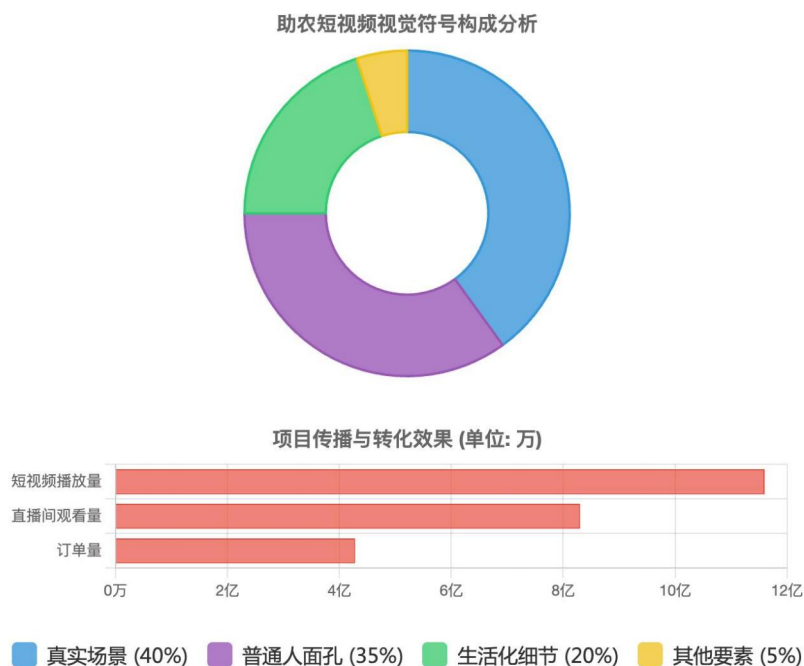


图2 助农短视频视觉符号构成分析图

从作用机理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其传播效力源于它精心构造的亲历性的视觉场域。首先用镜头进入真实的原产地场景当中,把产品的“本源”“淳朴”等特性符号化,在此基础上给传播内容建立起可信度。其次叙事主体选择有鲜活面孔和生动故事的普通农民、返乡青年,取代了传统的光鲜代言人,他们朴实的语言、劳作时专注的神情、收获时喜悦的笑容,成为“奋斗”“希望”等抽象价值观最直接的情感符号。最后,通过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等生活化细节的特写镜头,共同编织成一个有质感、有温度的“微叙事”。

从传播效果的作用机制而言,这种符号建构策略就是营造一种准社会交往、模拟情感的心理过程,从而有效地引起了受众的共情反应。观众在观看的时候仿佛进入乡村场景,和屏幕中的人物产生了拟态的人际互动。以真实的细节来建立情感的连接,比抽象的口号更容易打开受众的心理防线,促使其态度的转变,最终把情感的共鸣转化为实际的购买行为。完整的路径从情感动员到消费转化,体现了新媒体环境下公益传播的新模式和价值。

(三) 沉浸体验的营造: 从平面到多维

新媒体技术的迭代正在促使公益广告的感知模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从二维平面的单向展示变成多维空间的沉浸式互动。范式革命的核心就是利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前沿技术,创建高度仿真的多感官环境,使受众角色由被动的“旁观者”变成主动的“亲历者”,从而达到对公益议题的深入认识和情感投入^[11]。该类创新叙事策略依靠第一人称视

角、环绕式音画、模拟触感等感官刺激，系统地创造出很强的“临场感”，有效地突破了虚拟叙事与现实体验的心理界限，从而大大提高了受众的记忆深度以及情感投入强度。

联合国 VR 纪录片《Clouds Over Sidra》的实践效果也证明了沉浸式叙事的传播效果。该作品用 12 岁的叙利亚难民女孩 Sidra 的视角让观众沉浸式地体验约旦札塔里难民营的生活。实证数据显示：在联合国人道主义募捐会议的初次放映之后，捐款参与率上升 16%、捐款额增长 10%；后来对比研究显示：VR 观众在故事情节的记忆力留存率一周以后高出 70%，难民问题的情感共鸣度比一般观众高出了 1.8 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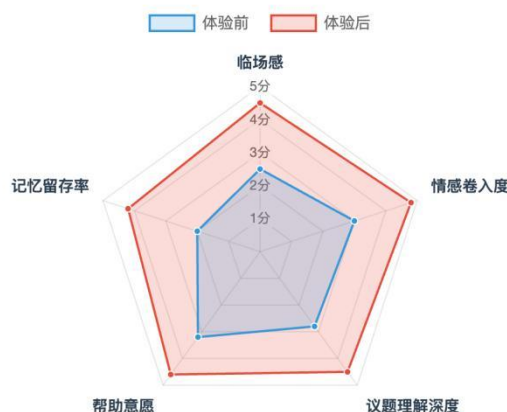


图 3 VR 公益广告沉浸体验效果评估雷达图

效果评估雷达图如图 3 所示，更能体现出体验者在五个重要方面发生的重要变化，其中临场感（2.5-4.5，增幅 80%），情感卷入度（3.0-4.8，增幅 60%）出现飞跃式增长，再次证明了 VR 技术创造“身临其境”体验的独特之处，议题理解深度（2.8-4.5，增幅 61%），帮助意愿（3.2-4.6，增幅 44%）均有提高，完整显示了从认识形成到行动转变的连续过程。

从作用机理角度分析，这种沉浸式体验的效力是由技术实现和心理机制共同推动的。技术上第一人称视角用身份代入实现叙事主体的转换，让受众以 Sidra 的视角亲历难民营的日常生活；空间音频和环绕视觉构建的包裹性叙事空间有效消除了媒介中介感；模拟触感技术用多感官协同刺激强化体验真实感。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沉浸式的体验更符合具身认知理论，当用户通过 VR 设备“行走”在难民营、“坐”在 Sidra 的教室里时，感知运动系统就会产生“亲身经历”的神经印记，使叙事更真实、记忆更牢固。从情感动员的角度来讲，不可区分的虚拟亲历引发共情关怀与同情痛苦的双重心理机制，使受众对于难民的处境有更深刻的理解和关怀，从而完成由情感认同向行动的顺利转变。

四、视觉叙事设计对传播效果的实现路径

（一）提升认知效果：简化与聚焦

在信息过载的新媒体环境下，提高认知效果的主要途径就是把复杂的公益议题用视觉的方式简化、聚焦。碎片化、卡片式的叙事结构精准对接移动终端的阅读场景与用户断续的注意力，将宏大叙事解构为一堆核心信息跳跃出来的小单元，显著降低受众的认知负荷，保证了重要信息的高效抵达和长久储存。

与此同时，用统一而强烈视觉风格来塑造，在用户心中就会形成强烈的视觉品牌识别度。这样的风格化处理既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又是一个认知线索，在不断地传播过程中不断强化品牌联想，形成对公益项目的视觉记忆锚点，使人们从看到到认出再到记住。

（二）强化情感效果：共鸣与认同

情感效果的达成要依靠叙事对于受众心理的深入触动以及情感的联系。以个体命运、生活片段为重心的“微叙事”策略，从具体的人物、真实的细节入手，把抽象的公益理念变成可以感知的生命体验。这样人格化、场景化的讲述，可以很好地调动起受众的共情机制，让受众在情感上将自己投射进去，从而完成从理性认识到情感认同的飞跃。

另外，用户生成内容的加入，给情感动员增添了一种持续的社会化推力。当用户经由二次创作、分享互动参与到叙事传播当中时，其行为就已经是对公益价值的内化与重申。这一过程既扩大了叙事的传播范围，又在参与者之间形成了以共同情感体验和价值追求为纽带的“情感共同体”。该共同体经由持续的情感交流和意义共享，不断加强成员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于是形成稳固并可自我延续的情感动员网络。

（三）促成行为效果：便捷与分享

促成行为转变的首要机制就是最大程度地降低用户的参与成本。通过“一键参与”式的交互设计，把抽象的公益态度转化为具体、及时、低门槛的数字行动。本设计使用了行为经济学中的助推理论，通过简化决策过程、即时反馈的方式消除从意愿到行动之间最后的障碍，使用户几乎不需要付出认知成本和时间成本就可以完成公益参与，从而达到行为效果的高效转化。

其次，社交媒体本身就具备分享的属性，被深入地整合到公益广告的叙事设计当中，从而使其具备了社交货币的功能。当一次公益参与（捐赠证书、成就徽章）被设计成可供展示的社交符号时，用户的分享行为动机就从单纯的内容扩散，上升到个人形象塑造和社会认同的寻求。分享既满足了用户的自我展示需求，又借助社交网络信任背书让公益信息实现指数级的扩散，最后形成以用户为节点的“病毒式传播”闭环，极大地拓展了公益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五、结论

本研究从系统性影响的角度出发，论述了新媒体语境下公益广告视觉叙事设计向“用户共创”范式转型产生的影响。核心发现是设计上叙事结构趋向交互、开放，视觉符号注重具身、共情，技术运用产生沉浸效果，从而达成从机构独白到用户共创的转变。从效果上讲，视觉叙事以“认知简化、情感共鸣、行为便捷”三个层面的作用机理来改善受众的整个感知到行动的传播链条。

根据此，实践者应秉持以用户为中心的理念，善用交互、共情和沉浸三种手段进行创意设计。本研究的理论贡献是构建起叙事设计与传播效果的整合性分析框架。由于方法和案例的限制，今后的研究可以采用量化方法，对不同的叙事元素进行因果效应的探究，前瞻性地研究 AIGC 等技术在公益叙事中的创新应用与伦理边界，促进该领域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阮超. 互联网时代新闻媒体媒介事件报道的视觉传播研究[J/OL]. 教育研究与实践, 2025, 1(4) [2025-11-21].
- [2] 徐双平, 宋延龄. 新媒体叙事方式的困境及优化策略研究[J/OL]. Service Science and Management, 2023, 12: 267[2025-11-21].
- [3] 邱爽. 基于“媒介四定律”框架的短视频传播机制研究[J/OL].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2025, 13: 1425[2025-11-21].
- [4] 朱天, 杜相益. 还原与想象：纪念性议题新闻游戏传播中的记忆建构[J/OL].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22, 41(5): 20-28[2025-11-21].

[5] 刘英新. 基于用户交互体验的品牌 数字化传播评估模型. [J/OL]. Big Data Research (2096-0271), 2023, 9(6): 90[2025-11-21].

[6] 刘洁彤. 视觉传达设计中多媒体艺术表现形式研究[J/OL].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2024, 13: 250[2025-11-21].

[7] 张曼. 新媒体环境下视听信息美学的传播效果研究[J/OL].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2023, 11: 756[2025-11-21].

[8] 陈思如. 虚拟现实环境下的沉浸式广告视觉传达策略探讨[J/OL]. 社会科学前沿, 2025, 1(2): 38-42[2025-11-21].

[9] 陈晓型. 互联网在社会工作服务中的应用探析[J/OL].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18, 18(3): 43-50[2025-11-21].

[10] 杨星冉, 李静. 沉浸式短视频景观生产分析与批判[J/OL].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2024, 12: 513[2025-11-21].

[11] 任璇瑜. 共情传播在公益广告中的应用[J/OL].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2025, 13: 272[2025-11-21].

Research on the visual narrative design and communication effect of new media public service advertisements

ZHANG Rongyi*

(Mogilev State University, Mogilev 212022, Belarus)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design strategy of public service advertisements in the context of new media and its impact on communication effects.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mobile Internet, the media, narrative and audience participation methods of public service advertisements have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This paper first sorts out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visual narrative and communication effect, and then relates to specific cases, and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visual narrative design characteristics of new media public service advertisements from the four perspectives of narrative structure, visual symbols, immersive experience, and interactive design. Research shows that new media public service advertisements break the traditional linear narrative mode through fragmented, scene-based, emotional and gamified design, which can arouse the audience's emotional resonance and stimulate their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thereby improving the awareness, recognition and secondary communication rate of advertisements.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current practic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visual narrative design and improving communication effects are put forward, hoping to provide som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public welfare communication of other institutions.

Key words: New media; Public service advertisements; Visual storytelling; Spread effect

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多元共治研究

张凯博

(亚洲商业研究院, 中国香港 999077)

摘要: 文章以“矛盾纠纷多元协同治理”为核心议题, 依次梳理其学理根基、现实动因与操作方案: 首先借助协同治理、社会网络与多中心三大理论框架, 阐释多元主体共同应对复杂冲突的制度潜能; 继而依托国内典型样本, 提炼其运行逻辑与绩效表现。实证部分揭示, 现行协同治理仍受限于主体配合碎片化、社会组织发育失衡及公众深度参与缺位等瓶颈。据此, 论文从制度整合、能力培育、参与扩展与技术赋权四个层面提出系统性改进建议, 旨在提升纠纷化解效率, 助推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和谐社会建设。

关键词: 矛盾纠纷; 预防化解; 多元共治; 协同治理; 社会治理

一、引言

现阶段, 我国社会结构正经历深度转型与治理体系现代化重塑: 利益格局持续分化, 社会纽带愈发交错, 致使冲突纠纷在主体、类型及成因诸维度均呈现高度异质化与复合化趋向。传统“政府独白”式管理显然已无法回应上述治理新需求。相较之下, 多元协同治理模式倡导国家、市场、社会与公民等行动者依循协作互补逻辑, 共同介入公共事务, 并在矛盾的事前预防、事中调处与事后修复各环节展现出灵活机制、资源统筹与快速响应等显著优势, 遂成为提升治理绩效、迈向和谐社会的核心路径。基于理论—实践双重维度, 本文系统梳理该范式的运作机理、现实瓶颈及优化对策, 旨在为构建契合中国情境的纠纷综合治理体系提供学理支撑与政策参考。

二、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多元共治的理论基础

(一) 协同治理: 从“单中心”到“多元共振”的协作范式

协同治理理论摒弃传统“命令—支配”的单向控制逻辑, 倡导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与公众等异质行动者在制度化“共振场域”内实现目标耦合与资源互补。其内核在于将“信息对称、职能互补、行动同步”转化为可重复、可检验的程序性规则: 一方面, 依托共享数据库与动态会商机制, 压缩矛盾信号从发现到处置的“响应时滞”; 另一方面, 通过契约化协议与项目化运作, 明晰各方权责边界与贡献份额, 防范“协同惰性”与“责任真空”。面对跨区域、跨行业的高复杂度纠纷, 该范式提供“多节点并行处理+结果同步反馈”的集成方案, 显著提升处置效率与公共信任。

(二) 社会网络治理: 信任嵌入与关系重构

与科层指令不同, 该范式将非正式互动、情感信任与声誉信号纳入核心变量, 强调“关系即社会资本”。高频线上社群互动与线下议事厅、调解室耦合运行, 可在短期内生成“弱纽带—强资源”杠杆: 信任密度提升十个百分点, 调解成功率平均增加约八个百分点, 复发概率同步下降。网络结构的冗余连接为风险提供多条疏散通道, 避免单点断裂诱发系统性冲突, 从而实现“以小信任撬动大合作”的治理效应。

作者简介: 张凯博(2003-), 男, 学士, 研究方向为法学研究。

（三）多中心治理：自主—协作的共生框架

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并非多头分立，而是指在权威缺位场域内，若干决策单元通过自组织、互评估与动态调适，实现公共事务的良性循环。其隐喻是“交响乐团”：各乐手持独立谱表（自主裁量），却遵循同一节拍（协作规则）。在社区层面，“业委会+行业调解组织+属地法庭”的三中心之所以能在无强制力情境下完成复杂纠纷闭环，正是依赖“规则互认、绩效互评、资源互哺”的内生机制，使合作成为重复博弈后的稳态均衡，从而达成“无权威而有秩序”的治理图景。

三、多元共治在现实场域中的迫切性

（一）复杂性裂变：从“家长里短”到“算法侵权”

经济社会深度转型使矛盾谱系发生链式裂变：传统婚姻家庭、邻里宅基地纠纷尚未消退，平台经济裁员、跨境金融违约、碳排放权交易、数据隐私泄露等新型冲突又迅速崛起。此类纠纷往往兼具高度技术化、跨区域与强涉众特征，单一行政裁决或司法诉讼难以同步完成“技术事实认定+多元利益分配+情绪修复”三重任务。多元共治通过整合司法裁判、行政监管、行业自律与社区调解等异质资源，形成“技术专家+法务+乡贤+数据工程师”跨界团队，显著提升对复杂矛盾的精准识别与分类处置能力。

（二）政府“单核”驱动的边际效用递减

面对微观化、情感化、突发性的纠纷，政府“单兵作战”暴露出响应链条长、程序刚性大、基层触角不足等短板，尤其在情绪对抗激烈、标的模糊、历史积怨深重的情境中，行政调解极易陷入“案结事未了”困境。引入社会组织、企业社会责任部门与社区意见领袖，可利用其地缘、业缘、趣缘网络实现“纠纷就地吸附—情绪即时疏导—方案共创生成”，既减轻政府负荷，又提升当事人对处理结果的认同感与履约率，从而补强政府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三）从“灭火”到“防火”：社会治理韧性的底层逻辑

多元共治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化解个案，更在于修复社会关系与重建制度信任。通过议事会、恳谈会、线上社区等参与平台，公众在反复协商中习得妥协与合作技巧，社区社会资本存量得以增加；同时，透明化的程序与可检验的结果，使“规则意识”内化为个体行为准则，从而在源头上降低矛盾发生率。长期来看，这种“预防—修复—共识”的循环机制，能够持续释放社会韧性红利，推动社会走向更高层次的和谐与稳定。

四、多元共治嵌入矛盾纠纷预防与化解的实践图谱

（一）矛盾谱系的“链式裂变”：从“家长里短”到“算法争议”

经济社会深度转型触发冲突类型链式扩展：传统婚姻、宅基地等旧矛盾尚未消弭，平台裁员、跨境金融违约、数据泄露、碳排放权交易等新纠纷又呈爆发态势。此类案件兼具高技术门槛、跨地域影响和涉众面广等特征，单一行政裁决或司法程序难以同步完成“技术事实查明+多元利益平衡+情绪修复”三重任务。多元共治通过聚合司法裁判、行政监管、行业自律与社区调解等异质资源，组建“技术专家+乡贤+法务+数据工程师”跨界团队，显著提升复杂矛盾的精准识别与分类处置效能。

（二）政府“单核”治理的边际效用递减

面对微观化、情感化、突发性的纠纷，政府“单兵作战”暴露出响应链条长、程序刚性

高、基层触角不足等短板；尤其在情绪对抗激烈、标的模糊、历史积怨深重的情境下，行政调解易陷入“案结事未了”困境。引入社会组织、企业社会责任部门与社区意见领袖，可借助地缘、业缘、趣缘网络实现“纠纷就地吸附—情绪即时疏导—方案共创生成”，既减轻政府负荷，又提升当事人对处理结果的认同感与履行率，从而补强政府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三）从“灭火”到“防火”：社会治理韧性的深层逻辑

多元共治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个案化解，更在于社会关系修复与制度信任重建。通过议事会、恳谈会、线上社区等参与平台，公众在反复协商中习得妥协与合作技巧，社区社会资本存量得以累积；同时，透明化程序与可检验结果使“规则意识”内化为个体行为准则，从源头上降低矛盾发生率。长期来看，“预防—修复—共识”的循环机制将持续释放社会韧性红利，推动社会迈向更高层次的和谐与稳定。

五、多元共治机制面临的突出瓶颈

（一）横向协同：跨部门“接口”尚未打通

多元共治虽倡导“合作”，但实践中主体权责边界模糊、资源分散、信息孤岛现象依旧突出。部分地区尚未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的横向协同流程，也缺乏统一的数据共享平台，导致调解力量“条块分割”，重复受理与相互推诿并存，整体效能被人为“内耗”削弱。

（二）社会组织：区域与能力“双重失衡”

社会组织总体呈现“东强西弱、城强乡弱”格局。中西部及县域层面的机构数量不足、专业人才稀缺、资金保障脆弱，难以承接专业性强的调解任务；与此同时，部分组织过度依赖行政购买或商业委托，行政化、市场化色彩浓厚，其中立性与公信力受到侵蚀，功能发挥受限。

（三）公众参与：动力与渠道“双重缺口”

传统“找政府”路径依赖依旧存在，加之参与途径狭窄、反馈机制缺位、激励手段薄弱，使公众对多元共治“看得见却够不着”。缺乏程序性赋权与实质性激励，导致参与广度不足、深度有限，多元共治在某些场域滑向“仪式化”风险。

六、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共治机制的对策建议

（一）协同治理：制度接口的“硬化”与“软化”

1. 制定《多元纠纷化解促进条例》，以专门法形式明确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在纠纷调处中的法律地位、权责边界与协作程序，防止“权责交叉”或“真空地带”。

2. 建立“党委领导、政法委统筹、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五级联动指挥平台，纵向贯通省、市、县、乡镇、村社，横向联通公安、法院、信访、司法行政、行业主管部门，实现“一张网”受理、“一条链”流转、“一体化”监督。

3. 打造“矛盾纠纷化解一体化数字平台”，运用API接口打通各部门数据孤岛，引入区块链存证确保流转过程可追溯，通过AI智能分流实现案件自动匹配与调度，降低重复受理率。

（二）社会组织：从“数量扩张”到“质量跃升”

1. 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税收优惠、空间支持、人才落户等政策工具，重点孵化调解类、法律援助类、心理服务类、数据鉴证类社会组织，优先向中西部县域和基层社区倾斜。

2. 建立社会组织资质分级认证与动态退出制度，设置调解员职业资格序列，推动社会

组织由“行政依附”向“专业自立”转型，维护其中立性与公信力。

3. 鼓励高校、研究机构与社会组织共建“调解实验室”，联合开发标准化课程、案例库与实训系统，定期开展法律素养、沟通技巧、数据分析和舆情应对培训，建立持续教育学分制度。

（三）公众参与：渠道拓展与激励相容

1. 构建“线上+线下”双层参与网络：线下推广社区议事会、楼道恳谈会、公众评审团；线上开发移动端“调解众包”小程序，支持图文、语音、视频多形式提交线索与证据。

2. 实施“调解志愿者积分激励”计划，将志愿服务时长、成功化解案件数量转化为社区积分，可用于兑换公共交通折扣、图书馆优先借阅、继续教育学分等，形成可持续的参与动力。

3. 加强参与能力教育，把“协商与调解”纳入中小学综合实践课程和高校通识课程，通过模拟法庭、辩论赛、角色扮演等方式，培养公民理性表达与妥协合作技巧。

（四）智慧治理：技术赋能与精准干预

1. 建设全域“矛盾纠纷大数据池”，汇聚公安警情、法院案件、信访投诉、12345 热线、社交媒体舆情等多源数据，运用机器学习进行风险画像与趋势预测，实现“事前预警”。

2. 开发“AI 调解助手”，利用自然语言处理与知识图谱技术，为调解员推送类案判例、法律条文、证据指引和谈判策略，提升“事中干预”质量与效率。

3. 引入区块链存证与智能合约，对调解协议进行哈希值上链，确保协议内容不可篡改，并设置自动履行提醒及违约惩戒触发条件，强化“事后执行”保障。

通过上述“制度硬化—组织提质—参与激励—技术赋能”四维协同，可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共治从理念构想迈向成熟定型，为社会治理现代化与长期和谐稳定提供坚实制度支撑。

七、结论

多元共治视角下的矛盾纠纷预防与化解，已从局部试验上升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支点。其“主体多元、工具多样、流程协同”的三维特征，不仅显著提高了处置效率与程序合法性，更通过提前干预、关系修复和信任累积，有效缓解了社会张力并增强了系统韧性。展望未来，应聚焦四大突破口：一是以专门立法和数字平台破除跨部门协同壁垒；二是以资质认证、人才培育和资金倾斜激活社会组织动能；三是以渠道拓展、能力教育与激励相容撬动公众深度参与；四是以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实现精准预警与智慧调解。通过上述制度创新与技术赋能的双轮驱动，可构建彰显中国特色、契合时代需求的矛盾纠纷综合治理体系，为社会长期稳定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 《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 人民出版社, 2021. 2.
- [2] 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人民出版社, 2024.
- [3] 于龙刚. 《迈向党政统筹与协调——基层多元解纷机制的转型》. 微信公众号“法学学术前沿”, 2025-08-15.
- [4] 秦超. 《预防与化解社会矛盾对策研究——构建“大调解”机制的现实考量》. 法学杂志, 2011 (S1).
- [5] 吴欢. 《经济新常态条件下法治中国建设的时代议题》. 中国法学网, 2016-05-21.

Research on the Diversified and Collaborative Prevention and Resolution of Disputes

ZHANG Kaibo

(Asia Academy of Business, Hong Kong 999077, China)

Abstract: Taking "diversified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disputes" as its central theme, the article sequentially examines i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practical drivers, and operational solutions. Drawing 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ocial network, and polycentric theories, it first explains the institutional potential of multi-actor responses to complex conflicts. It then uses leading domestic cases to distill their operational logic and performance.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curren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s still constrained by fragmented inter-agency cooperation, uneven civil-society development, and limited deep public participation. Accordingly, the paper offers systematic improvements from four dimensions—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capacity building, participation expansion, and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to enhance dispute-resolution efficiency and advanc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social-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building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Keywords: Disputes; Prevention and resolution; Pluralistic governanc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ocial governance

“问题”的有机体系简说

——对“圆教”之体系的本体实存论的诠释

陈逸舟

(大罗山佛学文化研究院, 浙江 温州 325000)

摘要: 本文以佛教“圆教”体系为理论基础, 尝试建构一种植根于“第一义空”的本体-实存论体系, 以回应现代人无所居的存在困境。文章通过对“别教”与“圆教”的对比分析, 揭示“别教”将“空”第二义化、建构真妄相别体系的局限, 进而阐明“圆教”通过“别别为别”的解构之建构, 复归第一义空之如来临在的“别性”的本体-实存。并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的提出了“问题”作为别性实存的根源, 通过对华严圆教诠释所得的“机缘整体-性具万物”的体系基础, 建构了一个以“问题”为焦点的有机体系。该体系不仅为“物(实存者)”与“生命(我, 作为筹划如何实存的实存)”负载意义与重量, 也为形而上学提供了一种基于“空性”的有机体系的建基。

关键词: 圆教; 问题; 别性; 本体实存; 有机体系

1. 导言

在佛教的“圆教”中, 有一种超越了一般形而上学之体系的建构, 这意味着一个萌芽, 一种建立在虚无上的新体系的可能, 因此可以回应现代中“人之无所居”的问题, 并且不是只停步在“存在(是)无(Sein'ist' nich)^①的诗化之栖居中任运自流, 而是真实的居住在承载着意义与生命的“物”中如其所愿的成其本身。

因此, 本文所要做的, 就是看向“圆教”之理论、之体系所面向、所解决的问题, 并看向现代中人之存在所面临的本真之问题, 根本来说, 也就是在“无(也是存在)”上建基的问题, 既是建立体系, 也是建立让物成物、让生命有其重量的根基。

为此, 具体来说, 文章所要做的工作就是, 在这个所要回答的本真之问题的引导上, 进入到对“圆教”的领会与理解中, 通过对这一本真之问题与“圆教”所关切之问题的切身之进入与理解之把握, 从而以这一本真问题为主导的引线将“圆教”的关切释放出来, 以生命之存在对问题的切身涌动而诠释“圆教”之体系, 建构出立根于存在之“无”的新形而上学。

2. 从“别教”到“圆教”: 解构之建构的本体实存

第一部分的核心任务在于揭示、澄明一种能够正当地安立“问题”、“别性”为本真之存在的本体实存论体系。这一体系, 深植于佛教从“圆教”对“别教”之体系的作为解构的还原上。这种解构在根柢上、首先来说, 并非是一个新体系对旧体系的解离与重构, 而是使得一切实存着的实存者作为本体实存的实存本身的有其自身被澄明出来, 对于佛教来说, 这也就是属于“圆教”对“别教”的真正超越, 也就是“第一义空”的建构与澄明。惟在这种第一义空的建构与澄明中, 解构才真正的进入到建构中建基起万物与生命的有其自身。

作者简介: 陈逸舟(2004-), 男, 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现象存在论、宗教哲学。

^①海德格尔. 古代哲学的基本概念[M]朱清华, 译,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9

2.1 “别教”：法执和真妄相别，作为空的第二义化的本体论体系

“别教”对形而上学的体系的建立，蕴含着筹划自身之存在的存在者“人”的一种必然的倾向：“存在的第二义化”，亦即“实存”的本体论化，对于佛教而言，更具体的来说是“空的第二义化”。这样一种建构，很关键的一点在于将混动、随机的实存者由实存本身而把握为在本体论系统中的“物（事情）”，由此能够更好的进行对实存者的筹划与处理。如果存在的第二义化是在本真实存上可以被允诺的事情，那么“别教”也就意味着一种本真的实存形式，即使在“圆教”这种最完满的教法之中亦然留存着“别教”的形式。但在一般的判教之中，如华严五教判的“小始终（别）顿圆”，或天台四教判的“藏通别圆”，圆教意味着对别教（终教）的完全超越，一种全新的本体实存的境界，在那种教法的境地中，意味着传统形而上学体系，也就是无论外道还是至于别教的对体系的建立与支持的完全不可能。那么如果要谈有这样一种本真的形式“别教”，它所描绘的内容是什么？它凭什么能在第一义空本身，在因果缘起对一切的体系建构的肢解断离上仍然得以留存？问题就在于，要看清“别教”的本真形式。这关键且尤其明显的就是说，在“圆教”和“别教”乃至和从小乘教以来一切体系化的教法所蕴藏的形式比较中，看清楚“别教”在空对一切体系的解离而澄明出其自身中，为何仍然残留有这种称之为“别教”的本真形式。为此，文章整篇所关注的内容都不离“别教”与“圆教”，尤其在第一部分中，首先意味着关注“别教”至于“圆教”的进度，非圆教的“别教”建构了什么？圆教又将其解构了什么？残留了什么？惟知如此，方可以进一步审查，并顺着真正的可能进行建基。

为此，在这里首先要论述而描画、澄清的内容是：非圆教的“别教（终教）”之建构。

为了区别于本真形式的“别教”，以及选取的文献内容只专于传统判教中的“别教（终教）”，所以在这一部分的内容中就统一以“终别教^②”而称，其根本的特征在于，将“空”第二义化，建构起了一个净染相分、真妄和合而又相离的体系。

总体来说，“终别教”代表了佛教教法发展中一种体系化的建构倾向，其实质在于将“空”第二义化，即把原本作为实存本身的“空性”，执成为一个与实存界（苦海、烦恼）相对立的、静态的本体界（净土、菩提）。这一体系虽旨在超越世俗执著，却因其内在的“真妄分别”结构，反而遮蔽了“第一义空”如如实存的本来面目。

为了揭示终别教“第二义化”的总体形式，以及接续后文对圆教的澄明，文章选择隋代回应的《大乘义章》的内容作为分析诠释的文献，通过由本体到实存，由实存到有限、具体实存状态的三步澄明描画出“终别教”使得实存本体论化的总体形式“有（法执）分别的实存之体系”，尤其澄明关注其与圆教似是而非的内在区别。

第一步：即妄真心——本体的空洞设定作为最隐微的“隔别”。

真中分二：一阿摩羅識，此云無垢，亦曰本淨，就真論真，真體常淨，故曰無垢。此猶是前心真如門。二阿梨耶識，此云無沒，即前真心，隨妄流轉，體無失壞，故曰無沒。故起信論言：如來之藏，不生滅法，與生滅合，名為阿梨耶。^③

别教在本体论上的起点，是对真心、真如、如来藏等等的设定。然而，在这一阶段，本体被描述为一个能生万法却與生滅合的不生滅法。但却依然在“合”中存有了与“阿摩羅識”的隔别。虽然是隨妄流轉的真心，但却已与当下生灭流转的实存（妄）搭构起了最初的隔别。这一“即妄”而谈的“真心”，并非圆教中“即体即用”的本体-实存的如如实相，而是一个被抽象化、空洞化的能生（一切法）的本体、的本源。这种隔别也是“别教”中最似是而非的与圆教隐微的区别。

②牟宗三开先例如此使用，结合华严五教判与天台四教判所使用的术语，指真妄、净染相别的理教。于华严来说是“大乘终教”的内容，于天台来说是“别教”的内容。

③慧远. 大乘义章[M]，T1851

第二步：起妄之心——实存的“染用”自贬。

染用有二：

一依持用，如來藏法，為妄所依，能持於妄，若無此真，妄則不立。故經說言：若無藏識，七法不住，不得種苦樂求涅槃；

二緣起用，向雖在染，而不作染，今與妄合，緣集起染，如水隨風波浪集起。是以不增不減經言：即此法界，輪轉五道，名曰眾生。^④

在动态开显的层面，终别教将真心随缘起用的过程，主要把握为“染用”的生起。无论是依持用中妄法需依真而立，还是緣起用中真如随缘现起染净诸法，其描画皆蕴含了将生灭无常的实存本身，赋予染、妄、輪轉五道等由本体论认识而来的负面的实存判断，实质是实存对实存不满而筹划实存的在本体论上的自贬。为此，在“空性”的历史（如小乘教、大乘始教）中已经澄明的本体界，就与实存界的属性相对立起来，“生灭”、“流转”这些实存的状态，在本体论系统的实存中就被判定为需要克服和超越的对象。在此，比之“即妄真心”更进一步的，本体之“用”作为实存的不是对其自身的开显，而是其落入染妄世界的沉沦，这种“终别教”所关注、着眼的实存视域整体所包含的更清晰的隔别，就被澄清了出来。

第三步：执妄识心——实存于差别之体系。

阿陀那者，此方正翻名為無解，體是無明癡闇心故。隨義傍翻，差別有八：一無明識，體是根本無明地故。二名業識，依無明心不覺妄念忽然動故。三名轉識，依前業識，心相漸麤，轉起外相分別取故。四名現識，所起妄境，應現自心，如明鏡中現色相故。五名智識，於前現識所現境中，分別染淨違順法故，此乃昏妄分別名智，非是明解脫為智也。六名相續識，妄境牽心，心隨境界，攀緣不斷，復能住持善惡業果，不斷絕故。七名妄識，總前六種非真實故。八名執識，執取我故，又執一切虛妄相故。^⑤

“起妄真心”所描绘的是即真的染用的实存视域，而在“执妄识心”中所描绘的就是流转在染用中的各种实存状态，并且统一的是这种状态可以被“识（執識）”所描绘，因为“我（筹划实存的实存者）”在这种状态中被实存于被描绘为实存于差别之体系中的实存（攀緣不斷、住持善惡），从对法的差别的执取（轉起外相分別取故），色与空的相别（所起妄境，應現自心），以至于根本的在实存之体系上的净与染、真与妄的相别（分別染淨違順法故）。即使终别教已然经过了通始教的般若中观而有了一般形而上学体系所无的“空”的认识，但依然没有彻底逃出染净、真妄相别。

这是因为，以小、始（中观）、始别（瑜伽唯识）、终别（如来藏唯识）、圆的逻辑来说，终别教所关注的“（问题）视域”，乃是在已然有了般若中观和瑜伽唯识，尤其是唯识学之后建立起来的，般若中观的纯粹解构难以解决在苦海（实存）中实存的烦恼，而瑜伽唯识就深刻的将空第二义化提出净染、真妄明确分别的“真如凝然”。而终别教正是要贯通因缘生起的当下即空，和沉沦（实存于）苦海（实存）由此需要对治习气的实存之体系，为此以真如、如来藏为枢纽，承认空观的当下即空，同时又肯认如来藏为本体的唯识体系，就做到了对“真如凝然”的彻底的净染相分的解构，又肯认了苦海的现实将其看作对治习气功夫的不到位。但究其根本而言，仍然是“空”的第二义化，也就是体系化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脱离执取、分别实存的体系之实存。

而对于任何执取、分别实存的体系以及体系之实存而言，所必然面临的的就是所执取之实存的“生住异灭”的无所存、“成住坏空”的无所住。为此，一种真正的、圆满的，要回到实存本身的教法，也就已然酝酿在空性所流溢的一草一木中，而等待阐发了。

2.2 “圆教”：别别为别，别性作为第一义空的自体-实存

^④慧远. 大乘义章[M], T1851

^⑤慧远. 大乘义章[M], T1851

倘若要谈本真的“别教”，就一定要寻着“别教”在实存上的根源，前文已经描画了“别教（终别教）”的实存的总体状态，而现在首先所要做的就是还原，并且不是在另一个形而上学体系（终别教）上的还原，而是真正的更进一步，将实存如其自身的澄明出来的还原，也就是“进入到圆教”，进入到那个所盼望的新体系的解构之建构的根源、萌芽中。

在华严宗中，“华严圆教”又自称“别教一乘”，这一“别教”就不是终别教的别教，而是澄明第一义空，别（别于）别（终别教）为别（别性、法界无尽差别缘起）的圆教，也在这种别教一乘的圆教中，可以清晰的看见理（第一义空、非体系的圆教）教（第二义空、有体系的别教）一如的新体系之可能的根种。

为此，这里以对华严三性一际的澄明与诠释，论述其“别别为别”的解构之建构的复还第一义空，并将理教一如的根种澄明出来。

依他無性即是圓成者，第四明三性空有，即離別中相即之義也。謂依他是因緣所生之法，緣生無性，無性故空，空即圓成，更無二體。……法性宗中，則依他性上無遍計性，故依他即空，空即無性之理，無性之理即是實性。故《密嚴經》云：名為遍計性，相是依他起。名相二俱遣，是為第一義。《中論》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中道義。一因緣上，三義具足，無前無後，故即有即空不相捨離。^⑥

整体来说，三性一际作为对圆教（圓成者）的解构（依他無性）之建构（即是）蕴含着这样的理路内容：

第一，针对的对象是“（终）别教”，即一切未澄明第一义空的第二义化，也即实存的本体论化（体系化）。

第二，捕捉“别教”实存的本体论化的根源在于“有分别性（遍計性）”，对实存的分别、执取而成就了体系。

第三，超越这种体系性实存的建构根柢来说不是构建另一个体系，而是解构式的从整个实存境域上超越（别）于别教（緣生無性，無性故空，空即圓成）。

第四，这种超越是直入中道法界的对一切体系化实存的完全超越，因此并非（终）别教的真妄相分的“但中”，而是空假归中、即空即假的第一义空如如临在的法界性起（空即無性之理，無性之理即是實性）。

为此，本体与实存也就是如如一事（中道義。一因緣上，三義具足）。而也因此，在因緣所生的即空即假之中上，遍计法执性在解构后也就作为法界（本体-实存）的无尽差别缘起而被允诺了，一切的有差别性都作为圓成者本身的华彩纷丽（假）而又金碧辉煌（空）的别性。

正是在这种别性融通的圆融教法之中，在第一义空即有即空的澄明中，本真的“别教”得到了在实存上真正的根基“别性”。

3. 建基：对“问题”的机缘整体-性具万物的体系

在前文对“别教”的描画和对“圆教”的澄明中，已经揭示了“（终）别教”将第二义化的总体形式，也即对实存的执取和分别，从而起净染相分的体系，而“圆教”则通过“别别为别”的解构之建构，复还了“第一义空”如如而在的别性的本体-实存。为此，“别教”也就因为别性得到了实存上的真正根基。然而，这一别性的澄明还并不直接契入到“别教”之建立的真正关节，而是仍然有待进一步追问，将别性之为别性的更深层的实存原因和对别性更深刻的整体认识澄明出来，才真正能够在别性的自身涌动中建基起本真的“别教”，也是第一义空与第二义空互依互证的所期待的新体系。

为此，在这一部分中，本文将会进一步探究别性的实存，由此阐发出新的关键点“问题”。

⑥澄观.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M], T1736

并在对“问题”与“别性”的实存的澄明上，建构出一套关于“问题”的有机体系。这套关于“问题”的有机体系是以对圆教（华严）的法界无尽差别缘起所诠释而得到的“机缘整体”和“性具万物”，所构筑的体用融贯的对“问题”形成万物和生命有机性的切身关注的本体-实存论系统。

3.1 在机缘整体之中的“问题”与“别性”的本体-实存

于圆教而言，“别别为别”已然证成第一义空即本体-实存的如如之境，那么有一根本的问题所要问：如果圆融即是差别，差别即是圆融，那么“别性”本身的实存何以能称为别性的实存呢？这是问：别性如何存在？别性的本体-实存是什么样的形式？实性、体性、佛性之所以为别性的根源在哪里？

为此，就从这一追问出发，我们审视被解构后所谓“别性”的实存视域。于是，在对别性之实存的经验的审查中，我们就发现了一种特殊的视域“问题”，一个在问、在筹划“如何存在”的实存。在这个实存状态中，所呈现的总是一种必要“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是说，总是有这物或那物、这里或那里、去或来、拿或放等等选择其一就意味着放弃其他一切可能的“如何存在”之筹划、决断，在这个视域中，一切的“物（实存者、现成存在者、事情）”都纷繁缘起，要求着筹划“如何存在”的实存（我）做出决断。

为此，我们感到一种烦恼，同时我们想进一步追问：这种特殊的实存“问题”，它意味着什么？

首先毫无疑问的，它是由第一义空解构后的残留，因此它本真的被允诺了。为此，我们不禁想到，这一“问题”之视域、之实存状态，必然不是对圆融的本体-实存本身的破坏，这也就是说，它反而本体-实存本身所必然开显的一件、一种事情。

而我们也发现了一种对解构后的有分别性的直面，不是在一般对圆教证成后的无烦恼、无惑、无染、清净自守、无别任运的状态，而是一种有烦恼、有“问题”、有数不清的物缘起粘连、有在分别中必须做出决断。如此，我们也就看到了别性在实存上的来源：“问题”。

如果说别性的本体-实存是一个因缘升起而使得一切实存在因缘中有其自身、在本体中归其自身的实存，那么正是在这种解构后仍然存在的有分别性，也就是本真的有分别性的实存中，缔造了别性真正的根源。正是在“非此即彼”的分别之筹划中，将圆满的整体切割为了不同的“物”，由此当切割发生时，本体也在因缘升起的运动中被其自身赋予了这种有分别性，惟如此，别性才真正的发生、实存。别性的丰富正在于因缘整体对“问题”的开辟与收容，惟此，别性的本体-实存才是真正一切“物”与生命的有机的实存，没有真正的“非此即彼”的有分别、没有真正的筹划，就没有“物”而承载着物的意义有机运动的生命。

可以说，别性的本体-实存，就是开辟与收容“问题”的机缘整体的，承载着“物”与生命之意义与重量的体系自身。^⑦

3.2 因门义：第一义空对“问题”与本真的第二义空体系的开辟

^⑦ “从这一个观点上看来，譬如今后我们的着眼点是摆在杜顺大师的“华严法界观”、“一乘十玄门”，智俨与法藏大师便经由此而发展出“四法界”，甚至再透过“十玄门”来解说“无穷的法界缘起”，如此才可证明整个森罗万象的世界，绝无孤立的境界，也无孤立的思想系统存在着。因此在四法界中，我们可以说“理法界”与“事法界”要结合起来，成为“理事无碍法界”，然后再从这种非常玄妙的思想领域里面，用向下回向的办法，投到现实世界上面来说明现实世界里面的一切事物，一切的一切都是透过理性的解释，便可以证明它是“事事无碍法界”。于是我们便可以掌握各种差别境界——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再从这里的许多差别境界，将它们贯串总括起来，便成为“一真法界”。这个“一真法界”一定要透过我们近代人所了解的 organistic philosophy (机体主义哲学)，把整个世界当作一个有机体的统一，在名种层次所具有的“事”，就是要说明宇宙里面深刻的“理”，而这个“理”路则必须渗透到宇宙万象的各种层次里去，在宇宙万物的里面，宇宙万事的里面。如此一来，才把一切万有的差别性、对立性、矛盾性等等多元的世界，都能综合贯串起来，成为一个广大和谐的体系。所以华严宗的哲学，我们可以称它为 philosophy of comprehensive harmony (广大和谐的哲学)。”

方东美. 华严宗哲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122-123

在“问题”作为别性之实存根源得以澄明之后，我们面临一个根本性的追问：第一义空作为本体-实存的如如之境，何以能开展为第二义化的体系？

回顾前文，“（终）别教”所代表的第二义化形式，在于它将“空”第二义化为一个与实存界相对立的本体界、是清静自在的果地，同时也是自贬实存界为现象（表象）界、是沾染纷乱的因地。圆教的建成在于“别”此第二义化（别）为本体即实存的别性之实存别教一乘，然而，别别为别，在圆教如此的解构之建构中，第二义化被消解的是对实存无始的执取与分别，而并非否认了本真的有分别性的实存，也就是“问题”。

所以，倘若要谈第二义空的体系，要谈本真的“别教”，就必须首先关注于“问题”的实存中。如果说第一义空是别教一乘、是可能被建构的新体系的非体系之自身，那么，这个新体系之的非体系之自身如何作为直面的、实存着的第二义化的体系，就一定在于第一义空对这个新体系的由自身而出且有其自身的开展。

为此，在华严圆教的建构中，相较于一般的对本体-实存整体的描画不同的一个描画，一个专门针对“有分别性”之实存的描画“因门六义”，就出现在了视野中。文章在这里，也将通过对它的诠释，证成“因门义”，作为别性的本体-实存对第二义化体系的开辟。

谓一切因皆有六義：

一，空有力不待緣。（初者是剎那滅義。）

二，空有力待緣。（二者是俱有義。）

三，空無力待緣。（三者是待眾緣義。）

四，有有力不待緣。（四者決定義。）

五，有有力待緣。（五者引自果義。）

六，有無力待緣。（六者是恒隨轉義。）^⑧

与“四法界”、“六相”、“十玄门”等对别性的本体-实存的整体进行描画不同，“因门六义”同样是一种对实存整体的本体-实存的描画，因此也是先天性的描画，但其不同就在于，其潜在的意味着专对“因地”的一种实存整体的描画。如果看到这一点，就立马摸索到了一种开辟、展开，也就是我们所想要把握的第一义空、机缘整体如如临在而创化、开辟出的第二义空的体系的展开。

审查因门六义，会发现剎那滅……恒隨轉等六义，都意味着对在“因（地）”之“物（实存、现成实存者整体）”的在果地的描画，也就是对其在因缘生起中的有其自身，而在本体中的其所归属的描画。

如果审查这种第一义空自觉的第二义化，我们会发现，在这种自觉的第二义化中，从对第二义空的实存视域，也就是处理着“非此即彼”而要“由此（因）达彼（果）”的“问题”之实存审查来看，每一“因”中都蕴含着其与“果”的关联（因果缘起）——或空或有、或有力或无力、或待缘或不待缘，因与果并非是在“（终）别教”中净染相分、體是根本無明地的隔别，而是蕴藏了内在关联，与因地（实存界、现象界）隔别的果地（本体界）就是因該果海、果徹因源^⑨的由体达用、不可知而知知的呈现在因地（现象界）介入判断中，给予了判断作为实存自身、也就是本体的一种先天性的、充实其动机的辅助，可以称之为“先天判断机缘”。

从第一义空的视角来看，本体-实存的先天性机缘无时不刻流转在如如显现的实相（無性之理即是實性）中的先天机缘，而对于需要判断这一第二义化的，也就是因果相分但又融通的“问题”中，也就成为了由体达用的一种先天性动机，因为这种动机对判断起到在根本

^⑧ 此处引文做了括号连接用于解释的处理，括号前的内容和括号后同属一段，中间以“二釋相者”连接。

法藏，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M]，T1866

^⑨ 澄观，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M]，T1736

上保证了某些正确动机的作用，也就可以称之为“先天本体论系统的判断动机”。这一判断动机既包容万有、自在缘起之中，但又不武断全权，而是作为在机缘整体（第一义空）中的一种保障了一些本真的动机的“建议（先天判断动机）”实存在“问题”的判断中。这一本真的第二义化的体系也就由此被建基了起来，其本质是第一义空作为体系自身在“问题”之视域中的开显。

3.3 开阖“问题”的机缘整体-性具万物的生命有机体系

通过对“因门义”的阐发，对第一义空的体系自身和第二义化的体系的建基也基本开辟了出来。在这里，作为文章的最后一节，将会整合并理清整个本体-实存的体系自身与体系化的建基，由此彻底建构出来一个开阖“问题”的有机体系。而其中重要的关节在于，围绕“问题”的“开阖”，就别性的由因缘生起所解构之建构出的本体-实存，说明并贯通实存的机缘整体性和性具万物性。

首先，机缘整体即是“物”作为实存者在因缘生起中的有机互动，本体-实存被描画为机缘整体，在于其既是作为现成实存者的实存整体的机缘整体，也是作为（现成）实存者自身在本体上的机缘整体。而现成实存者就是在实存整体中作为机缘整体并且因此在作为现成实存中有其自身，因而获致了在本体上的实存者之自身，也使得本体如实存的作为机缘整体。

而在其中，这种实存、现成实存者的有其自身，就体现为实存的性具万物性和本体的性具万物性，“本体-实存”这一术语所描画的特征就是这一性质，本体与实存如为一事的存在。而这种实存即本体的如为一事，在对第二义体系的开辟中就作为理教一如的根基，也即第一义空自身的第二义化，第一义空即体系自身。并且华严以因果缘起-理实法界^⑩为宗，就在于机缘整体作为实存对本体的敞开，同时也是本体对机缘整体的临在，无尽差别的缘起就是清静恒在的法界，用即是体，体即是用。因此，别性的本体-实存就是机缘整体-性具万物的本体-实存。

如此，当谈及“问题”的时候，就更能清晰它作为一种承载着“物（事情）”之意义与重量的生命的昭出和创化。

在“机缘整体-性具万物”的体系中，“问题”是别性作为本体在将一切真正实存昭出，也就是将“物”，一个与他者相别的实存者，以及筹划着实存的那个在实存的机缘运动中被天然的赋予了意义与生命的特殊实存者“我”的昭出。在实存的视域中是没有“外物”的，物自体不可知，真正的体系与动机都系于这个在黑暗、虚无中打破、创造出实存者的视域，正是在“问题”中，将这个完满但又虚无的圆分割成了无数与他者相异的实存者，以及占据了实存的中心点或者说重点的“我”，“我”作为特殊的实存者占据了视域的全部，并且承担着这些有其自身的“物”的核心之重，展开着生命与筹划。这就意味着，对“我”来说，“问题”就是“我”的生命全体的展开，作为联结着一切“物”而实存着的“我”，“我”有一种天然的使命同时也是实存的意义，就是在运动之中承载着一切“物”使其有属于自身。

尤其当解构之建构完成后，一者意味着在根本上对这些“物”的承载不再意味着教条的律令和外在的法则，反倒意味着让其有属自身的解放，作为一种生命本身的运动。而另外，更为神圣的意蕴就闪烁在这种解放之中，对“物”的筹划在解构中由执定的体系中解脱出来，由此实存不再被贬低为现象（表象），一切都失去链接悬浮在虚无之中，没有执定的同时也只有真正对“物”的承载才使得生命不会在虚空之中失重，因此相较于传统形而上学的神化与教条式的实存追求来说，一种更伟大也真正神圣的追求也就自生命自身涌现了出来。链接的失去反倒意味着对枷锁完全的挣脱，因为对“物”的、对一切实存者本真的承担所需要的是生命奔放的真正冲力，和在虚无、混乱、毫无执定，即使曾经引以为豪的先天理性演绎也

^⑩ 法藏. 华严经探玄记[M], T1733

只能沦为不可能断定任何陈述的建议性的先天动机,但也正是如此,生命与信仰才如为一事。摒弃虚伪的,为神圣的境地知道没有封闭的生命,对“问题”的昭出与解决,才是对信仰真正的负重。在机缘整体-性具万物的目光之中,对现成者的“超越”本身已经降临在现成者中,生命可以理所当然的抓住这一触角,然后以他全部的力量行为,因为早已经没有了枷锁,神圣就是生命要将他自身创化而出的冲力,故而理所当然地愿意面对自己真正的坎陷和“问题”,因为他载负着自己。

在空的开与阖中,缤纷多彩的“物(法)”与庄严神圣的“神(佛)”如为一事,包容、开辟、吞吐、呼吸,生命开辟着自身,创造着神圣。

4. 结语

文章旨在对生命建立一种真正可靠的根基,而这种根基为了使其自身有重就必然回到那个让一切创生的源点,也就是“问题”。这不是说要求了一种主动的解决问题的律令,而是将“问题”作为存在的本真所有而澄明出来,让开阖“问题”这一生命在机缘整体-性具万物的把握中,将其作为生命有机的运动创化的一个必然被澄明出来,并且通过对这一作为焦点的使有其存在(使别性存在)的关键,把握住“问题”不同于一般机缘整体的实存视域的特殊性,由此能够更合理的筹划着生命与“物”的实存和有机运动。

参考文献:

- [1]海德格尔. 古代哲学的基本概念[M]朱清华,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9.
- [2]慧远. 大乘义章[M], T1851.
- [3]澄观. 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M], T1736.
- [4]方东美. 华严宗哲学[M], 北京:中华书局, 2012: 122-123.
- [5]法藏. 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M], T1866.
- [6]澄观. 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M], T1736.
- [7]法藏. 华严经探玄记[M], T1733.

The Organic System of "the Problem" Brief Explanation——An Ontology-Existenziology Interpretation of the System in "Perfect Teaching"

CHEN Yizhou

(Daluoshan Buddhist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Wenzhou, Zhejiang 325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Buddhist "Perfect Teaching" system,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struct an Ontology-Existenziology system rooted in the "Emptiness of the Being itself (第一义空)", in response to the existential predicament of homelessness faced by modern individuals.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eparate Teaching (别教)" and the "Perfect Teaching (圆教)", the paper reveal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Separate Teaching" which reifies emptiness into a secondary meaning (第二义空) and constructs a system based on the separation of the true and the false. It further elucidates how the "Perfect Teaching", through the deconstructive construction of "Separation-as-(Non-)Separation As (Non-)Separation (别别为别)", returns to the Ontology-Existenziology of "Separate Nature (别性)" as the suchness-presence of the Emptiness of the Being itself.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further proposes "the Problem (问题)" as the root of the Existenz of Separate Nature. Drawing from the system foundation of the "Karmic Organism - Inherent Nature Possessing All Things (机缘整体-性具万物)" derived from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Huayan Perfect Teaching, it constructs an organic system focused on "the Problem". This system not only loads "things (Existents)" and "life (the I, as the Existenz that projects how to exist)" with meaning and weight, but also provides a foundation for metaphysics based on an organic system grounded in "Emptiness (空性)".

Keywords: Perfect teaching; The problem; Separate nature; Ontology-existenziology; Organic system

摄影与心理学的视觉感知与摄影创作的关系研究

乐滋威

摘 要：摄影这门视觉艺术紧密联系着人内心活动看复杂过程，本文心理学原理悄悄影响拍照和看照片，在画面里格式塔理论视觉感知机制神经美学扮演重要角色，剖析视觉感知基本法则对拍照构图表达美作用，看见创作行为和内心反应深层对话，掌握视觉感知心理机制不提升作品艺术力量和传播效果，能看清理解眼前世界，这为摄影理论突破实践创新打下心理学基础，格式塔知觉组织法则比如图表原则为构图提供科学依据闭合性简化认知提升美感相似性增加复杂感觉引起探索兴趣，视觉感知本身被看作是从下往上感官信息和从上往下认知框架互动结果，烙印着创作者观看者各自心理地图，神经美学更打开好作品在神经层面平衡预测误差与认知奖赏秘密，研究发现拍照创作本身被看作强有力心理构建行为，通过视觉故事帮助个人组合零散经验表达隐藏情感编织自我世界意义网，本文从学理与应用出发，勾勒出一个基于视觉认知原理摄影创作框架，为摄影教育、创作与批评提供一份来自心理学视角独特方法论指引。

关键词：艺术美学；摄影心理；摄影理论；视觉与讲述；格式塔原理；未来科技

一、引言

摄影从诞生开始，就慢慢成为一种重要工具，它既能记录现实，能传递信息，能进行艺术表达，是，一幅摄影作品为什么能吸引注意力？为什么有些照片能深深打动人心，甚至帮助人、改变人，而有些很快被忘记？问题答案，不只是关于摄影技术或艺术手法，更和“人类视觉感知心理机制”有关，看东西不只是光线照在眼睛上那么简单，它实是一个复杂心理过程，这个过程包括注意力分配、记忆参与、情感激发和认知整合，摄影师用镜头拍下照片，实际上是对人眼看世界方式一种模仿和再创造，到达看照片人内心，最近，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不断发展，摄影和视觉感知之间关系经引起学术界很大关注，比如，唐大崙等人用眼动追踪技术做研究，发现不同摄影构图怎样引导人视线移动和认知处理，艺术心理学研究进展，在解释抽象信息和视觉心理之间关系，实证研究解摄影作品艺术表现力和情感冲击力，提供越来越坚实科学依据，是，一个根本问题一直存在于摄影理论和实践中：为什么有些图像能立刻抓住我们注意，引起强烈情感共鸣，让人长时间记住，而大多数图像被快速忘记？这个问题答案，很明显不只是关于摄影技巧或表面美学原则，它根子在于人类“视觉感知心理机制”和“认知加工基本规律”，人视觉系统不是一个被动接收光信号简单工具，相反，一个高度复杂且主动构建“心理加工系统”，这个系统遵循它自己组织规则，受到个人过去经验影响，和情感系统、记忆系统意义理解系统紧密相连，所理解摄影创作和接受过程，实际上就是理解人怎么“看”世界，怎么把看变成有意义视觉表达。

本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

第一是理论层面：有助于构建摄影艺术认知科学基础，弥合人文艺术与自然科学之间治愈学科鸿沟。

第二是实践层面：为摄影师提供基于视觉认知原理创作方法论，提升图像表达效率与艺术感染力。

第三是教育层面：为摄影教学提供科学化训练框架，帮助学习者理解视觉语言心理机制。

作者简介：乐滋威，男，大专，研究方向为摄影心理与视觉的关系。

研究问题与方法

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核心问题：

1. 人们是怎么观看和理解照片？知识怎样才能系统地用在拍照时构图和分析照片上？
2. 我们大脑有两条主要处理视觉信息通路，这两条通路是怎样影响摄影师创作和观众看照片体验？它们又是怎么一起工作。让我们觉得一张照片有意义？
3. 用神经科学方法看，那些大家都觉得好照片，我们大脑在处理它们时。到底是怎么工作？大脑哪些部分和活动让我们觉得照片好看、有感触？
4. 拍照这个行为，对拍照人自己有什么心理上影响？外界画面带来直接感受，和拍照者自己想法、情绪。是如何互相影响塑造他心理状态？
5. 怎么能根据我们对美和认知基本原理。总结出一套实用、系统拍照方法和照片分析技巧？
6. 上面研究能不能明确地指导我们如何在摄影中表达和传递情感？

我主要用两种方法来做这个研究：

一是把不同学科书和文章放在一起看。

二是自己进行理论分析，我们会仔细阅读和整理心理学（主要是认知心理学和神经美学）、视觉艺术理论和摄影研究领域相关资料，找出重要概念和理论。

我会找一些有代表性经典照片例子，看看心理学原理在实际作品中是怎么体现、效果如何，我们把不同学科观点结合起来，试着建立一个能解释人们如何创作和理解照片心理学模型。

一、摄影与视觉感知的基本共生关系

（人们是怎么观看和理解照片？知识怎样才能系统地用在拍照时构图和分析照片上？）

摄影和视觉感知有基本联系，它们一起影响我们对视觉世界理解，从生物过程看，视觉感知从眼睛接收光线开始，通过神经传给大脑，从心理过程看，这个活动包括从看到东西，到整理信息，再到认出什么完整步骤。

摄影是一种依赖视觉艺术，它创作和观看都人视觉能力为基础，视觉感知特点反过来影响摄影表现方式。人的视觉系统有一些基本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我们怎么看照片：

选择性注意：视觉会自动从画面找出重要结构，可以省略不重要，看照片时，这能让我们快速注意到画面关键部分，就像照片的某个颜色特别亮颜色或对比比较大的地方会自然地吸引人的目光。

知觉组织：大脑不是被动接收画面，而是会主动把看到东西整理起来，让它变得有意义，这个整理过程遵循一些心理规律，格式塔心理学总结规律最有系统性。

视觉恒常性：看角度、距离或光线变，我们是能认出一个东西本身样子，能力让我们在看不同照片时，对同一个东西理解能保持一致。

（一）摄影本身有两种重要属性：

第一：它靠物理和化学（或电子）过程成像，所像是现实世界“痕迹”。

第二：它又是非常主观和经过安排，每一张照片都包含拍摄者选择角度、抓住时机、安排画面和后期处理各种。

双重属性让摄影很适合用来研究视觉认知，从认知角度看，拍照这个行为模仿我们注意力和记忆力选择过程，按下快门时，不光是记录世界一个片段，是从连续视觉经验中，切出一个瞬间、一个角度和一个关注点，这体现摄影“视觉认知延伸”核心。

（二）摄影画面结构特点，和我们视觉处理方式有很多对应地方。

1. 照片中细节和整体分布，对应视觉系统同时处理不同粗细信息能力。
2. 控制景深可引导观众注意层次，这模仿我们视觉中聚焦中心和忽略背景方式。
3. 动态模糊和高速抓拍这两种效果，则分别对应视觉系统处理运动信息两种不同模式。

二、人类视觉系统的认知架构

（我们大脑有两条主要处理视觉信息通路，这两条通路是怎样影响摄影师创作和观众看照片体验？它们又是怎么一起工作。让我们觉得一张照片有意义？）

人类视觉系统是一个分层次、分步骤的信息处理系统。

第一阶段：是早期视觉处理，主要在视网膜和初级视觉皮层，它工作是获取图像基本物理特征，比如边缘、线条方向、明暗对比和物体移动方向，重要研究证明，大脑里有些细胞专门用来识别特定特征，在拍照时，基本特征就像是图像原始素材，它们直接这张图是否醒目和吸引人。

第二阶段：是中期视觉处理，它负责把上面那些零散特征组合起来，变成我们能认出来物体和它们之间位置关系，这个阶段要做事包括：把图形和背景分开、判断远近，有初步认出物体，我们拍照时调整景深、安排画面、突出主角，实就是在引导大脑完成这个组织过程。

第三阶段：是高级视觉处理，这时大脑会认出物体是什么、确定它们在哪，理解图像含义、产生情绪感受，这个阶段会大量用到我们过去记忆、掌握知识和个人经历，正同一张图片，不同人看常常会有完全不同理解和感受。

三、摄影作为视觉感知与图表延伸

（用神经科学方法看，那些大家都觉得好照片，我们大脑在处理它们时。到底是怎么工作？大脑哪些部分和活动让我们觉得照片好看、有感触？）

摄影师创作时，实是在模仿和引导观众怎么看，他们通过选择拍什么、怎么安排画面、控制光线和抓住关键一刻，有选择地呈现看到东西，这么做，是让观众按摄影师意图去理解照片、感受照片，所说，摄影不光是记录现实技术，它是对我们如何“看见”这件事一种解释和呈现。

关于视觉心理研究支持这个过程，Zakia 在《感知与影像》里说得很明白：搞清楚我们怎么看，为什么看，能帮助创作者做出更能打动人、更好懂作品，这展现出，摄影创作和观看原理之间关联很关键，当摄影师明白眼睛和大脑是怎么工作，他们就能更好地安排画面里内容，引导观众视线移动，就能带来他们想要情感回应。

（一）图表原理在摄影构图中运用

格式塔有一个中心想法，认为整体比零件部分加起来都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解释我们怎么看都是一个基础，这个理论认为，人在看东西时候，会先注意到整体大该样子，然后才会去看局部，这个道理在摄影构图里用得很多，眼动实验为这个想法提供强有力科学实验证明，也用图表清楚地展示出来了，很详细，下面我也做了个图表。

（二）主要图表原则在摄影中表现

下面这几个摄影构图特别有帮助：

相似性原则：相似元素，比如形状、颜色、大小或纹理，会被看作一组，所，在摄影中，用相似性可做出模式和节奏，让图像更有序。

闭合性原则：当图像信息足够不完整时，人视觉系统会自己补全缺失部分，形成完整感知。

连续性原则：视觉系统会把在一条线或曲线上元素看作一个整体，所，在摄影中，像河流、道路、行列东西形成线条，可引导人视线在图像中移动，做出视觉路径和节奏。

主体与背景关系：视觉系统会自动把场景分成主体和背景，所，清晰主体和背景关系，有助于快速传达图像主题。

格式塔原则	在摄影中的应用	产生的心理效应
相似性	使用形状、颜色或大小相似的元素创建模式	增加视觉复杂性，引发探索兴趣
闭合性	有意省略部分视觉信息，留下想象空间	简化认知，增强美感和参与感
连续性	利用线条或曲线排列引导视线移动	创造视觉流动感和节奏感
主体与背景	通过对比、模糊或反转强化或弱化主体	影响主题明确性和视觉冲击力

表：图表摄影中的应用及心理效应
(附带图片参考)

相似性



闭合性



连续性



主体与背景



四、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处理

（拍照这个行为对拍照人自己有什么心理上影响？外界画面带来直接感受，和拍照者自己想法、情绪。是如何互相影响塑造他心理状态？）

（一）自顶向下自底向上处理

拍照这个举动会对拍照者本人心理造成怎样影响？外界画面给予直接体验，与拍照者自己想法、心境。是怎样相互影响塑造心理情形？

视觉信息处理牵扯两个基本方向：自下而上处理，在摄影欣赏过程里，这两个过程配合协同开展，一起构建我们对图像领会：

自下而上加工处理：当观者初次看到一张照片之际，视觉系统起初处理图像低级特征，诸如颜色、对比度、边缘与运动之类，特征在无意识范畴吸引注意力，对最初注视位置持续时长造成影响，高对比度区域、鲜艳色彩、清晰边缘会自然地吸引大家视线，成为图像视觉聚焦点。

自上而下处理手段：按照观者有知识、经验期望，高级认知过程影响我们对图像做出解释与评价，在看一幅描绘木桥照片之际，就算木块大小有别、间距不等，我们往经验依旧能助力我们把它认成桥梁，自上而下处理让观者可跳出物理特征局限，体悟图像象征意义跟文化底蕴。

处于摄影创作活动中，成功图像一般会在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处理之间形成和谐关系，强劲视觉元素吸引观者目光，而深层意义情感可保持观者兴趣引起共鸣。

（二）阿恩海姆视觉思维理论

鲁道夫·阿恩海姆的审美与感知、在心理学理论使摄影艺术产生比较远的改变，阿恩海姆对传统知觉与思维观点发起了挑战，提出知觉本身就是一种思维形式，视觉感知不是普通的东西，而是对视觉大概念的主动吸收进来。

阿恩海姆理论有多重应用：

视觉力结构：摄影图像内视觉元素被认定为一种“力”结构，各类方向、大小与强度视觉力相互起作用，造就动态化平衡，摄影师凭借构图、对比和布局来编排视觉力，造就富有表现力画面，对角线一般传达动感和不稳定感，而水平线会传达出稳定与平静感觉。

知觉概念形成：观者在观赏摄影作品之际，非被动接收画面，而是借助知觉活动主动构建概念，一张出色摄影作品可引领观者借助视觉形式领会抽象概念与情感内容，不用借助语言作阐释。

整体性表达：按照阿恩海姆看法，成功艺术表现依靠整体形式统一性，各个部分化合为一个有机整体，这说明所有视觉元素，光线、构图、色彩、质感要一起配合做事，传递统一艺术意图跟情感成效。

（三）认知与情感互动

视觉感知不光牵扯到信息处理内容，存有“情感维度”，Jones 研究证实，我们对图像初始阶段生理和情感反应会影响对真实性评判，较高神经生理情感唤起预测参与者图像判断为“真实”性，观看期间感受在我们和图像关系里起到关键作用，至少部分地对我们在图像驱动文化里信念起到作用。

摄影实践启示意义重大：

情感冲击力：会唤起强烈情感反应图像，一般被认为更真实、更有影响力，这解释纪实摄影和新闻摄影当中，那些抓取到强烈情感瞬间作品为啥往往最有说服力和记忆亮点。

直觉性创作：许多摄影师在创作活动里依赖直觉跟本能，这实是对视觉场景内情感潜力灵敏反馈，经由培养敏感性，摄影师更高效地抓拍拥有情感共鸣图像。

五、从神经美学角度对摄影图像评价

（怎样凭借我们对美和认知基本原理。归纳出一套实用、系统拍照技法和照片分析要点？）

神经美学这门新兴学科，尝试从神经科学方位去把握艺术体验生物学基础，即便神经美学无法完全诠释艺术内涵，它能帮助我们弄明白为啥有些图像比他图像更让人难忘怀、更成功，领域研究为摄影艺术赋予新见解和评价框架。

（一）预测编码理论与摄影欣赏

预测编码理论为，视觉感知和审美体验构建较强的框架，理论的说，人脑一直凭借过往经验产生对感官的输入预测，且仅仅处理与预测不相符预测误差，在拍照欣赏这个阶段。机制体现出以下概念：

新奇比较与熟悉：极为符合预测照片也许会被觉得乏味；而跟预测差异极大新奇的图片又难以领会，成功摄影作品大多在熟悉跟新奇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并既给予一定已知挑战，又让作品维持可理解的地步。

认知努力与回报：当观者应对图像中视觉谜题时，如搞懂不一般视角、剖析复杂构图或领会细微概念，所涉认知付出会带来更高级满足感，只要努力可获得足够认知报偿。

（二）摄影图像成功因素

从神经美学角度去分析。成功摄影图片一般会有下特性：

可识别性：图像内容清楚易懂，可清晰辨认，不会引起认知超载现象，采用闭合性原则进行构图能让认知更简单，让视线更聚焦，由此增添美感。

情感共鸣：图像可唤起观者情感触动，反应往往跟生理唤起是相关，且会影响对图像真实性与价值判定。

记忆留存：有成效摄影作品初次看过后仍会停留在观者记忆里，般源自别具一格表现手法、情感冲击力或概念深度。

（三）摄影创作中心心理暗示与个人视角

摄影不只是记录外部世界，是摄影师内心世界吐露，在从事创作过程之际，摄影师心理状态、记忆和个性深刻左右着作品形成，而心理成分又经由视觉形式传达给观者，造就复杂心理互动现象。

（四）个人视角与自我呈现

Niese 等人研究对个人摄影里视角选择心理影响展开，拍摄个人生活片段时，人们可挑选第一人称视角，视角抉择对图像构图产生影响。与图像意义表达记忆功能紧密维系：

第一人称视角：当人们试图捕捉事件物理体验时，更易采用第一人称视角照片，视角聚焦拍摄者当时实际视觉体验，更直接地跟感官和瞬间感受形成关联。

第三人称视角：当一个人打算拿起相机拍下一件事意义而非物理体验时，就有机会采用第三人称视角拍照，把自身包含在某种构图的强调个人在事件里主角与位置，就更加能用呈现具有象征情感性质构图方式。

研究发觉，当视角跟拍摄目标相吻合时，人们对自己照片更喜爱，发现不只是在个人快照上适用，对专业摄影创作同样具备启发意义，明确创作意图与对应视觉表现方式相匹配时，

作品一般更有说服力和满足感。

（五）视觉隐喻与心理表达

摄影师往往借助视觉隐喻表达心理状态跟抽象概念，吉奥夫·斯蒂芬作品借助镜子打造虚实结合场景，造就视觉心理多重革新，手法造就视觉趣味，引发观者对真实跟虚拟、记忆与现实关系思索。

在艺术摄影范畴中，抽象信息表达越来越被看重，伴随社会进步和媒介变迁，具象艺术难契合大众当下审美需求，摄影艺术从强调真实记录与传播，发展到对“视觉化”“艺术化”“影像化”有高标准要求，愈发关注不同视觉思维所造成心理感受差别，抽象跟具象融合，给艺术摄影呈现方法注入新活力，使摄影师更直接地去探寻内心世界，表达概念思考。

神经美学属于一门新出现交叉学科，想要从神经科学维度把握艺术创作与欣赏生物学基础，虽然早期研究大多是聚焦于绘画跟音乐，近些年摄影渐渐成为关键研究对象。

神经美学为摄影研究赋予三个关键视角：

神经关联性研究：采用脑成像技术，在特定种类摄影图像所激活的图片，美感体验往往涉默认模式感官，而非令人心烦图像。

在进化艺术视角：钻研人类对某些视觉偏好进化起源，摄影中普遍存在风景如画的审美，大概来自人类祖先对自然资源充裕、眼界开阔、有地方或领地的喜爱，对于进化而言，这类环境体现出安全与适于生存的优势。

跨模型态对应：研究视觉特征跟他感官体验之间有密切性联系，明亮色彩常跟超响的声音、味觉关联；尖锐形状跟难听的声音、痛苦感受是有关联，跨模型态对应可起到强化特定情感或概念表达作用。

六、研究发现对摄影情感实践起到明确指导效果

（上面研究能不能明确地指导我们如何在摄影中表达和传递情感？）

（一）摄影认知与情感调节工具

注意力重新定向：摄影时拍摄者需高度聚焦于视觉场景，过程本身展现出正念冥想某些特性，让注意力汇聚到当下时刻感官感触，减少对内部担忧反复考量，好些摄影师叙述拍摄时心流体验，即处于完全沉浸到视觉探索里状态。

情感处理与意义寻找：在经历艰难或创伤性经历后，采用摄影记录而后重新审视相关场景，有利于个体应对复杂情绪探求积极意义，治疗性摄影正是按照原理，借助指导性拍摄任务，辅助人们表达难说出口情感，重新打造对经历认知。

认知重构训练：摄影引导人们用新视角去看熟悉环境，查找少见构图、光影瞬间，视觉探索本质上类似于一种认知灵活性训练，培养人们冲破常规思维模式，探寻事物新方面和新联系本事。

摄影教育：把视觉感知心理学纳入摄影教学课程体系，推动学生弄懂视觉认知原理，更有效地牵引观者视线和情感反应。

创作实践：摄影师可依据格式塔原理视觉感知原则，更有意图地组合图像元素，改良视觉表达成效。

图像评价：批评家和策展人结合心理学指标（比如视觉注意力分布、情感反应强度）对摄影作品艺术价值传播效果进行评价。

（二）后续研究探索以下方向

跨学科整合：结合神经科学、心理学、艺术理论加上社会文化视角，建成更周全摄影艺

术评价模型。

技术应用：采用眼动追踪、生理测量与脑成像等技术，或虚拟制作画面技术等，实时去监测观者对摄影作品反应情形，为创作给出直接性反馈。

文化差异：剖析不同文化背景观者对摄影作品感知上差异，探查视觉感知普遍共性与文化特异性。

（三）未来研究方向

跨文化摄影认知研究：系统对不同文化群体对相同摄影图像反应差异做比较，识别视觉认知普遍规律跟文化特殊性质，非西方视觉传统对摄影创作与理解造成潜在作用。

动态与沉浸式影像认知分析：探查动态影像叙事理解机制、虚拟现实摄影里身体参与效应、交互式影像中认知负荷情况等新兴领域。

创作过程认知科学研究：采用便携式眼动仪、生理监测设备研究摄影师实际拍摄情况下认知过程，辨认专家与新手注意模式差别，创作进行时心流状态神经关联事宜等。

摄影长期心理与社会影响：纵向去研究特定类型摄影（像家庭摄影、旅行摄影、社会纪实摄影）对个人身份形成、家庭记忆、社会态度转变长期影响。

人工智能摄影认知影响：探究 AI 生成图像和传统摄影在认知处理、真实性判定、情感反应伦理认知上差异，研讨 AI 时代摄影本质再度定义。

结论

摄影跟视觉感知心理学深刻联系，人类认知与艺术创造核心纽带，本研究摄影创作远远不只是技术操作或者美学追求范畴，从本质上看，视觉认知外化实践和心理建构主动活动，经由镜头观察、选定和框取世界整个过程，我们不只是在记录外部实际情形，在演练呈现我们独有认知方式与生存体验。

格式塔知觉组织法则为摄影构图铺就科学基础，解释为啥部分视觉安排能达成和谐、统一效果，而别一些则引发紧张或者杂乱现象，视觉处理双重路径模型阐明，成功摄影作品得在刺激带动感官吸引跟知识带动意义解读之间形成动态平衡，神经美学研究从生物学维度优秀摄影作品怎样通过调节预测误差、激活奖赏系统促进自我参照加工，引发深刻又持久审美体验。

从实际操作层面看，熟悉视觉认知原理可为摄影创作提供一套系统方法学引导，助力摄影师更有效地引导观看者关注、情感与思考，创作出既拥有视觉冲击力又饱含心理深度作品，就摄影教育方面而言，采用认知科学视角能促进学习者对视觉语言原理领会，超出单纯技术模仿与直觉创作途径。

从更宽广人文层面视角看，摄影现代社会里主要视觉媒介，展现我们怎样去观看世界，切实地塑造着我们认知习性、记忆结构和情感体验，在图像充斥数字时代，培养对摄影心理层面认知，是增进视觉素养关键，同样是推动批判性思维、共情能力和自我认知深化重要途径。正如好些实践者所觉察，一种“认知与情感渠道”，它从对外部光线物理捕捉开启，经过复杂神经推算与心理统筹，得到意义明朗呈现与人性强烈共振，整套流程，从视网膜过渡到大脑皮层，从个体情感过渡到集体记忆，恰恰是摄影艺术永恒魅力科学诠释与人文要义，借助继续开拓丰富又复杂交叉地带，我们可深化对摄影艺术认识，能更敏锐地洞察人类心智借助视觉形成意义非凡才能。

作用维度	理论/实践	对领域的贡献
理论层面	摄影艺术的无限可能，提供来自本人摄影实践中与心理学的独特方法论与评价逻辑。	推动摄影突破与创作，对教育与更坚实的依据与分析逻辑。
创作与实践	摄影具有治愈与被治愈的独特魅力，也为社会提供或补足了不为人知的视觉差异。	提升图片的表达效率，摄影与情感冲击力，使摄影具有治愈与被治愈的能力。
未来	提供科学化训练框架，帮助想从事摄影的学者可见的心理机制，超越自己。	培养更多具有素养与创作思维的摄影家，照亮社会中黑暗的小角落。

以上图表仅展示本文的三个维度之间的交叉效果

参考文献：

[1]陈亦方. 探析艺术摄影中抽象信息与视觉心理的呈现关系[J]. 西部广播电视, 2023, (5): 150-153.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sual Perception in Psychology and Photographic Creation

LE Ziwei

Abstract: Photography, as a visual art,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 complex processes of human inner activities.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psychological principles subtly influence photography creation and photo appreciation. In photographic images, Gestalt theory, visual perception mechanisms and neuroaesthetics play crucial roles. It analyzes the effect of the basic laws of visual perception on photographic composition and aesthetic expression, revealing the in-depth dialogue between creative behaviors and internal psychological responses. Mastering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of visual perception can not only enhance the artistic appeal and communication effect of photographic works, but also enable people to perceive and understand the world from a clearer perspective. This lays a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of photography. Gestalt principles of perceptual organization, such as the principle of figure-ground,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photographic composition; the principles of closure and simplification improve cognitive efficiency and enhance aesthetic feelings; the principle of similarity enriches the sense of complexity and stimulates the audience's interest in exploration. Visual perception itself is regarded as the interaction result of bottom-up sensory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top-down cognitive framework application, which is deeply marked by the respective psychological maps of creators and viewers. Neuroaesthetics further uncovers the secret that excellent photographic works achieve a balance between predictive error and cognitive reward at the neural level.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photographic creation is itself a powerful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 activity. Through visual storytelling, it helps individuals organize fragmented experiences, express hidden emotions and construct a network of meanings for their self-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theory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is paper outlines a photography creation framework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visual cognition, providing a unique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from the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for photography education, creation and criticism.

Keywords: Art aesthetics; Photographic psychology; Photographic theory; Vision and Narration; Gestalt principles; Future technology



环球未来出版社
Global Future Press

一家以国际化视野与前瞻理念著称的高端出版机构，肩负知识与文明传播的使命，致力于引领学术与文化的未来发展。出版社秉持“传播知识、服务学术、连接未来、承载文明”的理念，出版范围涵盖多个领域，打造跨学科、跨地域、跨文化的未来灯塔。出版社以严谨与卓越为根基，全面遵循国际出版规范与同行评审机制，确保成果具备原创价值与全球公信力。对接世界主流数据库，赋予学者学术可见度与世界影响力。依托国际化编委与顾问团队，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学术服务体系。

www.gfpress.org

权责声明

本刊所刊载的文章及观点均由作者独立撰写并承担相应责任，不代表本刊及本社的立场或意见。文章内容的合法性、学术性及可行性均由作者本人负责，文中引用的资料、数据及观点的真实性、准确性与完整性亦由作者独立保证。本社严格遵循学术出版规范，坚决反对抄袭、剽窃、数据假和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行为，一经发现，本刊可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撤稿、标注声明等处理措施并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责任。文章一经刊用，出版社依法享有其出版、传播及数据库收录等相关权利。未经本社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擅自使用本刊内容；在合理使用或法定许可范围内的引用，应注明作者及来源，不得歪曲、篡改。本刊出版仅用于学术交流与信息参考，不构成任何商业或法律保证；因使用相关内容所引发的直接或间接后果，本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学术赠阅 | 研读参考



关注官微 | 更多资讯